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与我坎坷的人生道路

谢强

（长篇自传体写实报告文学　　谢强　著）

目　　　　录

（注：文中我们自己家人和直系亲属以及公众和新闻人物均用的是真名，其他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均为化名。文中所出现的时间和地名均真实并与实际相吻合。）

谢强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

电话：0312-8930928

网址：www.jy668.com

电邮：2006jy668@163.com

QQ：184569462

地址：073000　　河北定州市杨庄子社区铁西居 21 号

1987年前后，晚上的自学时间，窗外是茫茫而又漫长的黑夜...最显眼是一台当时还算不错的双卡收录机，除了学习，听音乐是我生命的第二个源泉。

1990年在一家照相馆留下的失魂落魄的形象

1991年前后，曾经落魄的三口之家：困惑与思考中的我与惊恐的儿子，乐观的老父亲。身后的影壁是我亲手垒起来的，后面就是那所经历了 Cultural Revolution 风雨的旧房子。

1999年。摩尔多瓦的葡萄酒挺出名的，有个这样的朋友喝点好品质的酒就不愁了，反正朋友多了路好走。

1999年，为期5天在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的难位生意还行

中国99世界邮展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

2001年8月陪同印度客商实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愿望

2001年9月，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与吉祥物合影

作者自序

这部纪实性报告文学的初稿已经在我的电脑硬盘上静静地沉睡达三年有余，发生在四川的“5・12”特大地震，不仅再一次震撼我的心灵，同时也把这份不知道何时才能醒来的文稿也给真正地惊醒了。

在以往的岁月里，我的眼睛时常是在泪水的浸泡下才从电脑键盘上敲出来一些段落，有时泪水不断地遮挡我的视线，以至于让我无法看清楚屏幕上那一串串同样是被血和泪浸泡过的文字。我坚信在太阳系中这个人类唯一的能够赖以生存的星球上，具有正义感的好心人所占的比例还是占绝大多数的，所以，这个世界才依然是美好的人间。

我的父亲是在党的光辉指引下，在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反攻阶段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直到现在身体里还留有未能取出的细小弹片。但是为党和国家解放事业从枪林弹雨中有幸活下来的父亲，在全国解放后却因为家庭受到村干部的陷

害而忍受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不公正生活遭遇，直到现在秦桧之流的后代依然掌握着基层领导权，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历史的真相以便让其永远尘封于世，从而保住他们的官职和世袭的家族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为父亲唯一的儿子，在我们保持了最大的理性和宽容之后，我真得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在我经过长达几年时间的坚苦走访并在掌握和证实了第一手材料之后，我要勇敢地揭开历史的真相，以告慰已经含冤去世 26 年的母亲，并告诫世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能再次重演。

今年也恰是我荷兰好友迪克•德•博依（1963-1998）去世 10 周年的日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曾经发扬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了我精神上和物质的帮助并推动我走向人生的成功之路，此文用了一个章节对他的生平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了简要介绍和回顾，以缅怀他那颗菩萨般善良的心。

我凄楚的童年很多时候是在逆境中熬过来的，悲伤的日子总是要多于快乐的时光，甚至在我 11 岁的时候仅仅因为交不上台湾当局用气球向大陆飘撒的传单而被学校停课，在我四处寻找传单的过程中因绝望让我跳了水塘，多亏好心人及时搭救才捡回了一条命，那是一个多么恐怖和刻骨铭心的记忆。

今年是我高中时代立志做一名崇高的新闻记者 27 周年的日子，但高中还未毕业，逆境中的生活再次打碎了我的梦想，在这个漫长的 27 年时间里同样也包含了我人生中的苦与乐，但在我最终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背后更多伴随我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这部纪实报告文学中，使用最多的一个词汇是“依然”，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 照往常，照旧，依旧”的意思，曾记得小时候写作文，老师说频繁使用相同的词汇就会让文章显得单调和不够生动。但在这里我却得不得不频繁使用“依然”这个词，因为它代表着多少个无奈，彰显着多少个道德层面所表现出的冷酷与残忍，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苦与乐以及人间的冷暖。

在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和面对了与社会黑恶势力交锋之后，我悟出了做人的原则应该是在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层面上，探讨人生的意义与社会价值。因为我是在苦水中泡大的，所以我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讲理，但很多情况下我找不到讲理的地方，让我心里感到无比的郁闷。这又免不了让我养成了嫉恶如仇的心态，更希望社会是以惩恶扬善为绝对主调，让邪恶的东西无处藏身，世界才会是真正美好的人间。

我同样是在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层面上，终于在 2008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 87 周年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里完成了自传体长篇写实报告文学《半个世纪的历史真相与我坎坷的人生道路》，但这并意味着像某些粉饰太平的文人那样为我们的执政党歌功颂德。作为一个良知没有泯灭的中国人，怀着对自己的祖国忧心忡忡的心情，把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和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客观朴实的认识和评价呈现给世人。既然是真相，就是要以实事求是的原则讲述历史，以理性和宽容审视世界并以惩恶扬善的原则看待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

什么是历史？简单说来就是过去的事实。昨天已经过去，那么昨天就成为历史。有包容全人类的世界历史，有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历史，也有一个家族或一个人的历史。本应透明的历史如果蒙上一层迷雾让人看不真切，那就等于歪曲和篡改了历史，愚弄了世人；还有那些不想让世人知道的历史，肯定是不光彩的，就象日本右翼势力在铁证面前仍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一样。

虽然我不是社会名流，但作为普通老百姓身份的知识分子，正义感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迫使我揭开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大家了解一个时代的缩影，才是对历史负责的做法。在现有民主政治还不十分浓厚的环境下，至于我的自传能否公开发表还不能完全确定，社会上一部分随波逐流的朋友已经给我泼了冷水，他们认为一方面发表这样的东西会让我得罪那些依然在掩盖历史和现实真相的人，另一方面这些朋友也不相信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这些东西针对一个没有背景的老百姓身份的我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写这个自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观思想，我只希望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没有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对不公道的事情最后讨回公道，仅此而已。对于执政党来说，极其简单的解决方案，却让我坚持讨回公道的信

念快 30 年了依然无人过问，也许这就是“刁民”的信念。

实际上我个人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并没有怨言，因为是历史造就的人间悲剧，毕竟那个恐怖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走上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轨道，这是让人欣慰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执政党从拨乱反正时期直到现在所承诺的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等一系列让人感动的原则，是否真正都向人民兑现了，这是一个即让人疑惑又值得思考的问题。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个别作恶多端的历史罪人直到今天依然不思悔改，沉浸在作恶有理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不能不说是地方政府为虎作伥所造成的恶果。

在以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谎言重复多了就会变成真理，御用文人笔下的宣传教育，使多少人在潜移默化中被愚弄和蒙骗。在我早年所读过的书中，我也相信过诸如“苏联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谁能够想到“斯大林时期”是 20 世纪地球上最黑暗、最没落、最野蛮的年代，同样的中国所经历的那个黎明前的黑暗与苏联相比在某些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感谢苍天的恩惠，摆在现实的人类文明面前的苏联及其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中国社会黑暗和野蛮的年代也同样一去不复返，它已经成为唤起人们痛苦记忆的历史并昭示一个国家永远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另一个现实的人类文明就是冷战时期所谓“垂死的美帝国主义”依然健在，而且美国的盟友还在继续发展和壮大中产生了欧洲联盟进而与美国一道成为引领世界先进方向的国际主流社会。还有在过去的《中国少年报》上看到的栏目叫做“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而后来的中国经济还不是走上了以私营和股份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步入了国际主流社会的行列，这与美国和欧盟的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看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现实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像古巴和朝鲜那样专制体制下的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以，特权阶层的政治体制已经不适应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需要，继而才会在官场腐败、贪赃枉法以及社会不公正等方面的诸多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要远远高出美国和欧盟。

时过境迁，以往那些不顾事实、颠倒是非、真假倒置的愚民政策，已经为觉醒的中国人民所鄙视。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团体或具体某个人所承诺过的东西而始终不能兑现，那照样被看作是哗众取宠的谎言，从而不光失去人们的信认，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在不断进步，中国也在不断改革和调整中发展，按照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和法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光在经济上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全面接轨才是中国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出现，更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摘掉了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如同紧箍咒的东西，中国的发展无疑将会更快。至于这些像紧箍咒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觉得广义上就是与道理、情理、法理和真理相违背的东西，比如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广泛存在着谎言连篇、指鹿为马的行为，还有最要命的就是吹民主之风，行专制之道等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曾经说过的这句话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应该会继续对坚持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多数人所认同。不敢正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至少会招来世人的鄙视，只有以史为鉴，人类才能不断修正自身的错误，社会才能在不断的改革中得到发展。就现实的中国社会而言，只能是有了公正的社会才能自然而然地构建出和谐的社会，公正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在抛开公正的前提下而大谈和谐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抛开了公正原则就不会有和谐的存在，也同样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昨天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我要坚持正义的信念，便常听到周围的人们对我劝慰的一句话是：“不要太认真，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说得没错，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过去张志新坚持信念，最终落得被割喉处决的命运，然后再被同一个党追认为革命烈士。可是，我们为什么不首先建立公正的社会呢，公平与正义不光是生活在底层的中国老百姓所渴望的东西也是每一个有良知中国人所希望的，某些失望中的老百姓得到了公正，哪里还会有什么“刁民”的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啊。

在我事业上走向成功和思想上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时候，我意识到人的生命不单单是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在为推动社会的发展与人类进步事业中所肩负的责任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也希望除了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还要与大家一道做为真诚的爱国者在为推动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事业中，共同承担生活的风雨，共享人生的快乐。

第一章　投身革命的父亲与坚持信念的儿子

我们谢氏家族从 150 多年前的祖辈就开始住在现今杨庄子社区位于京广铁路西侧的地方，谢氏家族是这里最早的和主要的原住民之一。相传我们家所住的区域正是我们的先人谢老刚当年繁衍生息的地方。

在解放前后一个时期里，由于这里地理位置距离县城很近且交通方便，整个村庄便成了一块风水宝地，有逃荒走到这里落了户的、有乡下人为了生计留下来不走的，移民的不断涌入使这里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各种姓氏、操着不同口音的村庄。

在这个村改居型社区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曾是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地名多次更改，“文革”前叫杨庄子村，“文革”时期改为团结村，“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于 2001 年改为杨庄子社区。目前社区总面积有 1.8 平方公里，有常住人口约 4000 人。

从我们居住的地方到火车站的直线距离不足 2 公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民兵时常以这里靠近铁路的居民区为掩护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线。后来日本侵略者就强行拆毁了铁路边上的居民区并挖壕沟保护铁路。失去家园的住户们都搬迁了，我们举家投奔了位于县城的西关北街的姑姑家，之后才在那里另找房子安顿下来。

1947 年 1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抓住战机，发起了保南战役，定县城内的国民党守敌被消灭，至此定县宣告解放（1986 年定县改为定州市）。虽然身处异乡可以免除兵役，但那时只有 20 岁的父亲谢金更依然怀着满腔的报国热情随即与西关北街的 13 位民兵一同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我父亲随所在部队工兵营先后参加了围攻徐水和解放张家口等地大大小小多次战斗，身体多次负伤，因当时部队医疗条件所限，直到现在他身体里还留有没有取出的细小弹片，一条腿还落下残疾（有民政局颁发的复员军人优抚证）。在人民解放军刚刚开始的战略反攻阶段，由其是在 1947 年秋天我父亲参加的徐水周边局部地区的战斗中，曾有力地配合了华北战场上著名的清风店战役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思乡心切的父亲为了不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选择了回乡务农，并于 1956 年全家从西关北街搬回了杨庄子村原址。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到了六十年代，这个同样是贫下中农的革命家庭竟然莫名其妙地发现早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村里弄成“富农”了，由此使这个无辜的家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历经磨难——我母亲遭迫害和批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的拨乱反正时期，虽然经过家人的多方努力，但最终因为基层领导的干扰和阻挠没有能够洗雪我们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属于我们的财产始终也没有归还。期间我的母亲经受不住多方面的打击，积劳成疾，含冤去世。

在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所蒙受的财产损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因在以往历史条件下曾经加害我们的当事人和某些基层领导串联起来倒行逆施，再加上他们世代相传的家族式统治才导致我们申诉无门，无法得到解决。

他们始终不想让问题得以解决的最根本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想要永远掩盖历史的真相，好让他们的父辈在做了像宋朝那个秦桧陷害岳飞的丑恶行径以后永远成为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谜团，从而除了保全他们自身的官职还要让他们的家族式统治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个人很多时候首先要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对待很多问题便采取能忍则忍的方式，同时为了家人的生存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向有关部门揭开这个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也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可能天天拿上访当饭吃，因为那样的话我们整个家庭就有可能会落到困死、饿死的地步。

从这一家人所遭遇的一连串的历史悲剧的根源来讲，首先是日本鬼子毁掉了我们的家园才导致背井离乡，如果我们始终住在原籍或许也不会被村干部找到强加“富农”的机会。但战后的历届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正视过历史，广泛遭到亚洲各国受害者的谴责，所以，这个弱小的家庭就更不可能找日本政府说事儿了。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先后通过走访和挂号信方式逐级向村、城区、市级、地区级和省级有关部门提交过书面申诉材料，包括当年的保定地区和省级落实政策办公室以及后来程维高在河北当政时期，都曾向信访局等多个相关部门提交过申诉材料，这其中还包括后来寄给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的申诉信，直到现在大部分申诉挂号信的回执依然完好的保留着。和风后来为震惊中外的“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受到牵连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至于依然坐在官位上的和风还有多少个，我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的说视人民的利益为草芥的这类贪赃枉法的官员就隐藏在各级政府的部门中。

这些官员不能倾听或者根本就不理会来自社会弱势群体所发出的微弱声音，它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尽管大部分人会选择忍气吞声而顺应执政党所号召的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另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据理力争，从而产生了“刁民”群体，他们不再顾及社会稳定与否，甚至会用某种过激的手段讨要说法，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会随之而来。

至于说为什么会发生“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或者说事件的根源和背景在哪里？

可以拿赖昌星走私案为例，不光是涉案金额创下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从中央到地方，所牵涉到的各级别、各层次的违法犯罪的官员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落马后如同丧家之犬的高官们和某些仍坐在位子上发号施令的行政官，本质上和骨子里是没有两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后者的狐狸尾巴还没有暴露出来而显得道貌岸然。

不管是落马的，还是仍在官位上的，所有像和风这一类型的官员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视人民的利益为草芥，当老百姓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他们要么发脾气，要么就避而不见，要么就以草菅人命的工作方式对待老百姓；另一方面，当大大小小的赖昌星们找他们办事的时候，哪怕是违背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甚至是在触犯国家法律的前提下，他们照样会象一条条哈巴狗见到了自己的主人而摇头、摆尾、献媚。从我切身的经历中发现各级政府中的这一类型的官员确实存在，至少在定州市还存在着，他们与鲁迅先生发现的“乏走狗”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见到所有的阔人都驯良，见到所有的穷人就狂吠。”在以后的章节中会用事实来详细讲述这些问题。

之所以会发生“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说白了它的根源就是因为在定州市腐败的政治环境下，正义与邪恶无法抗衡，从而始终没有能够让公正的天平侧重于老百姓这一边。2005 年 6 月，因河北国华定洲电厂征地补偿款发放不到位一事，绳油村上千名村民就他们认为有关部门贪污、截留征地补偿款的问题向定州市委书记和风下跪，和书记极其傲慢，以嫌弃和蔑视的口吻嘲骂道：“别来这一套，这个我见得多了！”

用分析家的话来说：和风的前任留下一个烫手的山芋而一身轻松的到别处当了更大的官儿，而新上任的和风可能一下子也吃不消这个错综复杂的烂摊子，于是在面对老百姓上访的时候不是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消极的态度任凭事态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但最终受到损害的不单单是老百姓的利益，更大的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这还大大消弱甚至是丧失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而政府也不得不拿出巨额的资金，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为腐败政治的受害者埋单。所以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不是来自民间处于弱势群体的老百姓，而恰恰是来自政府的腐败行为本身，正是由于政府的腐败才激发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定州市的一个黑恶势力头目王海山与定州市政府官员相勾结的一个案例发生在“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之前的 1998 年，虽然时间前后相隔达 7 年，但它的腐败水平与“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相比，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到 2008 年这个案例整整 10 年了， 但王海山家族及其同伙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纪和法纪的追究，只听说后来王海山的大儿子王国敏因受贿问题被捕，但通过活动很快就又放了出来。关于我个人与这个黑恶势力进行斗争的经历在后文的第十二章中会有详尽的讲述，因为我要与我所面对过的所有的黑恶和邪恶势力以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黑暗势力要一起算总帐的。即便是在我弱小的时候曾经放过了他们，但是我始终相信

党纪国法还有爱好正义的全国人民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关于我们遭受不公正待遇长达几十年的问题，也可能是当初那些材料写的简单了，再加上不够充分和详实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而一直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在当年各级政府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的热朝中，我再一次逐级向相关部门提交了申诉材料。有一次我去找社区政府正赶上胡庆山书记带领大家讨论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问题，我在门外一直等到人家学习讨论完了以后才向领导说了我的问题……

还有在后来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同样找过基层领导要求对我们 50 年沉冤给个明确的说法，依然没有结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一条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其详细解说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我做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份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完全领会了“三个代表”伟大思想的深刻内涵，而为什么整天专门学习讨论“三个代表”的基层干部就真的不能领会吗!!!

在这一阶段的申诉当中，随着一连串的到处碰壁，不由得使我再一次发出无奈的感叹，照这样下去我不再相信他们的学习成果会达到哪个崇高的境界，倒是更相信老百姓当中那句话，“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通过我的种种经历以及后来发生在我身边的震惊中外的“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都充分暴露出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各种弊端和隐藏更深的腐败问题，这才是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关键所在。而绳油村的民众不依不饶地到处上访、聚众闹事也是不明智的作法，因为那样做只会增加社会的混乱局面而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可另一方面老百姓却又是那样的无奈……

在各级政府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热潮过后，我再一次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擦干眼里的泪水，把我们两代人的冤屈深深地埋在心里，默默地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实际工作当中。

因为当年正是因为共产党像太阳一样的光辉指引下，我父亲才满怀着报国之心踊跃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所以，我一直相信党的光辉同样也可以照亮我们逆境中的生活轨迹。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称得上是中国的一代伟人，也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崇拜者和精神支柱。他老人家曾经在逆境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为挽救党、挽救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历经“三落三起”，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得失又能算得上什么呢。

邓小平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除了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伟大意义，更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通俗地讲，不管在我们的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生活的方方面，所有那些经不住历史检验的东西，不管它有多么华丽的外表和多么诱人的魅力，最终归根结底都算不上是什么真东西。

发生在四川的“5·12”特大地震灾害也同时震动了我的心灵。几天当中看到电视里惨不忍睹的灾情，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看到四川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让我伤心地流泪，看到党和国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由其是国家总理 2 个小时后就亲临灾区更是让我感动地流泪。

当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时的一番话在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说：“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所以，对于我们过去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人祸灾难，似乎也只有依靠党、依靠国家和人民来给我们作主了。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冤案背后免不了隐藏着长期的腐败以及诸多即丑恶又不能见阳光的东西，一旦拔出萝卜肯定也要带出泥来，其后果会不会使我的全家面临一个新的悲剧的开端呢？当年郭光允向中纪委和省纪委匿名检举程维高的材料都落入当事人之手，做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真得不想给我的家庭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苦难之后再惹出什么新的祸水来。但是，我始终坚守着对党、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心境，只要是正义的信念我还要继续无怨无悔地坚持下去，直到最终实现正义战胜邪恶的那一天。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就如同四川特大地震中的幸存者，已经在废墟中被压了整整半个世纪了，希望党和国家依然能够像四川抗震救灾中那样不抛弃、不放弃，最终把我们拯救出来，在此我谨代表所有的家人和所有的亲属先说一声感谢伟大的党、感谢伟大的国家和人民。

如今是在自己以仁至义尽的宽容对定州市杨庄子社区当事人，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后来的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以及相关领导阶层所抱有的幻想最终破灭以后，在不得已的背景下采用自传体纪实报告文学的方式详实讲述我们沉冤达半个世纪的悲惨历史以及我本人甚至有时侯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的生活磨难中的成长经历。

在我母亲悲惨去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接连不断地遭遇碰壁的打击，我的父亲和我的三个姐姐基本上都放弃了讨回公道的信心和勇气。但是做为父母唯一的儿子，我对正义的信念已经执着地坚持了几十年，而且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讨回公道的决心，可以说生命不息，信念不止。我不光要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活着，也要为我个人和全家的尊严而活着。至于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作为受害者想达到什么目的无非就是有以下这么几个：

一、让那些违背我们党和国家基本原则、逆历史朝流而动的邪恶势力看到后会有所悔悟。

二、让我饱经风霜，曾经为党和国家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父亲在有生之年，因为被人陷害而蒙冤 50 年后的今天看到最终平反的希望。

三、在我 1981 年刚上高中的时候就立下了将来要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但生活的种种不幸遭遇使我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化为泡影。但是我相信，如今我们已经初步强大起来的国家和朴实、善良、正义的人民最终会满足我做一次纪实作者的成就感，也算作我实现了 27 年前的那个崇高理想。另一方面 27 年也同样可以看做是一个历史的巧合，1994 年我与南非历史上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 • 克勒克在离任之际有过一次通信交往，而纳尔逊 • 曼德拉就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之前，在他同种族隔离制度长期不懈的斗争中恰好经历了 27 年铁窗生涯。而我这个自由公民所经历的这个漫长的 27 年时间里，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持续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正义与邪恶不断较量中的真实缩影。

四、让更多的人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蕴涵的深刻哲理。

五、配合中共中央未来五年反腐败工作规划的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

第二章　荒诞离奇的“富农”之说

我们家原本就是贫下中农行列中的一员，关于我家所谓“富农”的由来，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西关北街将“富农”户籍介绍到杨庄子村的，这种说法当然最先出自泡制“富农”的杨庄子村干部那里。现在经多方面走访和查证知情人，这种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家临时住那里，种地还是要回杨庄子村，在那之前父亲还在村里原住址附近的荒野里种下了几百棵树，在西关北街栖人篱下的生活中怎么就成“富农”了？而且父亲和知情人都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地主、富农出身的可以参加八路军，而到了 1947 年原定县解放后进行了土改，我们被定为中农，而富农出身的就已经不能参加解放军了。所以那种说法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至于它想掩盖什么，因后文还会有详尽的讲述，在这里暂且不提。

我依然健在的父亲和我生前的母亲所掌握的真实情况与后来得到众多知情人证实的历史真相是一致的。

按多数知情人的说法是当时的杨庄子村治保主任与我的爷爷曾有旧怨，当我们家在 1956 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后，爷爷空着手去找人家弄户籍，没拿上烟酒什么的，人家很不高兴再加上本来就有旧怨，于是为了出气就伙同原杨庄子村党支部书记黄立虎给偷偷地弄成了“富农”。另外更多人的说法是没拿烟酒以及有旧怨是一方面的原因，那个治保主任所在的杨庄子村第五生产队没有富农，于是 村治保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出于政治目的凑“富农”的名额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据知情人透露村干部偷偷给我家弄成“富农”的时间正是在 1956 年。我奶奶早在 1952 年就因病去世了，我爷爷也在 1962 年病故，所以两位老人有幸没有赶上 10 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迫害。

另外，这里根据知情人透露的内幕还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当年制造“富农”的村治保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是把兄弟，而书记知道那样做对一个革命家庭所带来不良后果的严重性，所以曾劝阻治保主任打消那种有点丧尽天良的念头，但治保主任为了发泄对我爷爷的不满情绪，最终还是在杨庄子户籍上把我们弄成了“富农”，而到最后村党支部书记也不得不与治保主任同流合污了，并制定出一旦被人发现就说“富农”的户籍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

凑“富农”的名额是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在中共掌握政权的最初阶段，这同样是在专制政体下的权力失衡导致的众多无辜人民受害的恶劣结果中的一个范例。这与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继续保持的专制政体从本质上讲并没有两样，为达某种政治目的，其结果都是让大量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的狱友黄中国只是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农民，却被国民党当做中共“匪谍”杀掉就是个可悲可叹的缩影。以下是《李敖和他的女人们》一书中的片段：

黄中国死后，同牢的李国龙问李敖：“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怎么不知道？只不过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些假匪谍来充数了。”

由此可见，在 1949 年以后那个长达近 30 年的黑暗岁月里，大陆的中共政权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都同样采取了打压民主与自由的进步力量，其所做所为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台湾的国民党所打击的范围和危害程度没有共产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范围更广、更凶猛。

当年扣“富农”帽子的那两个村干部已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不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或想达到什么目的而给我家扣上“富农”帽子的，这对于长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都显得不是那么十分重要。

然而，强加的“富农”给我的全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损失和巨大的精神打击，虽然经过多年不断的申诉，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平反就更别说得到补偿和安抚。原因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因为我们始终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是属于中国社会小人物的行列，由于人微言轻，在专制政体下我们就可以被随意的忽略甚至当做任人宰杀的羔羊。这与我们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最近一百多年里深受外国烈强的欺凌似乎有着相同的一面。真可谓国弱被人欺，家弱人难依啊！

四川特大地震是可怕的天灾，但针对我们而言人祸似乎比天灾更要可怕不知多少倍，因为天灾无情，人有情。除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具体实施，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也会申出援手、献出一份爱心，我本人也率先通过互联网为灾区 2 次捐款，随后参加了杨庄子社区组织的募捐活动，以绽放人性的光辉。还有来自全国的心理医生和志愿者来抚平孩子们心理上的创伤。

我们 50 年来所遭遇的一切不但是人祸无情，而且制造人祸和解决人祸那些人更加无情，用惨无人道这个词也并无过分之处。人祸给我们两代人带来的灾难和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只能由自己来默默地承受，而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击报复而加害我们的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长达 40 多年时间里始终也没有良心的发现，更没有道歉的任何表示，就更别说忏悔。

1980 年拨乱反正时期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也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同流合污了，在之后杨庄子就进入了庞大的家族统治时期。不但我们要求落实政策的愿望化为泡影，甚至张玉春最初还向我们发出威胁的信号，之后是村干部继续掩盖历史的真相，用谎言对我们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内心世界不断地造成新的伤害。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人之初，性本善，从另一种意义上可以假设在原始社会中，人们还不具备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思维模式。但是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人们怎样对待和感受生活中的爱与恨确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思维与认知问题，它让人们看到的是一系列值得声讨或值得弘扬的社会现象，而超越了人类道德水准层面上的爱与恨同样也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中似乎认识到爱与恨这个对立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们意识形态和世界观领域里所持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客观与公正，理性与宽容应该是绝大多数人所具备的一种有益的心态，它无疑会给人们创造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在爱与恨这个问题上坚持主观与贪婪，感性与狭隘心态的少数人有可能会成为和谐社会的公敌，继而才会发生不公平的社会现像，同时也就有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

第三章　母亲心中的人间地狱与人间真情

在原革委会主任加害我们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段小插曲，同样是 50 年悲剧中的重要一幕。

我的父亲向来对土地情有独钟，喜欢在工余时间开荒种点庄稼什么的，也好贴补家用。有一年麦收季节，生产队西边地里的麦子被人偷了，而我母亲恰巧正在家里打那点开荒地里的麦子。生产队长陈国峪找上门来硬给栽赃陷害，说是我母亲把西边几亩地里的麦子偷光了，并以“富农”相威胁要把母亲带到大队上说事儿。父亲出远门修水库去了，母亲早就知道他心术不正，向来为人正直、生活正派的母亲因为他动手动脚便与其发生厮打。听母亲在世的时候给我们讲，撕烂了他的新衬衣，还用洗衣板狠狠拍了他几下子。

气急败坏的那个生产队长阴谋没有得逞，便小题大做报告了派出所并叫来荷枪实弹的民兵，不由分说就把母亲押到拘留所关了起来。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拘留是没有期限的，要想放人全靠你的表现好坏以及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忠信程度如何或着得看人家的心情怎么样才行。我母亲感到极大的冤枉和委屈就用绝食的方法与他们抗争，这种

行为当然是被人家看作不老实改造，继续与政府做对，进而遭到罪加一等的严重后果。后来是母亲在拘留所里病的不轻的时候，有关部门怕弄出人命来，我母亲才被军管会批准释放并被好心的警察送回了家。

那段时间父亲做为“阶级敌人”正在水库的工地上改造思想、参加义务劳动，当然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父母都不在家的情况下，可以想像三个姐姐和年幼无知的我在家里是怎么渡过那段时光的。不管怎样，母亲没有被弄成“现行反革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家人已经很知足了。

好在苍天有眼，那个以“富农”想要挟，冤枉我母亲的流氓队长不久竟然两只眼睛全瞎掉了。那才真是七百年前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在经典悲剧《窦娥冤》中所描述的六月下雪的情景，在当代这个生产队长身上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了验证。就这样那个生产队长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过，再也没有机会看到雨过天晴之后美好的人间生活，直到 2003 年在他身边即没有妻子更没有儿女陪伴的凄凉景象中走完了人生。

这可不是小说中虚构的情节，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杨庄子村历史上的真实一幕，这一事件也应验了民间流传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说法。

在那个年代，我的母亲不仅随时成为被拉出去批斗的目标，而我们本身就是贫下中农，却因为扣了个“富农”的帽子使家里的财产也可以随时遭到贫下中农的哄抢，整个家庭也成了人们发泄的出气筒，就连母亲的亲妯娌也与我们为敌了，更何况外人又会怎样对待我们呢，在母亲的心目中，团结村或者叫杨庄子村乃至现今的杨庄子社区已经成为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人间地狱。当年在墙倒众人推的背景下，人们只会随意伸出脚来踩一下，并没有谁能站出来申张正义而随手拉一把，一直到现在掌握权力的基层领导者们依然还不想给我们平反，而且还要让历史的真相永远掩盖下去，这不能不说这些人在扭曲和阴暗的灵魂指导下采取不明智的做法是那个恐怖和没落时代的尾音的延续。

我一直等到现在就要发稿的 2008 年，那个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他那张狰狞和扭曲的面孔依然在向我们示威，好让我们感受到他背后所存在的那种恐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恰恰来自杨庄子世袭的家族式统治。

人们知道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她们无怨无悔地为人类做着缉毒、救援以及打击犯罪等各项危险的工作。我不得不这样想，在刘德栓刚下生的一段时间里，在他还没有思维的时候他可能还算是一个自然的人，他是什么时候变成魔鬼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刘德栓在变成魔鬼以后哪怕是还跳动着一颗狗的心脏，他也可能会从魔鬼那里又变回到人间的面目了，至于他的人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一直是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至于在他寿终正寝之前能否找回他的人心已经很难说了。

大家知道人与动物都是有情感的生物，只有狼的本性最残忍，常言说“喂不好的白眼狼”，但在我的心目中，刘德栓根本还无法与狼相比，现在狼不光是国家受保护的动物，它还担负着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的重任，狼同样是人类的朋友。直到现在刘德栓还说“文化大革命”他做的那点事弄得我们还不算狠，还说他所没收的我们家的宅院也不属于我们，但我们祖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难道说要属于他才对吗？而刘德栓是从曲阳县的山沟里窜到定县杨庄子村的，在这里跟本没有他的一寸土地，而他却能在这里堂而皇之的成了杨庄子村的主人。

我家配房的门洞里每年都来燕子在此安家，可今年不知房子什么地方漏水，眼看就要殃及到墙壁上燕窝，因我工作繁忙，很多天之前我就把事情交待给我妻子，要她赶紧找修补漏房的人，可一直也没找来。又一场雨过后燕子窝湿了大半，害的我坐卧不安，生怕燕窝掉下来给她们带来灭顶之灾，晚上半夜里我也要起来看几次，万一掉下来了也可及时拯救那三只刚孵化出来的小燕子的命运。为此事我跟妻子大闹了一场之后亲自找来了施工的人员，因找不到具体漏水的地方，便把整个房顶做了防水处理，钱虽然花出很多，但那个燕子窝最终还是保住了，这才让我安下心来去做别的工作。随后不久那三只小燕子很快就长大了，能跟着她们的父母自由的飞翔了，每天早晨还听到这五口的燕子之家在院子里欢乐的歌唱，于是我也就起床来到院子里看看她们并共享欢乐。

试想一下，两只燕了夫妻从很远的地方一嘴一嘴地叼泥过来花费很多天的时间才建起那个燕窝，如果在人的冷漠之下任其毁掉，良心的谴责是小事，那他就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况且燕子是益鸟，同样是人类的好朋友。

话说到这里，就别说燕子，就是一条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照样应该像东郭先生那样毫不犹豫地去搭救它的性命。但是如果遇到像刘德栓这样没有人心的，即不属于人类又不属于动物的不明物种，我们没有理由搭救它，因为它已经在几十年前就是魔鬼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变成人，因为其内心世界里依然延续着当年那种罪恶的思维模式而不能自拔，不管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它只不过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

各位读者朋友，我在此作了如上文字的表白，不免会带有宣泄的语言成份，还望大家能够理解和包容，因为后文会提到，几十年来我们对刘德栓已经做到了人至义尽的宽容，他却自始至终站在已经被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立场上，我又能对他怎么样呢。在我们已经对他长达几十年的宽容过后，再让我们对他进一步保持沉默的宽容直到其寿终正寝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我只能寻找恰如其分的语言和较为形象的比喻来正确描述这个不明物种，好让大家看清楚刘德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如果早些时候，执政党那些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原则能够让刘德栓从魔鬼转变成人，我同样会对他表示尊重，甚至会把他看做朋友一样对待。

当年轰动全国的张志新冤案的主要责任人毛远新在"文革"结束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出狱后便使用"李实"这个名字重新做人了，作为毛泽东侄子的毛远新从此远离政治，干起了工程师的本职工作并取得成就，从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和好评。由此看来，一个人犯了错误乃至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并不可怕，但是因错误不能改正和罪行不能追究而导致一个人在执迷不悟中继续作恶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以上这些针对"文革根子"刘德栓的描述只能说是善意的表达，而不是恶意的中伤，况且人有善恶之分，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流是应该建立在惩恶扬善基础上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做的比喻太狠了吧，那就错了，这些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比喻，而不是付诸到行动中。因为看看他们的所做所为就知道他们不光是狠，而且是毒，而这种狠毒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挥发着巨大的毒性和杀伤力，这不能不说他们内心世界里的狠毒是继承和延续了"文化大革命"的衣钵。对于刘德栓之流所做出的置人于死地而后快的打击报复、残害无辜的罪恶行径，还有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世纪书记"张玉春在寿终正寝之前是否还能受到公平和正义力量的追究，似乎已经变得不明朗，如果这类肮脏的灵魂最终身附着罪孽下到地狱将对文明社会同样是一个危险的挑战。关于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所做所为，后文会有详尽的讲述。

在杨庄子村人间地狱的背景下，母亲生前与邻近的夏庄子村的贾氏、蒋氏和张氏等几户人家的传统友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在当年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这些邻村的朋友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使母亲受到伤害的内心世界得以慰藉。我母亲一生中都保持了爱说媒的习惯，后来成为夏庄子村党支部书记的贾青山的妻子就是我母亲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从娘家孟家庄村介绍来的。在上世纪 70 年代，我母亲把大姨家的二女儿介绍给张氏的二儿了张洁为妻，张洁就成了我的表姐夫，后来又介绍孟家庄村的一个姑娘嫁给张氏家的三儿子张军为妻。想当年我母亲病重时正是张氏一家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才让母亲得以到北京就医，充分体现了人间真情和人性的光辉。如今前辈们传统的友谊在我们新一辈身上等到了继承和发展，我与张氏家的两个儿子张洁和张军不仅是好朋友还是兄弟般的关系，同时我也是他们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恩他们的父辈曾经给我们的无私帮助。

张军是定州市著名的企业家，是河北亨达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还兼任保定市政协常委等职，表姐夫张洁是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和设计师。这是一家生产塑料制品兼营塑料机械开发与制造的一家中型民营企业。近几年来我除了从事自己专题邮商的职业，还兼职该公司的法律顾问以及某些难度较大的文职工作。

近两年来在我们兄弟三人与公司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下，研制成功了 TMIR 铁矿粉干选机。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我为攻关小组翻译了大量国外相关产品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从而得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果，为最终研制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新技术的发明，为国内外首创，是无水生产的优势取代传统水选铁粉工艺的革新产品，它具有环保、节能、高效无噪音的特点，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样机试车后，铁粉产品经河北省钢铁检验所化验，各项指

标均达到和超过国家标准。这项科技成果已经列入河北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目前正在为投入批量生产而做着各项前期的准备工作。

历史证明：谁能够笑到最后，谁才算是真正的强者；谁能够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谁才会是时代潮流中发出的最强音。

想当年张氏被定为四类分子，将氏是富农家庭，但是，他们的富农与我们的“富农”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在解放后土改时定成的富农，我们土改时定的是中农，而我们所谓的“富农”是土改 10 年后由村干部给强加的“富农”，这个“富农”自始至终就是假的，是被人冤枉的，我们本质上一直就是贫下中农的名分，所以我们一直保留着平反的权利。

那个时候张氏和蒋氏与我们一样都是在村里抬不起头的受迫害者，如今那些害人者在看到人家取得的巨大成就之后会有人什么感想呢，他们会不会对当年的行为感到无地自容呢。而所有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重要，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夏庄子村的基层政权自粉碎“四人帮”到拨乱反正以后，不论更替了多少次都一直掌握在好心人的手里，都掌握在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手里，就连“文革”时的受害者，那位来自富农家庭，曾经奋不顾身跳入水塘搭救我性命的蒋家大哥不仅也成了夏庄子村基层政权的领导者，而且还是市人大代表。所有这些与杨庄子前后半个世纪当中的家族式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基层选举在杨庄子也不断的换届，但最终的权力还是跑不出他们家族枝繁叶茂的阴影。

原革委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不就是依靠他们自身的以及背后的那种至高无尚的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依靠一种无形的暴力所产生的威慑力才能让他们有十足的底气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但是违背人类道德规范的邪恶暴力永远起不到让正义的人们有所屈服的作用，更永远也做不到长久阻挡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步伐。正如网络红人当年明月在史书《明朝那些事儿》中所说的：“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中淘汰，历来如此。”

第四章　结怨引发的灾难性报复

说来话长，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与我父亲结怨是在农村搞合作社之前。刘德栓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解放后他们的族人先后离开那块贫瘠的山沟里的家，来到定县杨庄子村寻找生计，时间久了他们也就融入到本地社会中成了杨庄子的村民。

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包括刘德栓和我父亲在内的几户人家合伙搞起了一个马车运输组，刘德栓花了大伙的钱始终赖账不还，眼看运输组就要散伙了，他依然没还钱的迹象，于是大伙商量把他的马车变卖以低部分债务，就这样刘德栓跟大伙都结下了仇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有良知的中国人看来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刘德栓不这样认为，似乎他白花别人的钱倒是天经地义的，当债权人让他还钱并以必要手段挽回了部分损失的时候，债权人同时也都成了他的仇人。

我父亲于五十年代初期在不毛之地上植树，经过不断开垦形成了一块面积有几十亩多的林地，大小树木有四百棵之多，苦心经营。进入农村合作社以后，当时的村干部口头承诺产权各占 50%，就是说我家还拥有一半的所有权。

先前曾向刘德栓讨债的仇家有 5 个，但都没有实施报复的机会。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刘德栓当上村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并了解到我家是杨庄子村五队的“富农”以后，他终于找到可以实施报复的目标了。

1965 年，我父亲从如上提到的那块林地里移出了 12 棵小树栽 种于院落周围。时任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刘德栓得知后，很快就报告了村里，说我父亲破坏集体的林木，要求村里对“富农”谢金更家进行经济处罚。当时那个曾经参与制造“富农”的村党支部书记黄立虎当然知道所有的树都是我父亲一手种植起来的，况且还有一半的所有权，所以就拒绝了刘德栓的无理要求，他的报复行为暂时没有得逞。

但是一年后，时局急转直下，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曾经默许那个治保主任给我们制造“富农”的村支书下台了，杨庄子也改成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团结村”。在“团结村”五队这个唯一的“富农”人家里，父亲谢金更受到与“四类分子”同样的待遇，我的母亲王彦国随时都可以被人拉出去批斗。具知情人讲，有一次批斗我母亲，因为她不肯低头，被气急败坏的组织者剪掉了满头漂亮的长发。

因为母亲她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低头认罪呢？这个罪从何而来呢，恰恰是那 2 个给我们强加“富农”的村干部才是党和国家的罪人、更是历史的罪人。然而，历史对我们却又是那样的不公平，那个当年给我们强加“富农”的治保主任的儿子胡庆山，在 50 年后的今天依然继承着父业，是杨庄子社区最大的官儿，而且依旧用谎言来迷惑人心、推脱并掩盖其父亲胡栏树当年所犯下的罪责。

当年任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的刘德栓一跃跳到“团结村”最高领导层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刨树的那点事当然就成了他一口说了算的一桩小事。他的处理结果是：以破坏“集体”林木的罪名，每棵树罚款 50 元，12 颗树共计人民币 600 元，随后那 12 棵树也被生产队刨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点钱 对我们这个家庭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全家 6 口人的温饱都成问题，从哪里拿出这么多的钱啊。1963 年的特大洪水冲毁了人们的家园，1964 年母亲从好几个亲戚那里举债建起了五间砖房。在无法拿出现款的情况下，刘德栓带领社员们要强行拆除我家的五间砖房来抵偿那 600 块钱的罚款，无奈的一家人决定死在房子里也要保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栖身之所。在父亲和三个姐姐的哭求之下有良心的社员们纷纷撤离，最后只剩下刘德栓一个人他才灰溜溜也走开了。

房子保住了，数额不菲的罚款还是要偿还的，我的父母和三个姐姐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从每年全部的劳动所得中扣除。就这样我家除我之外的 5 个劳动力（后来有 2 个姐姐出嫁），在生产队以付出 10 年的劳动为代价，直到 1978 年才从全部的年终分红中偿清这笔罚款。试想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我们这个家庭好几个劳动力，一年下来所能分到的几十块钱还被生产队全部扣掉，我们怎么生活？

实际上的其它经济损失也远大于那 600 块钱的罚款，因为刘德栓的报复计划还不算完。

为了掩人耳目，刘德栓首先放出风声说农户家的闲宅闲院要收归集体，而实际上只没收了我一家的 9 分宅基地及其上已经成材的 10 多棵价值不菲的青皮杨树。之后他又宣布对我家那块林地 50%的所有权予以剥夺，紧接着所有那些由我父亲付出汗水和心血种植管理的几百棵大小树木除被生产队砍伐的之外，也在刘德栓的怂恿下被社员们分光、抢光了。

刘德栓其人没有文化，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就在他基本完成了他的报复计划之后没多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因文化水平所限，讲话内容据说是因为亵渎了马克思主义而被人抓到了他的狐狸尾巴，一下子便从“团结村”的权力顶峰摔到了底谷，他短暂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了。但是，在以后的几十间他一心梦想复辟的思想在杨庄子村家族式统治前后长达 50 年之久的环境中，丝毫没有什么悔改的迹象。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任职革委会主任不到一年的刘德栓，却给一个无辜的家庭带来长达几十年的苦难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创伤，这不能不说这个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以其黑暗、扭曲的内心世界给中国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第五章　可恶的“富农”误了我们姐弟的前程

在政治上因为“富农”的帽子除了父母遭受批斗外，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本人也同样带来极大影响。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里，我们不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只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份，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任人宰杀的羔羊。

因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和学生们整天以“富农”崽子等各种方式进行羞辱和打骂，除大姐外的两个姐姐只好先后辍学回家与父母一道下地劳动，也可早日还清那个 600 元的罚款。

有一次已经上中学的三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团结村的一群小学生追打到家门口，他们依然在门外还不停地喊着“小地主”、“富农崽子”之类羞辱的话语。气急的母亲把他们当中年龄较大的几个弄到家里痛打了一顿，并嘱咐他们回家问清楚他们的父母，看看有谁给我家做过长工还有谁给我家打过短工。

母亲的确是解了气，可为此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遭到更大规模和更为严厉的批斗。

大概在 1969 年的时候，大姐嫁给新兴庄村一个叫贾玉才的孤儿，后来大姐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外甥只小我 5 岁。贾玉才这个人是跟随其父母从曲阳那边逃荒来到新兴庄村的，后来在他 8 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也随后撇下他不知去向。是新兴庄村的基层政府收留了这个孤儿并供他上小学直到高中毕业参军。又是历史的巧合，他与我大姐是高中的同学，在他参军入伍后不久便给我大姐写了一封信，从此建立起恋爱关系。他在新兴庄村可以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从部队复员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又是村里的政府无偿给他们建起了三间土坯房还打了水井，弄起了院墙。后来因为大姐夫是村子里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高中生，还当上了村里的会计。不管怎么说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也同样是党的恩情在这个孤儿身上的充分体现。

因为我是在母亲 39 岁的时候才出生的，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也是这个不幸家庭将来唯一的希望，父母和三个姐姐对我都格外的疼爱，生怕我上学后受到与姐姐同样的遭遇，便把我送到大姐所在村子的学校开始上小学。

我在上学之前是没有名字的，父母和家里人只管我叫“铁蛋”，而且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社区里一些上岁数的人们依然不知道我的学名叫谢强，还只管叫我“铁蛋”。

第一次到学校时的情景一直到现在也无法忘掉，尽管那时候仅仅是一个不到 7 岁的小孩子。

团结村距离大姐家所在的新兴庄村第一生产队有 3 公里的路程，中间隔着一个村子叫塔宣村。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自行车，来往都是靠步行，父亲提前几天就把我送到了大姐家里。

一大早起来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吃了点东西就背上大姐亲手给我缝制的书包跟着姐夫出了家门。朝阳把路旁梨树的叶子照得金灿灿的，让人感觉到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

学校距离我大姐家大致有 300 米的路程，我却生生地跟着大姐夫贾玉才来到了新兴庄小学排队等着报名。伦到我的时候老师首先问家庭出身，我姐夫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富农”。当问到姓名的时候，他又随口说道“谢铁蛋”，看样子老师无法接受这个名字，只见姐夫稍加思考后就又脱口而出，“那就叫谢强吧”，就这样大姐夫给我起了一个“谢强”的学名一直伴随我一生。那时，我姐夫给我起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希望将来我们

姓谢的一家人要走向富强，也更希望我要坚强。

但是在那个陌生的村庄里也同样呆不下去，因为家里特定历史环境下也造就了我性格孤僻和软弱的缺陷，所以也常常受到学生们的欺凌。这是一个盛产鸭梨的村庄，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梨树，据说大一些的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有时下课以后我就躲到枝繁叶茂的梨树上，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问题。学校有时也组织学生参加批斗会，但规模不大，学生们主要只是跟着喊喊口号以烘托气氛，也有不少学生为追求积极上进而向被批斗者踹几脚或打上几拳，这些情景映入我的眼里让我感到心酸，也让我想到了妈妈遭批斗时的情景。

在那里勉强着上学才几个月的时候，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老师突然让我们把语文课本中所有林彪的形象一律用铅笔涂黑。因为头一天还是毛主席亲密战友的林副主席怎么第二天就成了罪人，让我们这些小学生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弄清楚其中的各种奥妙，仅仅是在后来知道了林彪谋害毛主席而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的沙漠里。随后学校里也有一些相应的动作，主要是在教室里刷写了很多标语，内容全是毛主席语录，比如“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鬼计。”

第二件事是林彪出事后的当年冬天，也就是 1971 年的冬天，课余时间在我低头不语、坐在教室里发呆的时候，有个叫小柱的同学“玩笑”开大了，竟然把炉火中的一个煤块夹放到我的脖子里，一下子造成严重的烫伤。还好，肇事的学生家里给承担了全部医药费并表达了歉意。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进学校的门了，大姐只好把我送回了团结村的家里养伤。烫伤痊愈后不管家里怎么劝慰，我死活也不想上学了。辍学在家里一呆就是好几年，那段时间里只有高小文化的父亲找来旧的小学课本教我学习算术、学语文，还给我讲述他当年参加解放军后那些行军打仗的故事，还告诉我家里所遭受的一切都是被人冤枉的，让我相信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并且不断地告诫我只有学习好了将来做了大官才能证明爸爸、妈妈是清白的。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那是一种低俗的教育方式，但完全可以想象那时的父亲是以一种多么无奈的心情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在父母看来也只有我将来做了大官，才能洗刷他们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但后来我还是个不争气的不孝之子，自身都无法保障了，凭什么还能做大官，真是很可笑啊。

就这样我的父亲在繁重的下地劳动之余还要给我充当“小学老师”，同时我也靠自己动脑筋进行自学，当然那个时候我还跟本不知道“自学”这个词汇，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自学。在看书、写字厌烦的时候，我就呆呆地看着母亲纺绵花并聆听母亲讲述那过去的故事。有时就观看母亲织布时的动作，听那织机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母亲也去到生产队上工的时候，我就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看书了，闷得慌了就跟家里那个小白狗一起玩，有时在小白狗生了小狗崽子的时候，与它们在一起就会玩地更开心。

有一次曾经在批斗大会上主持斗争我母亲的那个村干部来到我家，一下子把我吓坏了，小白狗也不停地狂吠。那个人抄起家里的铁锹不由分说就朝我的小白狗身上打来，我下意识的让它快跑，但还是重重埃了一下子，差点让我的小白狗瘫痪了。狗狗随后发出痛苦的惨叫声，真得还不如让那一下子打在我身上好受呢。把狗狗打死了，连跟我玩的伙伴也就没有了，看到狗狗一瘸一拐的样子，我伤心了很多天。我偷偷把父母给我的那些点心什么的好吃的东西全都给狗狗吃了，好让它补补身子能早一天站立起来。

第六章　家乡的小学与索命的传单

但是父母知道将来要读高中、上大学首先还要升入初中才行啊，不进学校怎么办呢？

随着“文革”后期的政治风波越来越小，人们似乎对“人整人”的作法也感到厌倦了。在这种背景下，父亲找到了团结村小学的校长求情并介绍了我的情况。那个时候正是批林批孔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学校依然是由贫下中农来管理，校长虽说不识字，但对我们的遭遇还是很同情，就收留并安排我进三年级学习。很快我就融入到这个新的班集体中，因为学习成绩出色，总是受到老师的表扬。

没多久一首儿童歌曲不论在村中高音喇叭里还是在学校就广泛传唱开了，歌词主要内容是“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对于像“克己复礼”、“复辟”这样的词汇当时对于才 10 来岁的我还无法真正理解它们的涵义，只觉得大家都在批判那一定就是指不好的东西。在学校组织的批林批孔节目表演中，老师还让我与同学一道演出了快板书，内容至今记忆犹新：“驴粪蛋，马粪球；林彪是个修头头；反马列，信孔孟；投奔苏修当走狗……”

但是做为一个小孩子的我，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依然存地，这表现在最初还不能加入红小兵，也就无法像其他同学胸前佩戴红领巾。学校组织政治方面的讨论会都要把我与四类分子的孩子们留下来，不让参加，甚至到清明节的时候，学校组织给烈士扫墓都不让我们参加。学校对我本人最大的一次政治迫害发生在 1975 年 4 月蒋介石病逝以后的当年夏天，就是台湾当局大规模向大陆投放气球传单的那一时期。一张小小的国民党传单差点要了我的性命，所以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当时那种可恶小传单的时候，仍心有余悸。

这一时期好像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那一套不时兴了，团结村小学来了一位有文化的新校长。

那时候学校曾停课一天，校长发动全校的几百名师生外出捡拾从台湾飘过来的那种像邮票大小的传单，当然把我这个“富农”子弟与几个四类分子的孩子留在学校里，不让参加，记得那天校长宣布总共捡到了 80 多张传单。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始找我谈话，问我怎么一张也没有交上来，他们认定是我把传单都藏起来了。不知道学校方面从什么渠道了解到我有个身份不明的舅舅在台湾的情况，他们便以此大做文章，他们要求我必须老老实实的交待问题，校长说，“你们家本来就是‘富农’再加上你们还有台湾的亲戚，这问题就相当严重了。你家大人与台湾暗地里有什么来往，是否藏有秘密电台，从你的反常举动中我们断定你说不准也有问题，同在你们铁路西的陈立同学已经交上了 3 张而你一张也交不上来怎么解释。”

我那个时候也只有 11 岁的样子，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我只知道父亲整天下地干农活，空闲时在铁路下边开荒种点什么庄稼，还在铁路斜坡上种些豆类的东西，母亲除了下地干活，就是在家里纺线、织布，还给我们做饭。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电台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只如实告诉他们说家里有一台不用电池的大收音机，从我记事儿就一直放在桌子上，妈妈说是在北京工作的二舅给买的，因为在台湾的大舅几十年了都生死不明，大舅不可能给我们买收音机，再说与台湾也无法来往啊。

校长对我说的那些不置可否，接下来就说要停我的课，交不上传单就不要来上学了，当天就打发我回家拿传单。我回到家里不敢把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上火，我便向父母谎称因老师们开会要放几天假。我偷着问三姐下地打草时是否看到过那种像邮票的东西，没想到姐姐说有一张，我高兴的一下子就蹦了起来。我如获至宝把传单拿在手里仔细瞧了瞧，终于看清了正面是蒋介石的像，背面是繁体汉字“向大陆人民问好”之类的一句什么话我记不清了。我告诉三姐我要拿这张传单交给校长，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只见三姐一下子就把传单夺过去撕了个粉碎，并以训斥的口气冲我说道，“这种东西拿出去给人看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你还敢给校长，会惹大祸的。”

好不容易抓到的这根救命稻草就这样让三姐给弄断了，我一时急的大哭起来，然后才把学校逼着我回家拿传单的事情讲给了姐姐听，这一下姐姐也对刚才的鲁莽举动追悔莫及，姐弟俩无奈地抱头痛哭起来。之后姐姐安慰我，说会

继续帮我在地里寻找，我拿不到传单也无法到学校去了，急得我整天也泡在庄稼地里找传单，接连两天过去了，依然连个传单的影子也见不到。

第三天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依然漫无目的，四处游荡着找传单，不知不觉中就穿过了小铁路走到了前进村（就是现在夏庄子村）冷冻厂后边的大水塘附近，这个水塘是专供冷冻厂排废水用的，比学校的操场还大，以前听人说有一房多深，淹死人事儿时常发生，由其是“文革”闹得最凶的那段时间里，有些经不注折磨人经常来这里往下一跳来了断人生。

这个时候已临近中午时分，夏日里的阳光把我晒得满头大汗，感到又累又饿，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来到了水塘边上，看到有人在水里悠闲自得的游泳嬉戏，看人家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不由得 感到伤心起来，好几天了我还没有捡到传单，而捡不到传单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出路，将来怎么给父母申冤啊，即然别人可以往下一跳了断人生，我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一个可怕的念头已经在我还清醒的头脑里在不断的闪现……

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只感到眼前一黑就一头栽到了水塘里，水的冲击让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我心里默默地重复着一句话：“爸爸、妈妈，你们不孝的儿子实在对不起你们了，我只能下辈子再做你们的儿子来给你们申冤了。”我的口鼻已经呛了很多水，两只手还在水里不断地挣扎……

又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人家的坑上，脑子逐渐有点清醒的意识，难道自己真得没有死啊，是不是做了一场噩梦。我心里这样想着，眼睛也看清楚了这里的环境，那正是父母在夏庄子村的一户蒋姓朋友的家里，这一家就住在水塘的西侧，因为我跟着母亲好几次来过这户人家串门，我也知道这是一户与我们有着相同遭遇的不幸家庭，母亲几年前还做媒让蒋家大女儿嫁到了我大姐所在的新兴庄村，我还跟着母亲一同吃酒席了呢。蒋大妈慈祥的面孔在冲着我微笑，嘴里还不断地在责怪我，“傻孩子啊，你妈给你起了个铁蛋的小名就是希望你坚强啊，你怎么就不替你的父母着想啊，他们把你看做心肝宝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不就是等于要你父母的命啊。”

蒋大伯和蒋家两个大哥哥也站在一旁注视着我，我心里明白一定是他们把我救起来的，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充满泪水的眼睛带着一种无限感恩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生怕他们离开我。就在这时候，蒋家小儿子也放学回来了，他只比我大 2 岁。

实际上我们两家的距离不足 2 华里，就隔着个小铁路，这条地方窄轨铁路是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从定县火车站附近通到曲阳县的灵山镇，全长有 60 公里，主要用来运送灵山那边出产的煤炭还有两县交界处我外公所在的孟家庄村附近的建筑沙土。

蒋家人怕我的父母着急，就赶紧吩咐那个小哥哥要一路小跑着穿过小铁路到我家报信，并再三叮嘱不要向我的父母提起我落水的事情，就说铁蛋儿愿意在哥哥家里住一天，让他们都放心。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以后，蒋家大伯和大哥哥就带着我先回家拿上书包，我心里还有点不踏实就又叫上我大伯家的三堂哥给我壮胆，我们便一起来到团结村小学找校长理论。他们把那个有文化的校长狠狠地数落了一通，“你做为校长怎么就把一个孩子逼上绝路，你把他逼的走投无路后跳水塘了你知道不？你们要的那种传单他也确实没有捡到，你们也不想想他要是捡到了留着那东西有什么用，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孩子，他还不懂政治，至于他父母有什么问题与这个孩子无关，希望你们学校方面不要把这个孩子也扯进来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那个校长可能也觉得理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而且经过校长特许，到后来我竟然做为“富农”子弟还如愿地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由于学习上努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上的第一名，这让老师都感到有点嫉妒，因为老师的女儿与我同桌，学习成绩挺糟糕。后来老师还让我担任了班长，我还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不知有多少次拿着奖状回家给父母报喜，后来在墙上共贴了多少张奖状也记不清了。

到后来父母还是知道了我因交不上传单而在夏庄村的水塘里出了事，按母亲的性格还要找学校要个说法呢，因事情已经得到解决况且我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很多政治上的荣誉，家里人已经很满足了，母亲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切，并为失而复得的儿子感到由衷的宽慰。随后母亲到商店里买了好多礼品送到了蒋家人那里，以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在这一时期里，学校真正用在教学上的时间并不多，而我的印象中各种政治活动可能要占用大半的时间。批林批孔运动好像前后折腾了有一年时间，学生很多时候被用在开会、游行上边，还要学生们画林彪和孔老二的漫画，看谁画得有创意、看谁把他之间的联系描绘的更贴切就会获得学习用具方面的奖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到 1975 年的时候又来了"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到底谁是谁非，做为一名小学生的我依然无法判定，因为我无法获取真实的信息来源，只是听到广播里和电视上人家怎么说咱们就跟着怎么做。顺便说明一下，那个时候位于团结村的企事业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机，我们经常在晚上找地方看电视。这一时期学校用在政治方面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从前，组织到街上参加大规模游行的次数也多了起来，"批邓"大会也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文艺部门在团结村小学演出"批邓"的节目中，有一个山东快书叫做《一锅黑》至今印象深刻。内容是说邓小平走资本主义死不改悔铁了心，满脑子都是黑东西，还说黑肝、黑肺满肚子黑什么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是滋味的感受，邓小平当真就像他们说的那么黑吗？我回到家里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想听听她的看法。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小，还不太懂得人情事理，反正你妈认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不想让好人活的运动，邓小平也不一定就是坏人，也可能邓小平的做法就是想让更多的好人能活下去，将来谁是谁非也可能我这辈子看不到了，想信你应该能看到。"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当时条件下能说出这样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朴实无华而却又透露出真理的气息。

第七章　打赌风波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重蹈姐姐当年上学时遭人追打和辱骂的覆辙。就这样我在团结村小学还算度过一段快乐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我与陈立和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二儿子是好朋友，还有我的四堂哥，他高我一个年级，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陈立是先前那个瞎眼队长陈国峪的侄子，实际上他的父亲兄弟三人可以称得上是"队长世家"，因为他们都轮番当过生产队长，只是陈立的父亲陈国保有口吃的毛病，当队长的时间相对短一些。

母亲时常教导我，除了要学习好，还要与同学处好关系，不要惹是生非，要老实本分。我记住了母亲的话，时时都在约束自己。但就是自己时时都在小心谨慎的生活中还是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前夕又给家里惹下了一场大祸。这个时候我已经上到小学 5 年级，等到第二年就要升初中了。

那个时候不管发生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政治的阴影，他们一定要首先与"富农"挂钩，再以阶级敌人上线。也弄不清楚是大人还是学生恶作剧，在墙上偷偷写一些与时政相勃的话，那个时候叫"反动标语"，简称"反标"，比如有人写了"打倒江青"，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人写了"打倒华国锋"，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事情，都要经过派出所调查，而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成为首当其冲的调查对象。我也真为自己捏着一把汗，我心里知道自己总是小心谨慎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但如果他们硬说是我做的，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啊，因为那是一个强权政治的年代，如果没有调查结果也真无法保证他们就不会找个无辜的替罪羊交差。记得有一次调查结果是某个贫农家的孩子所为，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个家庭的直系亲属也没有其它政治背景，事情就算过去了。如果是富农家的孩子所为，那事情可就大孑，至于大到什么程度，我也不好确定，只是老师说的那些什么上纲上线的话相当吓人。

1976 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上午，学校已经为夏收农忙季节放假了，一场小雨过后又出现晴朗的天空。这个时候同学陈立背着一个筐头来找我打猪草，我们一同来到了野外割草。毕竟孩童的玩皮没有全把心思放在割草上边，后来就都放下手里的活玩了起来。我们彼此手上都拿了一种外表带刺的植物果实弄着玩。记不清谁先提议说吃下了这东西就给谁 2 分钱，这肯定应该是一句玩笑的话，拿在手里都有点不舒坦更何况是吃呢。我没有在意，后来就把手上的那东西扔掉了，继续割猪草。但后来陈立跑到我跟前说他吃下了那东西，向我要 2 分钱，那个时候的 2 分钱可以买到一支铅笔，我真得有点不相信，就问他是怎么吃下去的，他说是弄开外皮后把里面的种子吃掉了。我心里依然半信半疑，我身上没有带钱也就没有给他钱，后来就各自回家了。

谁想到第二天陈立和他的父母就找上门来了，还一直骂骂咧咧。陈立二话不说就先打我几个耳光随后就向我催讨那 2 分钱，他的父母也是怒不可遏，说我跟家里大人预谋好了要害死他们的儿子。我母亲听到声响也出来了，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陈家人连拉带拽要拖着我们母子二人到大队上说事儿，硬说是我们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要置他们的儿子于死地。更有甚者他们把我大舅在台湾的事儿也派上用场了，大吵大骂地说什么，“这不是你们国民党的天下！这是共产党的天下!”

现在想起来他们这种话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啊。恰恰正是他们陈氏家族中的“队长世家”，尤其是那个瞎眼队长陈国峪玷污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崇高的名称，正是他们给共产党的天下抹了黑，而且直到现任的队长陈国堂依然紧紧跟随着不讲原则的邪恶势力胡说我们的“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而另一方面也正是我们从父亲那个时候就为共产党打天下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到了我这一辈依然在为维护共产党的天下而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默默地添砖加瓦。

住在后边大伯家的三堂哥谢国柱听到打闹声后也赶紧奔了过来，首先安抚陈家人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

原来是陈立当天吃下那植物种子后在下午就有了中毒反应，后经医院治疗才恢复健康。所有这些情况对于我本人和我的父母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发生在两个未成年人身上的事情，他们依然要与政治挂勾，要用“富农”说事儿，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情。母亲提议给他们物质上的赔偿遭到拒绝，非要拉我们到大队上去说清楚，陈立的父亲本来就是个结巴，加上气愤的样子更是一句话半天也说不完。

我母亲心里明白到了大队上事情就更复杂了，前些年在批斗会上仅仅因为我父亲站立的姿势不合他们的要求就遭到村干部的恶意攻击和打骂，那些早就泯灭人性的村官儿们什么丧良心的事都做的出来，再说他们早就想找我母亲的麻烦，现在又出了这等事，还会有好果子吃吗，所以我母亲死活不肯跟陈家人去大队。这时陈立依然追打着我要那 2 分钱，但我给他他却不要，反而对我殴打地更为猛烈，我只有抱着头任凭他的拳脚打在我身上。那个时候三堂哥也就不到 20 岁的样子，他看到陈立追打我，急忙过来劝阻并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了一把钱塞到他口袋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幕，尽管看样子多是一些 1 角和 2 角的纸币，我们兄弟的情意还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大伯家的三儿子是个能说会道能执事儿的人，就这样三堂哥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并向陈家承诺下来由他主持解决问题一定会有个圆满的结果，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打赌事件平息之后，生活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但平静的生活随即又被下半年的灾祸和政治事件推到风头浪尖上，在这其中也不免喜忧参半，因为最后发生了一件标着一个恐怖时代结束的重大事件。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 7.8 级强烈地震。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1976 年 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将“四人帮”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结束。

第八章　同室操戈与内忧外患

我的爷爷和奶奶共有两个儿子，除了我父亲谢金更，还有个会木匠手艺的大伯叫谢金锁。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但出于对历史的忠实，我只能凭着做人的良心而在此客观公正地讲述我父亲兄弟两家人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 年我们举家从西关北街般回杨庄子村原址，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与大伯这两家人的关系一直就处在一种微妙有时甚至是一种敌对的状态中。而那种不正常状态一直持续到我母亲离世前后一段时间里，两家人的关系才真正在血浓于水的基础上得到全面的改善。

父亲与大伯之间性格上存在差异。大伯虽说也是个老实人，还有个"老蔫儿"的绰号，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村里还算得上吃得开的人，他很会利用人迹关系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且还会讲出一连串的什么道理来；而我父亲完全是一种傻老实的精神面貌，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前途或是什么较高层次的追求，战争年代他只会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而不想谋求发展，只想着打完了仗好早点回家种地，而回家务农以后依然没有军人曾有的气概，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别人把他给卖掉的话，他还会帮人家数钱呢，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本分的人。

伯母在村里的外号叫"大白脸"，从那张长方形大脸上就真得能够表露出她的性格具有奸诈和冷酷的一面，有些事儿上为达到目的，她会以不择手段的方式去实现，乃至丢掉亲情甚至是丢掉良心都行，在社会面上她会见风使舵，有时不惜丢掉人的尊严而奴颜婢膝以保全利益；我母亲的性格在为人处事上与伯母就完全不同了，她只会坚持一种做人的基本信念，那就是"舍生取义"。

鉴于两家人的思想或者说信仰方面大相径庭，不论他们兄弟之间还是妯娌之间的矛盾时常会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

1956 年搬回杨庄子村以后不久，我的爷爷找了一个老伴，那时候我爷爷是由我父亲和大伯轮流赡养，而伯母就是不同意爷爷找老伴，并以不再赡养相要挟。无奈之下兄弟俩商量在一块空地上另给我爷爷和他的老伴盖两间房，让他们单独生活。但是伯母拒绝出人出资，就这样我父亲一个人全承担了下来而且还亲自动手给爷爷建房。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母依然跳出来进行捣乱，我父亲在前边砌砖，伯母就跟在后边拆墙，父亲一气之下打了嫂子几下。这一下子可惹了祸，伯母要起了泼妇的把戏来，她自己在脑门上抓了几把弄出了几道血口子，硬说是我父亲打的，不依不饶。

房也盖不成了先弄着嫂子去医院疗伤吧，第二天伯母又把事情告到了村支书那里要求赔偿。后来在村干部调解下，给了她一定数额的医疗费和营养费才算告一段落。眼看着房子就要建起来了，伯母又不依不饶了，扬言要找她娘家的人来打架，而大伯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听之任之。后来，伯母还真得把她娘家的兄弟几个人找来了，我母亲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赶紧到西关北街把我姑姑找来当说客。后来在我姑姑以讲事实、摆道理的耐心说服下才把事端平息下去。从此，亲兄弟两家也就成了仇人，不再有什么来往。

爷爷去世后那个院子里的房屋在 1963 年的洪水中被冲毁了，那块地方就由父亲一直占用下来并栽种了树木。到 1985 年以后我养猪的时候，也在爷爷留下的那个院子里建满了猪舍，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伯一家从未对那个院子提出过分割的要求。从我的父亲和生前的母亲以及后来从知情人那里得到的说法是因为当年给爷爷建房和赡养的问题，大伯一家后来觉得没有脸面也没有理由再争取对那个院子的所有权，尽管是爷爷留下的财产。1993 年父亲打算出卖那个

院落的时候，老实本分父亲主动找到了大伯提出平分爷爷留下的财产。1994 年院落及附着物出手后，我们分得 6000 块钱，这些钱除了偿还部分债务，余下的也全都花费在我刚刚开始的集邮事业中。

我父亲和大伯是在 1947 年定县解放后土改的时候分家另过的，两个家庭的户籍成分都是中农。上世纪 60 年代，当两家人发现在杨庄子村都成了“富农”的时候才又临时走到了一起。那个时候我家原有的土改时的户口薄在 1963 年的洪水中丢失了，而大伯家还保留着当年的户口薄，上面清楚地显示家庭成分是中农。但是，村干部在铁的证据面前依然硬说是“富农”，一口咬定就是西关北街介绍来的，这种简直让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对村干部来说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按知情人的说法就是村干部嘴里了吃了大粪，随口胡说谁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归根结蒂还是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幕幕人间悲剧，也恰恰是专制赋予了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如同奴隶主对奴隶才拥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为洗脱被强加的“富农”，经过一连串的申诉而到处碰壁之后，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合”到来了，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再奢望公道无疑就是痴心妄想。善于审时度势的大伯一家提前找到了自己免遭“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保护伞和派系争斗中某些可以利用的靠山，继而依然把他的亲弟弟一家当做仇人。就这样，大伯一家在整个“文革”时期政治上没有遭到揪斗，经济上没有任何损失。只是两个堂哥在婚姻和上高中的问题上因为“富农”的原因遇到一点小麻烦，仅此而已。

在我们一家人大祸临头的时候，大伯和伯母竟然站在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立场上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幸灾乐祸。明哲保身的做法可以放弃人性和亲情，这一点在整个文革时期并不会让人们感到奇怪。

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经济上要置我们于死地完全是出于报复目的，因为同为“富农”的大伯家的闲宅院比我们的还要大，人家的财产可以毫发未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最近几年里，在我走访知情人的过程中，都证实了原革委会主任对我们进行疯狂报复的事实真相。当年曾经保护我大伯家免遭批斗厄运的人正是大伯最好的好朋友陈铁山。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陈铁山来自另一个陈氏家族，与前面提到“队长世家”中的三个陈姓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当时条件下，这个陈铁山虽然没有保护我们，但也从来没有害过我们，况且他还告诉了我很多历史的真相，同样是我们的恩人。他是这样给我说的，“当时我也想过帮助你们，只因为你父亲与你大伯的关系很糟糕，再加上你父亲从来没有找过我，我也并不是缺事儿管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责备人家见死不救，只怪我父亲在当时条件下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们进行交住。

那个时候陈铁山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是一个派系的，刘德栓还是他们的领导者和重大事件的策划者。在派系斗争中的一起枪击杀人案中，狡猾的刘德栓给自己留了一手，在前往杀人现场的路上他借口说回家拿个饼子吃而逃过了“文革”结束后的刑事处罚。而其他包括陈铁山在内到过杀人现场的五个人在 1980 年被逮捕，随后被判处有期徒刑 5 至 8 年不等。

至于那个瞎眼队长是如何与我母亲结怨的，陈铁山也同样把真相告诉了我。事情最早发生在 1960 年最困难的吃食堂时期，做为生产队长的陈国峪也管理着食堂，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几个妇女轮流在那里做饭，好几个妇女都被陈国峪占有了，就只有我母亲死活不依他。我母亲只在食堂干了三天就再也不去了，当时人们还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那个年份正赶上还苏联债务和自然灾害时期，人们已经到了吃树叶、啃树皮的地步，在食堂里做饭是可以得到饱餐的好差事。正是我母亲当年拒绝了陈国峪的流氓行径才导致后来他陷害我母亲偷麦子的事，从而有了现代版的窦娥冤。

陈铁山还有另外几名知情人详细透露了原定县城关区的区长为什么会把怀着他骨肉的张春玉送给杨庄村的黄耀贵为妻的历史真相。原来当初 20 多岁的黄耀贵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男人，他在某医院干护理工作的时候，猥亵并强奸了一个 40 多岁的妇女，人家丈夫和孩子们不依不饶把黄耀贵打了个半死，后来打人的受到派出所的处理，黄耀贵治疗后被人抬回了家，但在医院的工作因他的流氓行为也给丢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区长才抓住时机就像扔掉一件旧衣服那样把张春玉送给了黄耀贵为妻。张春玉所走过的是依靠她出卖肉体赢得了原定县城关区区长王某的

欢心，才得以一步步走入政界进而混入党内的丑恶历史。想当年她仅仅是个在政府里边端茶倒水的女服务员，为了实现她政治上的野心便主动地给那个区长投怀送抱，即便是她做了杨庄子村黄耀贵的妻子以后依然没有中断与那个区长所保持的性关系，直到后来又是在那个区长的关照下才得以入党继而当上了书记。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执政党的党章中虽然明确了党员的纯洁情，但是像张玉春这类痞子掌握领导权的还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同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论过去和现在，试想有这样的险恶群体把持政权，社会还能有公正存在吗？没有了公平和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同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我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在我们两家关系恶化的时候，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微妙之中。

在我上小学和初中的那段时间里，比我大 2 岁的堂四哥与我的关系也伴随着大环境时好时坏，有时根本就不来往了，甚至有时成了敌对的冤家。但是我母亲对待大伯家的孩子们始终以诚相待，我母亲还成功的为堂二哥做媒，让自己亲戚家的女儿嫁到大伯家里。那时候女方那边嫌弃家庭出身是“富农”会没有前途，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才成全了堂二哥的婚事。而到了堂三哥结婚年龄的时候，我母亲又通过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乡下很出色的姑娘，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份上，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我母亲与伯母妯娌俩关系再度恶化，伯母硬是棒打鸳鸯拆散这门婚事，伯母还对外放出风声说再多么出色的媳妇也不能让我母亲说成。

为了自身的利益，伯母还是一个具有“高瞻远瞩和组织才能”的人。早在 1970 年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亲侄女介绍给当时是生产队长的陈国堂为妻，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陈国堂依然是杨庄子社区五队的队长而继续跟在那些恶势力的后边洋洋自得。但是伯母的这个亲戚队长并没有给大伯家带来多大的利益甚至一度还成了仇家。本来大伯一家在“文革”时期没有受到任何的经济损失，但是在 1980 年前后落实政策时期，伯母依然跟着我们一道瞎跑，还想利用她侄女女婿的亲戚关系好退还我们的财产，然后她也能分得一碗羹。但是她的美梦破灭了，因为陈国堂根本就不买亲戚的帐，为了继续长久地当他的队长，便昧着良心任凭那个女书记张玉春怎么摆布都行，到最后就是那区区 240 块钱，还是在我母亲去世后，做为队长的陈国堂才给我们。

到 1984 年我被严酷社会现实逼到精神崩溃的时候，血浓于水的亲情才真正在两家人身上体现出来。大伯家的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看护着我，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牺牲自身的利益而全力以赴来拯救我的命运。因为我曾经是父母心里唯一的希望，而到这个时候了，我老实本分的父亲已经束手无策了，大伯和伯母以及所有的堂哥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希望之星就此陨落，他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在经过治疗后最终摆脱了心理疾病的折磨。

我是于 1977 年升入初中的，因当时 2 年制的初中教育还用的是地方教材，总感觉没学到多少东西，从而放弃了 1979 年升入高中，转而复读了全国统一教材的三年制初中的后 2 年，到 1981 年才进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如今大伯家的四个儿子有两个继承了父业，二堂哥和四堂哥做了木工，四堂哥的一个女儿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电子商务英语专业，现在河北省天然气公司任职。大堂哥曾经为人打工，现已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的儿子是中国矿业大学的博士。在我的印象中尤其三堂哥是个乐于助人，性格开朗的哥哥，不管在什么时候，每当我遇到危险或处于困境的时候，他都会站出来保护我、关心我。但是，这样一个好心的哥哥在 1987 年的一场车祸中失去了生命，年仅 32 岁。伯母在卧床多年以后于 1996 年病世。伯父与我的父亲一样热爱劳动，在 2000 年秋天已经 78 岁的时候还依然做木工活，在骑自行车到商店买钉子的路上遇车祸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第九章　中共政权建立和新中国建设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我的母亲不光是自身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就连她的直系亲属因我家“富农”的关系而在参军、入党、提干等多方面受到很大影响和牵连。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对一个人的政治审核是极其严格的，亲属那边的相关单位来团结村调查的时候，村干部们每次都会昧着良心开出我家是富农的证明信，就这样我母亲的直系亲属因为这个“富农”的背景而受到牵连，不光贻误了他们的政治前途还从经济上给他们造成损失。

我母亲王彦国祖籍在孟家庄村，我的外公、外婆家共有他们兄弟、姐妹五人，都是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中做出一定贡献的革命者或知识分子家庭。

大姨夫曹兵安是中共党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立下赫赫战功，抗美援朝的时候是营教导员。不幸的是大姨夫在 1950 年入朝作战的当年冬天就战死在朝鲜，尸骨没能找到。当时部队有关部门将曹兵安列入了失踪人员名单，这又使大姨一家人对失踪的大姨夫渴望他生还的奇迹能够出现，希望他能做为被俘人员在交换战俘的时候平安归来。人民政府对大姨一家作为烈属进行优抚，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安置二表哥曹占斗入伍，到他父亲生前的部队服役 10 年。转业后分配到唐山工作，后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使得政治前途没有进展，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二表哥才得以但任某国有企业的党委书记。大姨王彦香守寡 54 年，于 2004 年去世，享年 86 岁。

这里提到了朝鲜战争，不得不说一下本人的想法和看法，但总体上我同意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评论。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历史文献的开放，许多历史事件也还原了其本来的真实面目。朝鲜战争的性质纯属朝鲜内战，但因为美国和苏联的插手，使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局部两大敌对阵营的战争。用分析家的话说：中国参加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主观上中国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世界，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客观上使中国与美国为敌，而使中国的敌人日本和苏联从中渔利。朝鲜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自己，帮助和壮大了敌人。几十万子弟兵死在朝鲜，而由此造成的长达几十年的中美对抗可以说，朝鲜战争给中国造成无穷的祸害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才真正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在这里也可以做几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中国不参加朝鲜战争，可能就不会欠下苏联巨额的军火债；美国可能不会派第七舰队长期保护台湾，当时靠蒋介石的海空军阻挡不了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台湾也可能像像海南岛一样被解放了；美国不会在经济和军事上扶植日本，日本就是靠朝鲜战争得到发展和壮大；中国可能在五十年代就和美国建交了，中国可能会更早的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可能比现在更文明、更发达、更强大；如果金日成政权被消灭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并不是什么坏事，现在和中国接壤的是大韩民国而不是那个所谓民主主义的朝鲜，韩国显然不会挑衅中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就看不到当今朝鲜人民的痛苦了。

三姨王爱国的丈夫张金锁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留学苏联，回国后在井陉煤矿先后任工程师、矿长兼党委书记，他在为新中国的矿山开发和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三姨同样因受我家“富农”的牵连而无法入党，工作上没有什么进展，最后只落得当家庭主妇的份儿上。

大舅王彦忠早年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1946 年从沈阳赴台湾搞情报工作，因时局的变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杳无音信，直到 1982 年春天才从加拿大辗转来信报平安，并于分离 43 年后的 1989 年首次来大陆于家人团聚。但是我的母亲早在得到她大哥消息的当年冬天就含冤离世了。长达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可以想像当时处于疾病煎熬中的母亲想见她大哥一面的愿望是多么的迫切啊。

二舅王国忠早年在解放军的兵工厂从事炸药的研究和生产，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爆破炸药，为扫除挡在人民解放军面前的一座座碉堡提供了后勤保障。当年在我军攻克的一座座城市中，同样也包含着我二舅所做出的那份贡献，解放后他在北京工业学院（前身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延安自然科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 ）从事民用炸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因受我大舅这个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证实身份的海外关系的牵连，直到 1987 年才

得以入党，之后任职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工程系某实验室主任。

在他们兄弟姐妹中，只有我的母亲王彦国嫁到了一个在中国社会里即传统又朴实的农民家庭里。因受我母亲家族中多为革命家庭的影响，父亲谢金更在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反攻时期的 1947 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当了一名工兵。历史的巧合是那么的具有戏剧性，在当年秋天围攻徐水等地的战斗中，担任爆破手的父亲所使用的炸药正是来自我二舅所在的兵工厂，那时我军的兵工厂主要设在革命老区阜平一带的山里。1948 年冬天，在解放张家口的战役中，父亲所在的工兵营担任架桥任务，在刺骨的冰水中父亲一人顶几个人用，就是凭着对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对解放全中国的迫切憧憬，他不让战友们替换他，在冰水中默默地坚持到最后。事后我的父亲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受到部队领导的表彰，但是一条腿的膝关节落下不能弯曲的毛病一直伴随到现在。

因父亲对土地怀有特殊的感情，解放后他选择了回乡务农，直到现在已是 81 岁高龄了依然拖着残腿开荒种地。我父亲似乎忘记了半个世纪前因种下了几百棵树而给整个家庭所带来的灾难，近 10 年来他又一次在当年和其它荒僻地带植下了足有 150 棵杨树，这些树如今已有碗口粗了。每当我们看到这些浸透着父亲汗水的树林，伤感之情便油然而生，不得不让我们暗暗地祈祷历史的悲剧别再重演。

我母亲那种好强、坚毅和耿直的性格以及那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道德理念从她的家族那里带到了杨庄子村。

“文革”时期，我们每年在生产队的劳动所得被全部扣除偿还那个 600 块钱的罚款，如此以来维持日常生活的钱从哪里来啊？母亲是个吃苦耐劳的农家妇女，起早贪黑地纺线、织布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除了用以解决一家人穿衣、被褥等问题，还可以用多余的粗布换取更多的棉花而获得那点微薄收入贴补家用。

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半夜里醒来听到母亲纺线时那纺车发出的嗡嗡声。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凌晨时分，我起来小解，发现母亲用棉花擦拭脸颊，定睛一看是在擦流血的伤口。原来是电灯泡突然坏了，她摸黑换灯泡的时候从桌子上摔下来受了伤，但她手里的活依然没有停下来。那个情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让我终生难以忘怀，那一时刻真如同无数把尖刀扎在我的心坎上，我擦干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后来听说村里有个女干部家里需要一匹粗布，要用 1 斤棉花换母亲的 1 斤布的方法折算，尽管不是白拿还是被刚毅的母亲拒绝了，从重量上看 1 比 1 似乎是件很公平的交易，但从道义上看不免有点残酷和仗势欺人的味道，因为母亲把 1 斤棉花变成 1 斤布的过程中除了自然损耗，还要付出流血、流汗的代价才能实现。得罪了这位女干部，父亲为此跟母亲闹了好几天，因为父亲知道，母亲给家里惹的祸已经很多了。在那个年代诸如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之类的事件对我这个家庭是很平常的事情。恰恰在“文革”结束 2 年之后，这位女干部成了杨庄村最大的官儿，那才真是屋漏偏逢连绵雨啊，父亲得罪了刘德栓遭到经济上的报复，母亲得罪了那位女干部所遭受的是一种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而这种报复的高明之处在于暗无声息。

第十章　拨乱反正时期没有给我们平反

“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之后，我们终于看到了黎明前的那道曙光。满以为冬去春来，好日子就可以开始了。然而，我们所企盼的公正仅仅是一 个虚无缥缈的愿望，而这个愿望直到快 30 年后的今天依然还没有能够实现。

我们最早找到了“文革”后官复原职的党支部书记黄立虎，要求平反。他依旧说“富农”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

下来肯定得有个说法，解决历史问题。但是他始终不肯亲手给我们解决问题，而是不断推脱，说他已经不管事了很快就要退下来，让新上任的给我们解决问题，一直就这样拖着，不久新上任的女书记张玉春果然接替了黄立虎的职务。

到了 1979 年我们又向原定县政府有关部门申诉历史问题，以求讨回公道。县里的答复是：各村都要成立落实政策小组，　要我们回家等着。

的确，杨庄子村成立了以高中海为组长的落实政策小组。在处理我们的冤案方面依然没有进展，但做为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我们当时并没有搞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在当时条件下，我们所要求的各项主张并不高，远远低于当时国家所制定的落实政策的相关规定。对于政治上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以及人身损害方面，我们甚至没有提出平反的主张，我们只想让生产队把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还给我们。

我们全家也没有报怨“文革”时期的当事人刘德栓。我们心平气和的找到刘德栓，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把属于我们家的东西从生产队要回来。

但是刘德栓的做法真的让人匪夷所思，他在这个问题上俨然就是一个“文革”英雄的化身，他面对我们依然是一种耀武扬威、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且用一种蔑视和极端傲慢的口气说他“文革”时期针对我们家所做的那些事儿是在“维护集体的利益”，让我们随便到哪里去告他都行，打官司的话，村里给他报销一切费用……

“文革”当事人的倒行逆施，还有那个当年给我们制造“富农”原治保主任胡栏树的儿子胡庆山也已经在村基层政府里头做事了，只是个名气还不太大的村官儿，加上母亲曾得罪了现任书记张玉春所造成的后果，落实政策无望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党和国家制定的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原则在这些人的眼里竟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我父亲向来健康的身体还为此大病了一场，丧失劳动能力达半年，还花去了大笔医药费。就在父亲的病情刚有好转的时候，我母亲也随　之病魔缠身，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落实政策小组在没有实质性工作成果的情况下，做出总计赔偿我家 240 块钱之后，便草草收场。后来才知道这 240 块钱仅是从我家里刨走的那 12 棵树苗的赔款，而恰恰是这 12 颗由我父亲自己培育的树苗让刘德栓罚了我家 600 块钱，一家人白白为生产队付出了长达 10 年的劳动以及无端没收宅基地和那个被毁的 50％林地所有权等关键性问题，均以不了了之而告终。

即使这区区 240 块钱，在我母亲病情加重之时，村里也依然赖着不给。因为在过去的 20 几年间，一家人都是在母亲那边的直系亲属接济下活过来的，况且当初盖房等工程还欠下了人家大笔的钱款，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好再向亲戚借钱，母亲的病在无法确诊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的治疗。后来是在夏庄子村的张氏朋友资助路费的情况下才得以把我母亲送到北京，住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接受全面的检查和治疗，但随后医院宣布母亲的病为绝症。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的二舅替我们支付了住院期间的全部费用之后，我们带着病重的母亲无奈地离开了北京回到家里。

一场大雪过后的 1982 年农历 11 月初 3，我饱经磨难的母亲就这样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 58 岁，这时在村里好心人的协助下，经杨庄子第五生产队队长陈国堂同意，终于给了我们那 240 块钱，正是用这点钱以极其简单和低调的方式在村里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安葬了母亲。

第十一章　精神错乱中的复仇与崇高理想的破灭

但即便是遭受一系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我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依然倡导我们保持最大的克制，要我们相信党和

国家最终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那个时期，我本人在定县第一中学（后改为定州中学）读高中。那是 1981 年从全县 200 名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组建的第一个三年制高中。这个时候父母更是企盼我将来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以此来扭转杨庄子村曾经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在这种背景下，当我跨进高中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了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崇高理想。当时的这个崇高的理想首先是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另一方面就是只有自己当了记者以后才能有机会把父母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公之于众，到底是谁的过错好让大家有个公正的评判。

据后来了解，这一届特招的毕业生当年 95％以上都升入大学并成就了事业。

入学的第一年，担认我们班主人的是教化学的任其志老师，他 40 岁出头的样子，显得健康、有活力的高大身材，长方形的脸庞，浓眉大眼，还有一副眼镜没有见他摘下过，总体印象是一位学者的风度。他常住在学校里，有时回乡下的家看看，有好几次我与任老师在路上相遇，这才知道他的家就在与我们相邻的塔宣村。

因为我心理上受到过严重创伤，有时精神上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我曾一度提出退学的要求没有获准，后来就干脆呆在家里不到学校去了。事情发生在 1982 年的夏天，这个时候我母亲正在北京治病，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母亲，她已经骨瘦如柴，说话也吃力。母亲告诉我，她的病是胃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不要挂念。我只在北京呆了两天就返回了家里，把情况告诉了我的大姐，随后大姐和大姐夫决定择日去北京把母亲接回来。

此间我也决定不想上学了。

任老师派了大概有 6 名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学到我家里做我的工作，动员我回学校上课，同学中有后来到上海工作的黄军雄，有到定州市工商局工作并与我保持交往的孙会坡，其他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当时，我父亲在家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养了大量兔子，大大小小估计有 50 只左右，这些兔子在一个开阔的院落里自由生活，主要食物是父亲弄来的野草和树叶，没有兔舍，它们随处打洞穴居，洞口周边还长了杂草，被兔子吃掉了叶子，同学们都感到很好奇，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除去“文化大革命”被刘德栓没收的 9 分宅院，我们还有总共约 2 亩的宅基，同学们见这么大的面积只有我们父子二人，觉得不免有点凄凉的景象。

经过同学们的开导和劝说，我最终返回学校上课了。

像执政党拨乱反正、有错必纠原则下没有给我们平反的问题，还有张志新“反革命”一案的历史真相暴光后，联想到我们一家的遭遇，甚至让我感到恐怖的震撼。我的同桌同学叫黄军雄，来自行邑镇，他家庭出身也是曾经是富农，我们时常探讨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我母亲病情危重之时，他来过我家，所以对这位同学印象很深。后来他转学到李亲古中学后就失去了联系，在我离开学校多年以后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

我的班主任刘老教我们历史课，他曾经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安慰和物质上的帮助。

刘老师当初的生活条件并不好，离婚后他的爱人回了北京，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带着 2 个与我岁数稍小一些的孩子生活，为了安抚我受到伤害的心灵，有一段时间，他曾让我搬到他的家里与他们一起吃住。

有一天，班干部交给我 10 块钱，让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 10 块钱对一个学生不是小数目，学校一个月的伙食费才收取 9 块钱。看到我疑惑的样子，这位班干部忙解释说："这是刘老师给你办的助学金，每月 5 块，这是 2 个月的一起给你。"实际上我并没有申请过要助学金的事，完全是老师自己决定发给我的，这让我心里特别感动。尽管每月只有 5 块，但那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的钱了，因为那时候花五块八就可买到如今需要好五十块钱才能买到的《现代汉词词典》，我还用助学金中的钱花两块四买下了一本近 800 页厚的《世界近代史》等很多书籍。

后来老师动员我写入团申请书，经过思考还是婉言谢绝了老师的一片好意。高中刚入学的时候，我信仰了共产主义，但通过观察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又让我成为一个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加入相关的组织。

当时为了报答老师的恩情我把三姐夫给我的一本 1949 年至"文革"时期发行的信销邮票送给了老师喜欢集邮的儿子。当时我姐夫说那些邮票最多才值 50 块钱，但不管怎样礼轻情谊重，我实在拿不出别的什么东西来报答老师给我的关怀和恩情。

直到 1989 年在我失魂落魄的生活状态稍有改善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定州中学看望我的恩师。但是没有找到，经多方打听才了解到刘老师已在几年前搬回了北京，在大兴师范学校教书。我随即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当天夜里就首先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在多年不见的二舅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二舅在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婚姻状况后，再一次塞给我 500 块钱并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好好生活。随后表妹帮我买了一些礼品并在她的指点下，我迫不急待地辗转登上了开往大兴县的班车。

终于在当天见到了恩师，寒暄过后，当老师问及我的生活状况时，我感觉无言以对，我真得不能把我那些曾经生不如死的经历告诉老师，那同样会让老师感到更大的失落和伤心，况且当初刘老师曾对我升入一所好的大学报有那么高的期望。我只能唯心给老师说自己混的还不错，在家里开办养殖场收入挺丰厚，已经在几年前结婚，儿子也好几岁了。

临别的时候老师同样送给我了一些邮票做纪念，其中有几枚邮票是我当年送给他儿子的。

就这样几枚小小的邮票同样见证了我们当年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不幸遭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和巨大的精神创伤。在我复读初中和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心理问题相当严重，精神状态时好时坏，但这些并没有引起父母足够的认识，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有看心理医生这一说。在我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静养随意吃一些安定类的药物，在这种精神状况反复无常的背景下，仍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定县第一中学读高中。

进入高中后心理问题进一步向严重的方向发展，很多作文都是以偏激的语言写成的，在我的记忆里高中阶段的作文从未得过好成绩，为此老师还曾多次找我谈话。另外在高中阶段政治思想上也不求上进了，我甚至拒绝了学校要我加入共青团的一片好意。到高中的最后阶段，那个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魔鬼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到最后尽管努力调整着自己的心态，但是在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仇恨的岩浆最终还是喷发了。

那个时候似乎总是有一种幻觉在不断地告诉我：有仇不报非君子，报仇的时机到了，并有一种声音在敦促我，等到将来当记者的那一天再也就没有机会了。

在 1984 年的春节前夕，期末考试完以后还没等到放假我就不去学校了，打算上演一幕现代版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想当年革命前辈贺龙用的那两把菜刀还是向别人借的呢，而我有本钱啊，于是就用学校给的助学金买下了两把大厨刀，并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同时还用英文写了一份遗书贴在墙上。我准备首先杀掉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然后再找机会杀掉那个泯灭人性的女书记张玉春，早就听村里的人们讲当年张玉春就是靠给上边某领导投怀送抱才

得以提拔混入党内的。但警钟一直也在告诫我只杀掉这两个人就足够了，绝对不能滥杀无辜。

就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我的计划并打算找机会实施的时候，我父亲发现我不怎么用心学习了，终于在察觉到我的异常行为后赶紧打发我四堂哥谢国民找来了新兴庄的大姐他们，那个时候通信还不发达，随后父亲又找三堂哥谢国柱去邮局发电报，好让外地的两个姐姐也赶紧回来。

一家人生怕我弄出人命来闯下大祸同时也担心我的安全。于是全家人 24 小时轮班看管着我。有一天深夜里趁家里人熟睡的时候我终找机会翻墙逃出了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摸索着穿过京广铁路来到母亲的坟前，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妈妈说过的那句话，“鬼魂都是在半夜里才出来活动的”，我知道母亲在天之灵在这个时刻一定能与我沟通的。在我与妈妈对着话并哭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手也不断地在挖着坟上的泥土，我多么再想看妈妈一眼啊，这个时候我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人是鬼了，就把自己当作了一个深夜里出来替天行道的好鬼，正在我准备折回京广铁路的时候，一列火车开了过来，刺眼的灯光和由远而近隆隆的车轮声又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于是赶紧跑在火车前头，越过京广铁路后来到位于我家西边几百米处刘德栓家的院门外。这时候才发现由于跑出来的匆忙手里没拿上家伙，不过那两把大厨刀是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家里早就给藏起来了。于是就盘算着进院后是否能在他们厨房里找到菜刀，然后找准熟睡中的刘德栓的脖子砍下去，提着他的人头再去砍“破鞋”书记张玉春的人头，之后再把两个人头放到母亲坟前祭典，就在我正想办法临时先找个什么管用的家伙的时候，家里的人们已经分两路找了过来……

家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砸了个精光，尽管又是 24 个年头过去了，旧房的墙壁上至今还有我用菜刀砍过的痕迹是那么清晰……但是，即便是在我的精神状态达到极端疯狂的时候，我依然清楚地知道善恶之分，更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心中的积怨促使着我宁可把东西砸坏，也决不能伤到我身边的任何亲人和那些帮助我的街坊邻居们，我宁可一刀一刀地把自家的房子砍得不像样子了，也不会做出滥杀无辜的事情来。这就是一个清醒的“精神病”人最后的道德底线。

就在 1984 年春节的除夕夜，即便是在这种精神极度崩溃的前提下、在不安分的思维和混乱的意识中我还断断续续地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香港艺人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再一次深深触动我的心灵，我满含热泪的双眼透过模糊的视线认真地看完了张明敏的演唱。

因为 2 年前二舅送给我们的那台 12 英寸昆仑牌黑白电视机已在几天前被我砸坏了，才在好多亲人的陪伴下来到我家房后的二堂哥谢互柱家里看电视，随后我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上的星空，想看到是哪 一颗混在其中的卫星把中央电视台的信号传送到了这个院子里的。之后我又从屋子里叫出大姐夫贾玉才帮我查找那颗卫星，他随手指着天上最亮的一颗星星对我说，“就是那一颗卫星把北京的信号传到这里的。”那一时刻由于已经混乱的思维，我真的相信了大姐夫说的话。我随口又自信地回应道，“通信卫星是与地球同步的，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明亮了的，那它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卫星了。”

接下来我就要求家里人赶紧去找地方给我买“洋装”，我不 仅要穿得像张明敏一样体面，而且还要在电视上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家里人看到我又在胡言乱语了，一时不知所措，就假意告诉我在定县买不到，已经派人到石家庄买“洋装”去了。我似乎意识到他们在骗我，于是我就不断歇斯底里的用国语和英语高呼“我是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我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I am the successor of the great Dr. Sun Yat-sen ！ I am the truthful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China！……全是大清帝国的腐败才毁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袁世凯不是总统，他除了是卖国贼，还是中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孙先生的二次革命虽说没能战胜袁世凯，但已经从精神上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社会不公平的事情全是大清帝国留下腐败的传统才造成了人民依然没有讲理的地方……”

电视里的晚会还在继续，先前晚饭时分的鞭炮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嘎然而止的，我的狂喊再一次划破宁静的夜空。

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说的只有将来当了大官才能洗刷父母的冤屈，同样也在不断地触动我全身的神经。众多的亲

人们已经不再阻拦我了，他们只是陪伴着我、跟随着我，任凭我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在他们看来当我心中的怨气发泄完了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好起来。夜幕下我再一次穿过京广铁路跑到妈妈的坟前，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哭喊，“妈妈呀，你儿子有出息了，你儿子当了中国最大的官儿，你儿子现在是大总统了，你就安息吧。”

随后我又跑到了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就是现在的中山西路，我母亲的坟距离这条路不足 50 米，而距离京广铁路不足 200 米），只能听到身后家里人追赶我的脚步声。

“杨庄子的全体村民们，你们都听好了，我才是中国的大总统！”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不公平啊！我要以大总统的权力把所有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所有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让所有残暴和邪恶的人们受到惩罚，让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发扬光大……”

就在我慷慨陈词的同时，那两只攥的吱吱响的拳头不停地击打着路旁一棵粗大的泡桐树，好像那棵树就是我发表演说的一个讲坛，以至于后来两只手变得血肉模糊了我依然没能感觉到疼痛。亲人们劝我回家包扎伤口，几个堂哥硬要拖拽我，结果给他们弄了满身血迹。大过年的又是半夜里，到哪里去上药啊，我看到了亲人们满是愁容的脸。就在这时三堂哥的一个举动又让我终生难忘，只见他解开棉衣的扣子，不由分说就从年前刚买的白衬衣上撕下好宽的一个布条给我包伤口。

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新年的鞭炮声再次响起，远处天空中不时还炸开一个礼花弹划破并短时照亮黑暗的夜空。

家里人继续跟着我朝城内方向走着，这个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变得沙哑了。一路上我依然用尽全身的力气继续宣读着我的“总统就职演说”，直到最后实在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道在定县城内转了多少个街道，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折返来到了西关北街姑姑的家里……

我无法想像我本人以及我身边所有的亲人是在什么样的凄凉和无奈中度过的那个 1984 年的春节……

正月里家里人看到我整天胡言乱语并在发泄完以后的精神状态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又认为我是中了邪，于是乎各种脸色的半仙们被陆续请到家里做法，钱虽然花出去不少，但是这种封建迷信倒使我更加感到空前的恐惧。我眼睛里时常看到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就放在我家院子的南头，我认定那就是自己杀掉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他们已经死掉了怎么还会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的事儿？

有时混乱的思维让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那张狰狞面孔还有那个书记女鬼伸来魔手掐我的脖子。还有时候在我的床下总是传来咚咚的敲击声，两个死鬼看来是真的不想让我安生了，小时候听妈妈说过“神鬼怕恶人”，我就当一次恶人吧，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从床上跳起来狠狠地对着床板砸了下来，只听“咔嚓”一声，床板断裂了，我的双脚已站到床下的地面上。

半夜里看管我的亲人们睡得正酣被突如其来的巨响惊醒，一个吓得不知所措。这时候我倒反过来安慰他们了，我说一直在骚扰我的那两个恶鬼终于让我给赶跑了，大家都可以安安生生休息了。

因家里人知道了我受到那两个恶鬼的侵扰，也就没有告诉我刘德栓和张玉春实际上并没有被我杀死的事实。随后他们把我弄到新乐县棉麻公司的三姐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静养，这样好让我躲开那两个死鬼的追杀，但很多时候仍然无法入睡，深夜里远处火车的汽笛声都让我感到害怕，我认为是那两个死鬼正在穿过铁路来寻找我的踪迹。在三姐家里每天都有中医给我做针灸疗法，很多时候需要大剂量的安眠药才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三姐还用一个棉麻公司特制的深斗小拉车带我去做烤电治疗，实际上是捆绑在一个椅子上过电，那个所谓的医生手上拿着个手摇式的仪器开始向我问话，当我回答离谱了，那人就摇动手里的仪器，顿时我全身就象散了架一样，感觉就象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胸口上，摇的再快一点甚至就会昏死过去。我看到了三姐难过的样子，看到了三姐在不停地抹眼泪，事后我向三姐

哀求回家，再也不能来这个鬼地方了。

到了 1984 年春天在我意识稍有好转的情况下，我把家里所有看过的书籍和杂志装了足足一麻袋，用三轮车运到了学校并找到我的班主任刘老师帮我把这些东西捐给了定县第一中学图书馆。

之后家里人被迫给我办理了离校手续，随后没多久三堂哥和我姐夫等几个家里人以送我到保定上学的名义把我骗到位于保定市东郊的河北省精神病医院……

我本人的崇高理想、我的前途和命运从踏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天起也被断送的一干二 净。而那个时候距离我参加高考恰恰不到 3 个月的时间了。

半年后，大姐把我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家，当得知花费了高达 1500 多元的医疗费后(其中包括我在精神病给人家毁坏的物品和设备的赔款)，我无奈地又哭了好几天，这些钱都是三个并不宽裕的姐姐为给我治病东拼西凑弄来的钱。

虽然出院了，但我的心里明白：肉体的创伤容易愈合，心理的创伤仅靠精神病院的电刑是永远无法治愈的，只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让不公平的事情变得公平、让不合理的事情变得合理的时候才能彻底医治我心理上的创伤。况且我在精神病院受到的折磨也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在小屋子里憋的让人更加发疯不算，如果再不老实的话，小的电刑可以让人感受到撕心裂肺是什么样子的，大的电休克可以让人在眼冒金光之后安安稳稳的睡 2 天，人家说那叫电疗。在我最初的记忆深处，对我来说那似乎永远不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倒像是一个恐怖训练营，那种感受比坐牢不知还要难受多少倍。后来才知道医院那边给我定的“罪名”是“精神分裂症”。

但是无论如何，在精神病院长达 6 个月的治疗过程中，我的精神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和恢复，所以我依然感谢那几位对我以诚相待的医生和护士的关怀。由其是一位年轻的陈医生，当时 28 岁左右的样子，对我印象很深。他医科大学毕业后刚分到那家医院不久就做了我的主治医师，后来我们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当时怕病友们看懂我想要写的内容，于是就用英语给他写了我在医院的感受以及我未来的想法，因这位医生喜欢兔子，我承诺在出院以后当自己的家庭冤案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一晃就是 24 年过去了，因平反无望加上生活所迫以及事业上依然没有明显的成就，我也一直没有兑现带上小兔子去看望人家的那个承诺。

但是，我将在针对我们那些即不公平又不合理的事情最终变得公平、合理的时候，在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冤屈有一个明确说法的时候，我会对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逐一地找到他们并以自己最终成为一名大家都能够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身份向他们一一致谢。让所有这些好心人也最终看到爱的力量、看到人性光辉的伟大、看到人间真情所创造的美好世界。

第十二章　地方上的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沆靡一气

回到家里后，我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那个我认为已经被我杀死的女鬼张玉春依然悠闲自得地坐在村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上，而那个狰狞的男鬼“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继续沉浸在复辟的美梦中。而我却不得不带着精神病的名声跟着相依为命的父亲干农活。因为在以往被村干部强加“富农”之后的 20 多年间，这个家庭已经留下了任人欺凌的传统，况且历史冤案又没能得到平反和解决，我们在村里依然抬不起头来，某些人照样用阶级斗争时期的思维模式对待我们。

发生在 1986 年的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在责任田里正常浇地时，机井上的电机烧了，原因是某个做生意的外来户在水泵电机的闸下边接了一条线到其面粉机房，结果他磨面时因电流大导致浇地的水泵电机两相供电而烧毁了。本应该是承包机井的电工自负其责的事情，况且烧毁电机也不是我的责任，完全是因为电工黄耀全给那个外来户违章接线造成的后果，但最后的结果竟然是电工黄耀全让我赔偿，我理所当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在那以后我每次浇地时电工黄耀全就给拉闸，不赔钱就别想浇地，我又一次无奈地向邪恶低下了头，如数给了他修电机的 30 块钱才算了事。生活还要继续，可我又真的惹不起他们啊，因为电工黄耀全的弟媳妇正是那个曾经用 1 斤棉花换我线母亲 1 斤布的村党支部书记张玉春。

时代跨入到 1991 年的时候，政治歧视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我四堂哥谢国民家已有一个女儿的情况下违背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怀了二胎，而那个时候杨庄子权力阶层的“皇亲国戚”家庭里没有一家不是生二胎的，有的还生了三胎，在涉及到超生罚款问题上出现了双重标准。据说权力阶层中的家庭根本就没有交罚款，有的只象征性的交了一点，而其他所有生二胎的一律罚款 1000 元，双重标准招来大多数人的抵制，当然也包括我四堂哥。后来党支部书记张玉春出面了，首先拿我的四堂哥开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15 年之后，竟然还在拿“富农”说事儿，她以威胁的语调口出狂言道，“你这个富农子弟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好，是不是还想翻天啊！”

这个女党支部书记从“文革”结束后上台到 2001 年因年事已高才将权力交给她的亲家胡庆山，就是她二女儿的公爹，前后长达 20 多年，跨越了两个世纪，在当代民主政治风行全世界的基层政权交替历史上可以堪称是“世纪书记”，能否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还不太清楚相关的规则。

事情虽然不大，但足以看到还没有肃清的“文革”留毒继续在这类人的内心世界里发挥着作用，指挥着他们已经麻木和扭曲的灵魂。

而时间到了 1998 年，几次更大的政治伤害让我几乎再度陷入精神崩溃的边缘。

1998 年修建朔黄铁路引线工程，在我们居住区域的京广铁路西侧并行修建通往朔黄铁路的原料供应线，这样就涉及到位于我们十几个住户前边最靠近铁路的 4 户人家拆迁问题。即便是这样一个看起极其简单的问题依然让定州市各级政府的腐败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也跟着渗透进来了。

国家修建朔黄铁路是投了巨资的，为了安抚拆迁户进行了按实际损失 3 至 5 倍的高额赔偿，这其中就已经包括了他们另找地方的安置费用。但后来的结果是当铁路引线工程竣工后拆迁户们全都在已获得高额赔偿的拆除线以外大肆侵占公共道路用地。更有甚者是赵彦某家本来他两个儿子的两处房产和院落全都得以保全下来，他还照样侵占公共用地又盖起了两间小房住了进去并把公共道路当作了他自已的院子，随意在门前摆放自行车等杂物，如今来往汽车就小心谨慎地在他们房门外通过，如果他们一出屋门就和汽车碰了头被撞死或撞伤，试想那到底应该算谁的责任！！！

当初铁路和有关部门划定拆除范围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景才预留出较大的公共道路用地，由其是在两个交叉路口划定的拆除范围更大一些。当初我的一个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带头多占了拆除线以外 5 米，其它几户也跟着多占 2 至 3 米的公共道路。试想当初有一户人家全部的旧房院落和附着物售 9000 块钱没人接手，而在这次拆迁中，仅拆除了侧面的厨房、门垛和院外的厕所，正面 4 间大房距离拆除线还有 1 米得以保全下来，仍得到国家 1.35 万元的赔偿，但他们依然合起伙来侵占公共用地，这样就损害到后边 15 个住户的公共道路。

首先我们谢家一个族人找我牵头制止侵占公共道路的行为，杨庄子村指定几个小队长解决问题，经过多次艰苦的协商和谈判，我当家姑姑谢秀芸家同意在多占 5 米的基础上让出 2 米，大家也就都同意了。因为不管让出多少，其它几个想多占的住户都在看着谢秀芸家的一举一动，在大家眼里这是一家社会面上颇具实力的家庭，那个姑夫王海山是国有企业领导还是定州市人大代表。

但是在施工的时候先前说好让出 2 米的协议竟成一纸空文。做为市人大代表的王海山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国敏、王国辉、王国军亲自出面依仗其势力强行在多占 5 米的地方施工，局面一下子便不可收拾，其它几个住户也都效仿着大

肆侵占公共用地进行施工。

当天晚上我们来到王海山的家里想与他们理论一下，他们的给我回答是一致的，“我们占的又不是你家的地方，少管闲事，否则对你不利，况且好呆咱们还是亲戚，你就好字为之吧。”我给他们的答复也很直截了当，“我真为有你们这样的亲戚而感到脸上无光、更感到羞愧。”

而那个姑姑更是以亵渎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把当年对付帝国主义的那句话用到了我身上，只见她咬牙切齿地威胁道，“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但是她的话对别人并没有应验，倒是她自己在第二年就是 1999 年便率先灭亡了。因那个时候我们基本断绝了来往，他们家又一直封锁消息，至于这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一时还成为人们猜测的一个迷团。尽管王家那边给我们发出了邀请，当时我们谢家的族人一致商量不去参加谢秀芸的葬礼，以此再给他们弄个难看。但我从人道和血缘方面考虑还是说服大家买上花圈什么的去参加王家那个还算隆重的葬礼。

话到这里再说回来，我们找过王家人的第二天，就到定州市西城区政府反映王家侵占公共用地的问题。还好，政府方面当即派人跟随我们来到现场，但是当那个官员老远就认出那是王家人地盘的时候，就别说解决问题，什么话都没说就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扭头原路返回了事。先前我与王家的二儿子王国辉是好朋友，现在我才真正看清了王家人的能量在这件事上已经初露锋芒。

我认定自己肯定斗不过他们，心里已经敲起了退堂鼓，况且家里人为了能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也极力阻止我不能再惹是生非了。因为我在当地人们的眼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形象，当天晚上影响到我们 15 户人家的族人代表又找到了我，让我弄一份材料到市政府去告状。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便又硬着头皮入伙了，我随即从电脑上弄好了材料，并打印了好几份并在当天晚上让相关的住户都签了名、按了手印儿。第二天上午一大早我和族人代表就来到了定州市人民政府，分别在信访局和政府办公室说明了有关情况并提交了那份材料，他们都说的很轻松，“这么点小事儿，我们分头研究一下，很快就能得到解决，不就多占的地盘让他们拆除退到红线以内不就完事了，先回家等着吧。”

我们满怀着希望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等着市政府给我们做主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是让谁也想不到的那种因腐败政治而出炉的极端糟糕和龌龊的一幕还是在当天下午就出现了：王家二儿子手里竟然拿着我上午刚交到市政府的材料找上门来了。

看到我以后大老远他就气不成声地开始对我一番数落，甚至还带有一些语重心长的口吻说道，“小强阿，咱弟兄俩那么不错，你怎么就狠心把我告到政府那里了？你一定是受了坏人的蒙蔽，哥哥也不怪你，你现在悔改还来的急，再说你根本也斗不过我们啊，你睁大眼睛看看你鼓捣出来的这破玩艺儿怎么就会落到我的手上呢，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吧。”

看来这定州市人民政府是不是就成了王海山家为所欲为的工具了？反正就是这么大事儿了，我也没有吃他那一套，仍然以义正严词的姿态回答他，“过去咱们的确是不错，是兄弟般的好朋友，在我极端困难的时候，你还给过我不少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我的心里一直怀有感激之情，等我成为强者的时候，我还会以适当的方式报答你的恩情。但对于大是大非问题，我心里也有一杆秤，也没有什么坏人来蒙蔽我，我心里清楚得很。你们的做法虽说只是沾了国家的光，但你们伤害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户家庭的根本利益，再说你们那种仗势欺人的做法我从骨子里看不惯，虽说你们是最后才搬来的住户，大家谁也没有欺负过你们，但你们却总想在别人面前显示威风，应该不大合适吧。再说我那个姑夫做为人大代表，本应该带头为人民、为弱势群体多做点好事才对，但你们却反行其道，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用在欺压人民上边来，在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也好好想想吧。”

我的这番话还没有让王国辉达到恼羞成怒的地步，临走之前他丢下最后一句话，“我没有你文化高，我说不过你，如果你不听良言相劝，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眼看着他们几户侵占地盘的住户们得到市政府某些人的纵容而得意的神态，真理遭到这些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践踏，我再一次难过的不知所措，狠下心来决定再与王海山这个市人大代表斗一斗，毕竟真理还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于是我又不顾白天奔波和工作上的疲劳，连夜整理出一份揭露地方政府在拆迁问题上存在的腐败方面的新闻稿件并郑重签上我的名字，第二天就用挂号信寄到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栏目组。

没过几天就发现了王海山家的异常举动，一天上午下着蒙蒙细雨，我出门查看他们违章建起的院墙和房屋的时候，发现王海山的三个儿子打着伞弄个红漆桶在墙上刷标语，我感到非常奇怪，但拆除的那个红线标记被红漆盖住了倒是个事实，最后完整的标语是“节约用电，利国利家。”如今整整10年过去了，那行红色的标语依然摆在那里，每次看到都会勾起我不堪回首的往事。很显然他们是在毁灭证据，但凭借他们平常高傲的心态，是应该不会做出这种让别人看上去有点奴颜婢膝的举动。是不是河北电视台来人采访了，我心里这样想着，但前后左右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到电视台的人影，但后来发现有政府方面的人在那里走动还与王家人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之后当天再没有发现其它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到第三天的时候，与先前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如出一辙。王国辉拿着我寄给河北电视台的稿件再一次找上门来了。这一次他倒是没有象上回那种恼怒和气不成声的样子，而是嬉皮笑脸的又带着点无赖的神情开始数落我，“好家伙啊！小强你真能耐啊，你本事见长啊，竟然把我给告到省里去了，你可看清楚了，结果又怎么样？赶紧停手吧，告到哪里你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那一时刻，我浑身的血都在往上涌，真想拿出菜刀把这帮泯灭人性的家伙们全都一个个劈死，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不由得冲苍天发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真理怎么总是要败倒在邪恶面前啊，是人有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随后我明确地告诉王国辉，“你个人蹦多高，跳多远谁不知道，还不是全仗凭你那个所谓人大代表的爹和你们那些黑恶关系网，至于你们一直说你爹是人大代表，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就是，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还会继续往外边寄新闻稿，我要看到真理战胜邪恶的那一天。回家给你们主事儿的人说去吧，大不了弄个鱼死网破，反正我已经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生死对我已经无所谓了。”

这一次王国辉是以气急败坏的表情离开我家的，远远的我跟着他走了一程，在院门外的路上他碰见刚从地里干农活回来的我父亲，只见他又装出一付好心人的样子对我父亲说，“二舅阿，你可好好劝劝小强吧，别让他再接着闹下去了，想当年是我借钱给他，别人有谁能借给他钱啊……”

在随后的几天里，王海山一家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坐卧不安，不断地派人到我家当说客传达他们那些软硬兼施的种种伎俩以阻止我继续揭发他们与政府相勾结的腐败黑幕。因那个时候我的集邮事业已经步入正轨并与世界各地的集邮者建立起联系而且先前还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有过通信来住，更有甚者他们竟然以此来给我捏造罪名，威胁说我要是再找他们麻烦的话，他们就举报我“里通外国”、“搞间谍活动”还有什么“出卖国家机密”，还说政府随便给我弄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给抓起来……

而这个时候，王国辉更是用尽浑身解数想办法兴风作浪。王国辉知道拨乱反正时期的现任生产队长陈国堂紧跟在那个女书记后边听从人家的摆布才导致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再加上他是当年害的我母亲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的那个瞎眼生产队长陈国峪的亲弟弟，于是就跑到队长陈国堂面前说我一直在说他的坏话，那个借着酒劲的陈国堂一听便火冒三丈，跳着脚狂吼道，“谢强算个蛋啊！谢强算个球啊！我要想弄他还不跟提个死小鸡子一样那么容易……”路人听到后马上跑到我家说陈国堂正在路上耍威风要找我打架并把他与王国辉的一举一动全盘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来了气，立马找出了当年那把大厨刀提在手上，另一把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去向了，但是陈国堂始终也没有来找我的麻烦。

与此同时不同语调的恐吓电话也不断地打到家里来：有的说是派出所的要查我是否从国外弄来了黄色光盘什么的，有的说是黑社会的要给我好看，更有甚者说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接到举报要查我向某国政府提供情报的间谍活动……那时候这里的电话还没有来电显示功能，也闹不准这些电话都是从什么污七八糟的地方打来的，也没准儿正是从王家的电话上打来的，但我肯定这些东西都是王海山一家泡制出来挽救他们自己命运的一根根稻草。

但无论如何我心里最明白：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随便他们怎么胡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我的所做所为都可以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而他们卑鄙的伎俩与他们种种恶劣行径永远会做为邪恶的东西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妻子、我父亲、我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真可谓上有老下有小，我的生命没有了就等于其他四条人命也同样断了生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一次无奈地听从了妻子和我父亲的忠告，就此罢手，放弃了对王海山一家的继续讨伐。因为父亲和我妻子最担心的是狗急了还会跳墙，如果让我把他们逼的无路可走的时候，无法保证他们不会对我做出什么伤害的举动。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急迫地阻止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呢？正在这个时候，知情人终于告诉了我整个事件的真相。当然这个真相也是出自王海山一家的自述，因为他们不断的再向他们自己最可靠的人们炫耀他们的能量和对付突发事件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从而避免了灭顶之灾，而几个知情人在良心的驱使下把真相又全部讲给了我。

当河北电视台新闻广角的两位记者带着摄像机等采访设备来到定州市政府以后首先要采访信访局等部门把举报材料交给当事人的问题，然后再实地采访群众以及提供新闻稿的我本人。很快有线人就给王家打电话报了信，王家人马上就进行了毁灭证据的首要工作。之后王海山和他在工商局工作的小儿子王国军在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出面与两位记者接触，他们与定州市政府官员们竟然共同丧尽天良地说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发病期，鼓捣出这些材料完全是一场恶作剧。再加上王海山信誓旦旦的说我是他的妻侄，对我最了解，就这样电视台的两位记者竟然信以为真，连向当事人证实一下真伪的工作都没有做就打道回府了，也有人说是王海山用钱把记者打发回去的。但不论怎么说那两个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最终还是把我写的那份郑重签着谢强名字的新闻稿件交到了王海山的手里。

精神病的字眼他们选用的真可谓是恰到好处、恰到时机，他们又一次把刀锋插在了我的心坎儿上，历史不会弄错，正是在 14 年前因为女书记张玉春和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已经死掉还依然狰狞的灵魂把我逼疯了，最后把我逼到了河北省精神病医院。难道他们真想让我再一次重蹈覆辙吗？他们的如意算盘这次打错了，因为我的精神世界一天天在变的强大起来，我相信只要是邪恶的东西迟早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箱。

让那些同样给人民带来苦难的定州市的腐败政治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以警示各级地方政府不要让历史的腐败再次重演，要时刻牢记执政为民，天下为公的法则。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毕生坚持的执政信念。他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最关心群众。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当年毛主席的这番话不管到任何时候都将是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只有让那些口头上说一套，而行动上却无情亵渎毛泽东思想的腐败政客们真正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惩罚之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才能真正照亮全社会。

如今定州市人民政府的大楼上方依然矗立着邓小平同志的伟大真理：“发展才是硬道理。”

而这个发展不单单是经济上的发展，同样包含着人类道德水准层面上正义战胜邪恶等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不断发展。

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发展。试想仅仅依靠象王海山这类在社会面上吃的开的所谓本事人儿及其那些来自政府和民间的黑恶关系网，社会怎么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么进行下去？整整 10 年了而这些黑恶势力依然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的任何制裁，当年那些为虎作伥的时代罪人依然悠闲自得地继续各自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

时光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杨庄子社区里的某些人针对我们的传统歧视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

2003 年的时候，位于我家北面的铁路货场建围墙，我父亲的那块开荒地又被铁路部门征用了一部分，涉及到几个家庭的赔偿款共 9000 元都给了杨庄子五队。针对我们占地的同时还涉及到近一亩地的农作物赔偿，当了一辈子队长的陈国堂竟然告诉我父亲开荒地不赔，在副队长的说和下，只给了我父亲 280 块钱了事。老实巴交的父亲拿着钱回家后明显带着不满意的表情，在我向父亲问清原委后，我才意识到事情真得不对头。于是我便找到两个队长理论，我这个人凡事要讲理，在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之后，队上才又给了我父亲 1100 元。

其实这件事并没有这里描述的这么简单，其中还有好多复杂的情节，甚至定州车站和定州市西城区派出所都为这件小事来到了我的家里。具体细节只是暂且不便透露而已，如果将来本报告文学能升级为小说版的时候，会将整个事件的全景展现给世人。但是读者依照现实社会中的腐败逻辑也可以猜出个七七八八来。实际上我的家庭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已经不缺钱花了，我也不是为得到那 1100 块与队长据理力争，我仅仅是为了挽回一家人在杨庄子社区里做人的尊严，而这个尊严同样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到了 2007 年另一件事再一次证明了杨庄子社区某些人针对我们家传统的歧视心态依然没有改变。

现代社会里汽车进入家庭已不是什么奢望和梦想。因我的家门口条件所限，即便是小型车都无法开进来，所以买车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恰好在 2007 年春天，家门口一个姓帅的邻居要出卖房产，在我们不知情的背景下他们卖给了别人。按当地的习俗，远亲不如近邻，出卖房产应当先给邻居打招呼，如果在邻居不买的前提下才能卖给别人。但这个邻居从个人恩怨出发，在出卖房产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找过我们，况且这个 2 分地的院落是 1986 年帅家花 1200 元从我们手里买走的。时间久了，邻里之间的恩怨免不了会有，但 20 年的邻里之情还是占主流吧，而在帅家看来，他们在市区买了新居，反正再也不会与我们打交道了，不管卖给谁，他们都会一走了之就算完事了。

为此我也挺生气，便出面阻止交易的进行，但最后人家还是避开我签了协议。事情的经过是：卖方净收房产款 3 万元，杨庄子五队的两个队长和一个中介人在收取了买方 1500 元好处费以后便做主实现了成功交易。

但最后的结果还算是不错，1500 元好处费由我买单的前提下，两个队长和中介人还是以得罪远亲而保护近邻的方式把已经成交的房产从那个买家手里夺了回来。算上两次摆场吃饭及其它花费，总共以近 3.3 万元才收回了当初因生活窘迫以 1200 元出手的房产。

客观上毕竟实现我所预期的目标，我还是对三个当事人充满感激之情，尽管多花了钱，但我并没有怨言，因为钱是身外之物，同样有些东西也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就这样我对买到手的房产进行了改造，终于有了可以停放汽车的地方，并于 2007 年 6 月把自己新买的第一辆汽车开回了家。

第十三章　对国家和民族的坚定信念鼓舞着我

1984 年秋天，从精神病院出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所描述的主人公在发生海难之后最初漂落到荒岛上时的情景一样，我感到有一种空前的生存压力。

在我们尚不发达的农村区域流传着早婚的习俗，有些男孩子甚至 18 岁就娶了媳妇。这一年我刚满 20 岁，好心人看到我们父子二人的生活比较艰难，几次给我提亲，就先别说家庭条件好坏，都因为我住过精神病院的缘故而失败，有的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人家就直接拒绝了。这同样让我感到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一死了之看来是件很容易的

事情，但是理智不断地警告我绝对不能那样做。因我自己解脱了留下父亲怎么办？多少年来欠下亲友的债务怎么办？一生为真理而斗争母亲已经含冤去世了，几十年的冤屈难道就让它也随着我的离去而永远尘封在这个世界上吗？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种即复杂、又恐慌的心理状态真的就像四川特大地震中那些被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渴望活下去那样，同样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支承着我脆弱的精神世界。每当我母亲在摔伤后依然擦着流血的伤口纺线的情景浮现在眼前的时候，我都会偷偷地找个没人地方大哭一场，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免除母亲所遭受的苦难而伤心不已，更为母亲到临死也没能过上好日子而感到惭愧。

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当年在 1935 年 11 月，一代女杰施剑翘刺杀了大军阀孙传芳，事后打电话给警察局自首，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后经冯玉祥、李烈钧等人活动，国民政府才将其特赦释放。当然这种极端的做法在现今法制社会是绝对不能效仿的，但施剑翘立志为父报仇的时候，还是一个只有 20 岁的弱女子，她那坚持不懈的精神同样是鼓舞人心的，而且恰好是在她立志第十年的时候成功刺杀了孙传芳，从而成为流传后世的一段佳话。

而对于我的报仇计划就不那么确定了，首先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残暴之徒，而是要用法制的武器将杨庄子村存在并相传了几十年的邪恶气息清除掉，要靠我个人的力量是何等的渺小啊。但是我依然有耐心等下去，哪怕是 30 年，因为正义的天平迟早会偏向拥有真理的这一边。在这个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我的体魄在一天天变弱、头发在一天天变白，但我的精神世界也在不断地丰富和进取中一天天变得强大起来，我相信一个在精神世界具有远见卓识 的强者迟早会战胜那些只会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而满脑子充满邪恶和残暴的强者，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一具具行尸走肉而已，只能说他们是党和国家的败类，是压在人民身上的负担。

所以，从我父亲被人陷害那天起，我有什么理由不能让父亲等上 50 年，通过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来给我们做主呢。

笛福小说中的鲁宾逊在艰辛而漫长的孤岛生涯中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敢于向自然挑战，向死亡挑战。他凭借着自己的一双手建账篷、围篱笆、制器具、种粮食、养牲畜，在只有一个人的荒岛上了创造了人间奇迹。在长达 30 多年以后才得以被过往船只发现而获救，最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英国伦敦。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鲁宾逊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小说中的鲁宾逊能够坚持 30 年而等到获救的那一天，我为什么不能坚持 30 年而等到国家和人民最终为我们讨回公道的那一天呢。我想信国家和人民迟早会管我们的，正是坚持着这条必胜的信念，我忍辱负重默默地跟着父亲干农活。为支付家里的日常开销我还养猪、养免、打零工，并且在业余时间开始系统地研读大学历史、法律及社会学、经济学等课程，以期从中找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悲剧所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背景，以及避免和解决人间悲剧永远不再发生的有效途径和办法，让善良的人们永远生活在一个没有邪恶、充满和谐和相互关爱的社会环境中该有多么好啊。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前后用了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随后又熟练掌握了计算机应用技能，从而才具备了更好的某生手段，进而使一家人的生活条件逐步得以改善并最终成为村民眼里的成功人士。

在这个漫长的十五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悲喜交加的故事，而且在我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变故之后，我才真正从某种意义上走向了成熟。

第十四章　爱情的力量

1984 年秋天从精神病院回来后，在爱情方面因“精神病”的名声遭到一连串的失败还能够承受，但是，那种来自社会上的歧视和有些人的白眼却让人感到心里有些不踏实。

入冬时节，在我家赁房子住的一对夫妻中的女房客又给我做起了红娘，约好了时间让我到她工作的纸箱厂与一位城里的姑娘见面。大概快中午的时候我和那个姑娘都如约而至，首先我们互报了姓名和住址，她叫孙慧，刚满 19 岁，文化程度初中，第一眼看上去有点面熟，但一时又无法想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面。她给我的印象是美丽、漂亮还具有城里人所特有的那种时尚，因为在那个年代至少从衣着上还存在不小的城乡差别。至于我给人家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好像也有点自知之明，我感觉自己只有土里土气的份儿而丝毫没有那种男子汉潇洒的仪表和风度。我自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提前向姑娘说再见就回到了家里。

当天晚上媒人又给我介绍了她家的情况，说她父亲是北门街的党支部书记，她母亲是管妇女工作的干部，还说那个姑娘认识我并知道我的小名叫铁蛋，这倒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经媒人详细一说我才弄清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姑娘的外婆家与我的外公家都是孟家庄村的，怪不得我看她眼熟呢，原来是在很多年以前在我外公家见过面。而且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她的姨妈正是我的表嫂，就是我二舅家的儿媳妇，论辈份姑娘还得管我叫叔叔呢。

我的外婆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的很多年就去世了，外公是在 1978 年去世的。战争年代我二舅还在解放军兵工厂的时候，在外公和外婆的包半下就定了亲，后来有了表哥，因为我二舅工作在外常年不回家，若干年以后最终还是离了婚，表哥继承了外公家的香火，先前的那个舅妈则改嫁他人。在我还没有上学的童年时代，经常在外公家住上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由表哥用自行车接我去那里，有时候还随着外公一起坐小火车回家来，这样外公就会在我家里住上一段时间。后来我的年龄长大了，就单独坐小火车到孟家庄村的外公家，那时候这段 10 公里的小铁路区间小火车客票是 2 毛钱。后来在我家赁房住的那对夫妻中的男房客正是开小火车的司机，所以坐小火车也就不再买票了，有时去外公家就干脆坐在他驾驶机车上。不过，当时代时跨入到 21 世纪的时候，这条 60 公里长的地方铁路在运行了 40 多年后被全线拆除了。

后来表哥结婚的时候我也就只有 10 来岁的样子，还跟着我母亲在表哥家住了几天，婚礼现场还有那个叫孙慧的小女孩，我们还在一个桌上吃了酒席。孙慧小的时候也经常到她外婆家里小住，她有四个舅舅，我与她最小的舅舅张同虎正好同岁，是好朋友整天泡在一起玩。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过了几天，媒人带着孙慧和她的母亲到我家来了，因为孙家人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他们并不认为我有过精神病，而且对我的遭遇还抱有极大的同情。但是同情不等于爱情，何况我的家庭条件又是那么的糟糕，各方面与人家那边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孙慧的母亲明确表示了不能让她的女儿嫁给我的想法，当时她说不能乱了辈份只是一个借口。而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也并不违背婚姻法，至于辈份各论各的就行了。孙慧的父亲更是铁了心不同意这门婚事，而孙慧的母亲是在女儿软硬兼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来到我家的。

而孙慧本人早在多少年之前就已经对我有一种想法了，甚至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撑控之中。我在定县一中上学的时候，她就常常在暗地里观察我，因为学校距离她的家也就只有 300 米的路程，但所有的一切我都浑然不知。那个时候，孙慧认定我会升入大学从而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所以她只会在背后偷偷地看着我而并不想与我正面接触。不过即便她与我擦肩而过我也不会认出她来，因为只是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见过几面，况且我也没有太在意，对她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我在定县一中上学的那段时间里，她在一家眼镜厂做工，那个时候我在她心中的位置甚至是有点高不可攀，所以时常让她的内心世界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她希望我升入大学，另一方面她又怕我升入大学而离她远去。所有这些内情都是后来由媒人转达给我的。

而实际上由媒人提亲的事也都是孙慧一个人安排的，她家的一个邻居与我家女房客同在纸箱厂上班，就这样孙慧通过两个媒人与我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一直没有动过什么心思，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当媒人告诉我整个事件真相的时候，

我对孙慧多年的真诚和她所付出的那份深情厚意所深深地感动了。这个时候孙家人也知道了他们的女儿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秘密，她的父亲为此更是火冒三丈，干脆就把他女儿软禁在家里了。

又过了一个月的样子，有一天早晨我还躺在热坑头上蒙头大睡的时候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冲着门外喊了几声，想问一下是谁，但没有回应。我慢慢腾腾下到地上想开门看个究竟，门刚一打开就有个人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听声音正是孙慧。这也可能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就这样我们抱在一起也不知哭了多久我才想起来得做点饭，因为我父亲下地干活快要回来了。我父亲生活习惯多少年如一日非常有规律，那就是早睡早起，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一日三餐不论好赖都平均着吃，就是每顿饭的量都保持基本一致。

我草草地熬好了红署粥，后来父亲回来了，看到孙慧的到来非常高兴，我们俩看着父亲吃着我做的红署粥，便一同走出房门来到了小铁路边上的田野里。那天孙慧穿了一身蓝色西式制服，清秀的脸上似乎又多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时尚和美丽。一时间两个年轻人的心已经是贴得那么近了，千言万语也说不完各自的心里话。

我们手牵着手沿着冬季空旷的农田漫无目标地走着，我们又爬上了 2 米多高的小铁道的路基，向北望去几百米外的那个大水塘再次映入我的眼帘，勾起了我对 10 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我的情绪不免又沉浸在难以抑制的忧伤之中，孙慧分明看到了我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在她的追问下我向她讲述了那个夺命的水塘以及我获救的过程，她再一次扑到我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她一起哭。

时间已经是下午了，我们相互搀扶着走下小铁道的斜坡朝着那个水塘走去。到了近前，看到水塘的表面已结了厚厚的冰层，有孩子们在边缘上滑冰嬉戏。远远的我向孙慧指认了曾搭旧我性命的蒋家人的门口，但那个时候复杂的心境没有让我带着女朋友走进那个门。我的心里依然在默默的承诺着，等我们的历史问题解决好了而且我的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会看望他们的。

就这样悲伤与快乐伴随着我俩从早晨一直到中午，再到下午后半晌了我们才感觉到一天了滴水未进，很显然是爱情的力量已经打破了时空的概念。

回到家里我看到孙慧随手把院中的两扇铁门给插上了门闩，我们便来到西屋里休息，孙慧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我坐在旁边陪着她，我隐约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某种期待的暗示。我的心跳在不断地在加快，我不敢正视她的目光，甚至不敢再看她曲线分明的身段。我赶忙转身来到外间屋里从保温瓶中倒了两杯水，然后放到西屋的小桌子上，我轻轻地把孙慧扶起来，将一杯水递给她，我又转身将另一杯水端在手里慢慢喝着。

爱情的力量已经让我们战胜了饥饿，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然而机不逢时，就在我们俩再次搂抱在一起的时候，外边传来剧烈的敲门声。原来是我新乐的三姐与她的公爹一起为办户口的事到定县来了，晚上要住这里，就这样他们的到来一下坏了孙慧我们俩的好事。

我三姐见我能找到这样一位即漂亮又时尚的女朋友，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像神话中的仙女下凡到一个破落不堪的农家小院里。三姐晚上亲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又到街上买了烧鸡、烤鸭什么的，还有当时并不十分流行的啤酒，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我们大家都饱餐了一顿。家里来了人，我也得先照顾脸面啊，肯定是不能和孙慧住在一块了，就这样我三姐与孙慧睡在西屋的床上，我和父亲还有那个大伯一起睡在东屋的大坑上。

第二天上午，我那位在孟家庄村的表哥骑着自行车找上门来了，要把孙慧带走，前边说了，我的表哥是孙慧的姨夫，就这样表哥把孙慧带到她姥姥家暂住。原来北门街那边的孙家人见女儿偷着溜出去以后一天一夜未归，就知道一定是跑我家里去了，但是，他们又觉得没有脸面到我家来要人，这才跑到孟家庄村让我表哥出面了。

孙家人并不知道内情，只听他们女儿的一面之词就认定我们之间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过了没几天在媒人的引见下我那个未来的丈母娘就带着她的女儿一起到我家里来了，说让我们看个日子好吧婚事定下来。她还指定让我的大姐来操办这些事情，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孙慧的母亲与我的大姐是同龄人，她们自小就相识相知而且后来还是同学关系。

可是我与孙慧都不到法定结婚年龄，那时候办理结婚证只需要由单位或村里开出的证明信就可以了。当然对于当书记的孙慧的父亲开个证明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我这边还得去求那个女党支部书记。我硬着头皮亲自到大队上找到了那个张书记要求开个登记结婚的证明信。出乎我意料的是张书记不但没有烦感，反而倒来了精神，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我们已经在她的权力下被整得不像样子了，在她看来我们已经破落成那种不三不四的家庭了，我这么快就找到了媳妇对她来说更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让她不免感到震惊。

张书记的一双小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我，嘴里不紧不慢地问道，“订哪儿的媳妇啊？女方家里都是干什么的？”我随口如实回答说，“我女朋友叫孙慧，是北门街的，她父亲是党支部书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的话，带着满脸的狐疑说道，“你不会是在说梦话吧，我经常跟孙书记一起开会，这么多年了我对那个人最了解，我也知道她有个漂亮的宝贝女儿，难道说他真能把女儿嫁给你？”

而实际上恰恰是张书记自己在说梦话，因为她多少年来满脑子装的都是些污七八糟的邪恶东西，想当年她仅仅是个在政府里边端茶倒水的女服务员，杨庄子村民多少年了都一直在普遍地私下议论张玉春是靠耍“破鞋”才最后当上书记的，这也是人们认为张玉春阴险毒辣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是张书记多少年来那种扭曲和阴暗的内心世界一直在指挥着她的一举一动，她除了知道以强欺弱，除了知道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法宝，她跟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人间真情，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用金钱和权力都无法换来的纯真的爱情，她也就更无法想像出爱情的力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挡的。

孙书记的女儿嫁给我对张书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小的冲击，因为她想像中的那么多个不可能被事实击得粉碎。她痛痛快快地给我开了证明信，还虚心假意以地以长辈的慾态教育我好好善待人家姑娘。我只在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来回答她的好意，便又随口说道，“我知道做人的基本准则。”我并没有进一步向她道谢，而是心里满怀着一种对张玉春无限鄙视的心情离开了她的办公室。我心里明白，等我有朝一日变成强者的那一天，我还是要找这个泯灭人性的书记算总帐的。

第十五章　家庭危机与婚变

就这样在 1985 年的春节前夕，在我们相识、相知不到 2 个月我就把孙慧娶到了家里并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一年后，在 1986 年的春节期间，确切地说是正月初八，我的儿子谢鹏出生了。在这一年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夫妻之间小的摩擦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与孙慧之间的爱情从来没有动摇过，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爱情经得住了历史的考验。有人不免要问，即然你们的爱情基础那么牢固，为什么到最后怎么还是以离婚而收场了？

实际上在我们婚后时间不长，家庭中的各种矛盾就突显出来了，主要表现在孙慧与我父亲的关系始终达不到那种和睦的境界。我父亲整天只会在土里刨，总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这与她当官的父亲相比是那样的格格不入，甚至她拒绝给我父亲洗衣服。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的母亲已经没有了，对我唯一的老父亲，我们应该不遗余力让他过得高兴才对，况且地里的农活大部分还是依靠我父亲啊。但是，孙慧时常对我父亲看不顺眼，有时甚至骂骂咧咧。我只能耐心地给她做工作，就是我父亲一万个不对，我们也得忍着，他老人家战争年代还给国家出过力，

能够活着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况且家里的多半担子还是我父亲在挑啊。不管怎么说，孙慧始终也听不进我半句的劝告。

后来，我靠养兔子赚取的家里仅有的 400 多块钱买了一台威力牌洗衣机以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即便有了洗衣机，在她给我父亲洗衣服时依然不肯下手，而是用木棍挑着，这些让我看在眼里心里感到酸楚。父亲的开荒地已经达到五亩的规模，再加上生产队分的责任田，我们总共有六亩多土地。下地劳动这对于娇生惯养的孙慧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以承受的负担，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冲破种种阻力嫁到我这里也让人家跟着受苦，我从内心里感到对不起她，就尽可能的不让她到地里去。

父亲弄的那快开荒地是几年前以每年 20 块钱的费用从生产队承包下来的，其实那个地方正是当年父亲种树旧址的一小部分。当年父亲经营的几百棵树被人分光、抢光之后，那块有几十亩的地方就成了不毛之地，多少年来外地的和本地的人们随意取土、挖沙子而形成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深坑，后来生产队进行了开发，用推土机平整了大部分地方后分给农户做了责任田。而边角地带的一小块地被我父亲承包了下来，当时的大坑有的足有一房多深，父亲愣是凭着一双手和一个小拉车，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在花费数年的时间之后而平整出了一块足有五亩多的土地。随后我们一家就是依靠这一块地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来维持家里的一切花销，再加上养猪、养兔子的收入也算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繁重的下地劳动之后，只有在晚上我才能静下心来系统的研读大学的课程，有时我跟孙慧还开个玩笑，以逗着玩的形式对她说，漫漫熬着吧，你“谢叔”有朝一日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结婚的头一年里，孙慧与我父亲的关系在我不断地劝导中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一天天在恶化。先是与我父亲分了家，让我父亲另起炉灶，后来没办法的情况下我父亲只好离家到石家庄打工去了，农忙的时候才回来。春节都没有回来，只是因为我儿子出生了，才稍信给我父亲报喜，他随即回来抱了抱小孙子就又在正月里返回了石家庄。

我父亲的离家，无疑加重了我的负担，但平日里孙慧与我父亲的那种争吵没有了，我只有更加辛苦的下地干活。在改革开放的大朝中，随着一个个爆发户的出现，有些人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家照样成了万元户。我妻子也感到心理上不平衡，总爱数落我，甚至开始嫌弃我没有本事，还怪我只会拿着书本瞎折腾。我只能给她说，学习是我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至于未来会是怎样，谁也很难预料，因为整个社会每时每刻都处在不断地发展和变革当中。

我还给我妻子讲述了我心中的复仇计划，而这个计划并不是像当年施剑翘刺杀孙传芳那样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要从精神上战胜他们。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要跟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要用情理、法理和真理来战胜他们满脑子充满邪恶的灵魂，所以我不得不首先通过学习来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她对于我所说的那些话似乎有点无法理解，但我也不求其所难，随她怎么认为吧，反正我是要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走下去。

在最初的两年里，每当我跟着妻子回娘家，我那个岳父大人也始终不想搭理我，后来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我看望了他几次才慢慢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就这样我做为女婿的地位才在孙家人那里得到确认。孙家人整体上对我还算是不错的，他们对我顽强的自学精神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岳母对我的未来甚至还抱有了极大的希望。那个时候，在晚上我还经常给孙慧娘家亲戚的孩子们辅导英语课程，骑自行车到那里有 25 分钟的路程。

有时候孙慧还戏弄我，说什么“缺老子少娘，就是命不强”，实际上这样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继而会引发我埋藏在心底里的那种对邪恶势力的极端仇恨。我时常给孙慧讲一些我们的家史，并明确地告诉她，全是那些丧尽天良的历史罪人才把我们害的家破人亡，否则我们也可能没有机会走不到一起来，即然命运之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那我们就要珍惜。为了让我的妻子对未来充满信心，我还用苏联电影《列宁在 1918》中的台词来鼓励她，“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且我还告诉孙慧，等将来有一天自己变得强大的时候，我还会找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们算总帐的，因为我不相信所有邪恶的毒瘤会永远根植于社会中，不然整个社会肯定要一 步步病入膏肓的。

每当我的话语能够打动她的时候，孙慧除了倒在我的怀里撒娇，好像行动上也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有时她还会责备我，说我在学习上弄的这些东西在社会面上吃不开，只有像她父亲那样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人迹关系才能支撑门户。由此不难看出，我们夫妻之间从思想领域就存在着极大的分歧。

1988 年我除了农忙时种地还开始了打工生涯，学文科的我干起了机械行当，后来成了一名车工，还带了一个徒弟，繁重的工作和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1989 年是一个变革的年代，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我国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也发生了最初由反腐败而演变成的社会动乱，但所有这些对我的生活并有造成丝毫的影响，我依然种地、喂猪、做车工。在平息动乱之后的夏日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二舅和我高中时的班主任刘老师。同年国庆节之后，北京的二舅陪同台湾的大舅来到了定州，我放下手里的活计，陪同他们到处走了走，但我发现这个不曾蒙面的舅舅与我这我个晚辈之间是那么生疏，临行大舅舅留下了人民币 200 元，这倒让我心里感到极端的酸楚。这个大舅舅从 1946 年去台湾，多少年来是我的母亲充当舅舅的角色，为我的外公、外婆养老送终，虽然我的母亲不在了，但这段亲情仅值 200 块钱吗？况且因为他当年打入国民党内部却又到后来无法确定身份的嫌疑，当年在学校为交不上传单的事儿还差点让我白白丢掉性命。那个时候我养猪买饲料的钱一直是个问题，买小猪仔儿把家里的钱花光了，很多时候是靠我骑着三轮车到处割猪草来解决猪的温饱问题。同时我又不得不下地干活、打工来解决人的温饱问题。无论如何，这 200 块钱也算是雪中送炭，年前欠下孙慧娘家亲戚的 100 多元的煤钱，人家要了两次了，现在终于用这 200 块给还上了。因为我父亲在石家庄打工，也没能与我这个大舅舅见上一面。

后来在我大伯等人的说合下，我父亲回到了家里。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了，因孙慧无法改变对我父亲的态度，始终也就无法成为一个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和睦家庭，我又不能长期在村民中背负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分而受到世人的指责，所以我必需在忠孝与爱情之间做出抉择，于是我选择了离婚。至于最终弄到离婚的结局，我也不得不坦言指出，这很大程度上与孙慧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在她一次次虐待我父亲的时候，她的父母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教育方式和解决方案，甚至在尊老爱幼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他们同样采取了双重标准，似乎在他们的意识中同样对我父亲甚至对我本人带有一种歧视的色彩。

后来当我郑重跟她提出了离婚建议的时候，她就会大哭大闹摆出当年冲破阻力嫁给我的那些“政治资本”做挡箭牌，随后她就会对我的父亲态度上好一些。但时间不是很长，她又会嫌弃我的父亲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来，这让我又无法接受。如此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最终在 1990 年春夏之交的季节，我们还是在友好的气氛中，心平气和的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为了感谢她当年为爱情所做出的那些感人至深的举动，以及多年来对我所付出的那片深情厚意，我把家里养猪赚取的仅有的 2000 多块钱的积蓄交给了她做为对她跟随我 5 年来青春的补偿，并把当时还算不错的一个衣柜也送给了她。儿子谢鹏跟随我生活，从此我与孙慧的那一段虽说时间短暂却又免不了让人留恋的情缘宣告结束了。

一年后孙慧嫁到了北京丰台区，尽管她已经做了别人的妻子，但多少年以后她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向我传达了她曾经对我的那份深深的爱慕和眷恋之情，并对当年虐待我父亲的种种形为表示深深的忏悔。

而我的生活和工作依然看不到有什么起色，在我苦苦支撑着一个三代人的三口之家长达近 3 年之久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在没有爱情的基础上定下了终身。

那个女书记张玉春依然还是稳稳当当地做她的官，不过她对我最后的结局会有什么感想，我也不得而知。不过，我那个与张书记关系还算不错的岳父早在几年前就丢了官位，再加上事业上的不顺便着急上火住进了医院。若干年以后的 1998 年先前的那个岳父就病故了，估算着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我与他女儿离婚后，已经没有任何来往了，当然也就无法参加他的葬礼，只是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从内心里表达了某种遗憾和惋惜。

第十六章　困境中的三代人与我面对的爱情游戏

离婚以后，人去屋空，一种无形的酸楚时常也萦绕在我的心头。这又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在外人看来，那是三代人三条光棍的家庭。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养猪了，满院子的猪舍都空了起来。为了减轻照顾儿子方面的负担，我把他送去了全托幼儿园，自己过起了以打工为主的生活，父亲主要从事地里的劳动，我打工之余有时会帮他一把。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通过考试到了定州市某国有企业做文职工作。从各方面了解到这是一家管理混乱不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有企业，而且进一步了解到国有资产在不断的流失，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领导层竟然异想天开地决定通过招商引资来挽救破产的命运。他们给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相关文件，与国外相关公司和机构发函联系合作事宜，我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头，这些领导不从自身找原因，还想让外商来投资合作，这不明摆是想骗人家的钱吗？国家的资产他们领导层可以利用各种名目弄到私人口袋里，他们想打外商的主意就没那么容易了。因为我做人的原则是堂堂正正，我不想随波逐流更不想与邪恶的东西同流合污而与狼共舞，当我看出这家国有企业的领导只不过是在上演一幕无法实现的招商闹剧的时候，我便找个借口提前领取了我的工资，然后便愤然离开了那家企业。

我们一家三口用我领取的那点工资打发了 1991 年的春节。

在那家企业工作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同样发生了一件让人心寒的事情。

与我同一个办公室的女打字员谭小姐长的眉清目秀芳龄 24 岁，在婚姻问题上一直挺挑剔。在后来她了解到我是单身还有台湾的海外关系，又担任英语翻译的重要职位，就一定认为我很有来头，而我也只有 27 岁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于是她便主动与我套近乎，问长问短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

那个时候为公事我曾经与台湾高雄中国钢铁公司任部门经理的大表哥王通政联系寻求招商事宜，但是没有结果。而实际上我们直系亲属的海外关系却没有任何的亲情可言，在台湾有两个表哥分别在高雄和台北，一个表姐在台中，他们不仅都生活富足而且在社会上也是有头面的人物。然而他们都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根就在中国大陆的河北省定州市孟家庄村，他们更不想关注他们已经含冤去世的亲姑姑唯一的儿子在多少次大难不死之后依然在逆境中为了生计而苦命的奔波。后来听北京的二舅说当年大舅舅首次来大陆的时候还担任着一份在台中一所大学的工作，并承诺退休后将一次性的全部的退休金分给在大陆的所有亲人，以表达他背井离乡几十年愧对父母以及因他的海外关系给大陆亲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在大舅舅退休后还没来得急实践他的承诺就因病去世了。多少年以后听二舅说大表哥携全家到大陆旅游照样没有到定州寻根，再后来他们就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定居了。像这一类连血缘的亲情都没有的人们，即便是做了洋人又能怎么样呢。况且我为有他们这个海外关系当年差点丢掉了性命，难道他们就连一句安慰的话也不值得给我说一声吗？如果他们能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又会做何种感想呢，我真为有他们这样的海外关系而感到羞愧难当。

试想后来不论国民党主席连战还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大陆访问时，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根祭祖，常言说叶落归根，而我台湾的直系表哥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根在哪里，即便是有富足的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也同样会失去做人的意义。

那一段时间里谭小姐几次提出到我家玩，都被我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这在她看来觉得是高攀不上我这个大公子，不免让她有些难过和失望。后来我离开了那家公司，让人没想到的是她居然打听着找到了我家。恰好她来的时候我和父亲都不在家，后来邻居告诉我说有位漂亮时尚的姑娘来找我，她让邻居带她到我家院子里看了看，然后不等我们

回来就匆忙走开了。我心想这下子可糟了，她肯定会比当初觉得高攀不上我的时候会更加的难过和失望，因为映入她眼帘的不是她想象中的花园别墅而是满目疮痍的猪舍和一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旧房子。

春节过后，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去了西关南街一个远房哥哥家里做工，这里主要为邯郸武安的煤矿加工生产滑轮和井下除尘喷水头，因他们的家人都有各自的正式工作和职业，雇工有时也到他家的责任田里干一些浇水、锄草及收获的农活。

在这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姓石的女孩，她初中毕业后到棉纺厂做了一名纺织女工，自学了高中课程后又读了函大中文专业。我们几个雇工在地里干锄草的工作累了以后来到一个树荫下休息，那个女孩也正在那里复习函大的功课准备迎接考试，就这样搭上话以后就算认识了。共同的自学经历，似乎让我们的距离拉近了一些，她也说的挺干脆，“认识了就是朋友，希望我们在学习上互相勉励。”从那以后，我们时常会在空余时间相约出来走动一下，主要谈论学习成果以及探讨人生的前途和命运方面的一些事情，还时常谈论一下做人的道理和原则问题。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得到更多的了解和信认，她也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理想也让我认识到，她就是我未来理想中的爱人。

后来她的父母知道了我们交往的一些内幕后非常生气，我做为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到她家里打算做点调解的工作以打消他们的某种偏见和误解。但是她的母亲见到我后还没等我说上多少话，就先来了脾气，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女儿嫁给像我这样一个离了婚的叫花子，而且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我离她的女儿越远越好。而那个女孩也并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和行之有效的表现，甚至抱怨我惹得她的父母生了气。看来我也没有机会再说别的了，随即以安慰的语气向女孩的父母做出承诺：“我保证从今天起断绝与你女儿的一切来往，即便是在街上邂逅也再不和你的女儿搭话了，你们放心好了，我会做到的。”

尽管我曾经幻想着与这个女孩比翼双飞并在朝夕相处中成就一番事业，尽管我曾经对这个女孩付出了巨大的真情实感，而且至少在那以后最初的 3 天的时间里痛苦的心境让我茶饭不思，但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失恋的打击，因为我似乎意识到从某些方面而言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我只不过是在无能为力之中还在尽力挽救那个败局而已。

又过了几天，我收到从邮局寄来的女孩写给我的一封长达 7 页的分手信，那真不愧是出自学习中文专业的手笔，字里行间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文采和那些甚至让人感动的字眼，但是，我分明看得出来，她对我未来成功的希望还是那么的没有把握，有谁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做赌注啊，所以，这对于每一个正常人做出这样的思维和抉择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让人伤心的是她在信中提出与我分手的另一个理由竟然是歌词中的一句话“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而且直截了当的说我不潇洒是让她无法真正喜欢我的重要原因。试想我处在那样的逆境中，就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我还能潇洒的起来吗。在这种情况下，她没有给我爱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的奉献》，当然她也就更不愿意等到我将来《潇洒走一回》的那一天。当然，她所作出的抉择都是她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也没有义务要为我做出任何牺牲，所以，我同样不会、也没有理由责备她。

虽然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社会是生存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金钱照样也是万万不能的。金钱不仅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潇洒，也可以让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金钱也同样可以让一个上进的人变得堕落而走向毁灭。

从那以后一直再到 16 年后的今天，从印象中只是在最初的三年里共与那个姓石的女孩邂逅相遇过两次，而且每次我都实践了我不再与她搭话的诺言：有一次她在家门口附近的街口上站着，我骑着自行车无意中从她的身边 走过时感觉是她，在我走出很远的时候回头发现她的眼神还在注视着我远去的背影；另一次看到她在一个路口与一位潇

洒的青年谈笑风生的情景，她的眼神与我的目光又不期而遇，我只给她送去了一丝祝福的眼神之后，便迅速躲开了她的视线，以避免给两位新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她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如何，我无无从所知，真希望她如果能看到我写东西后，还能做为普通的朋友再次探讨 16 年前的人生话题，应该会有一种别样的现实意义，而那些更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话题，也只能唤起我更多对往事不堪回首的记忆。

1991 年的初冬时节，我离开了西关南街，通过前文提到的那个当家子姑姑的儿子王国辉介绍到西关西街的一个车床加工作坊打工。这里有五台车床和相关辅助设备日夜不停地为定州市外贸加工生产出口到美国的体育器材杠铃杆。那个老板姓李与我同岁，他有个未婚的妹妹在棉纺厂工作，工余时间和晚上常常做我的下手，因为我只管车床的操作和保证工件的精度，另外有个人需要配合般运原料和成品。有时这个妹妹与我聊得还挺投机，巧合的是她与我刚分手的石姑娘在同一个车间工作，就这样时间久了做为单身汉的我也免不了对这个新来的漂亮妹妹产生一点想法，但是有了前车之鉴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我只能默默地干我的工作。

那段时间里我跟王国辉是最好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说甚至有时吃住在一起，后来我就把这事告诉了王国辉，他说人没有贵贱之分，做为单身追求爱情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并鼓动我一定向她表白。但我心里有自知之明，始终也没有向她表白什么，而是把工作之余的精力继续用在艰苦的自学上边。那个时候我订阅了一份英文周刊《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从中了解国内外的时政新闻以及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与走向问题，用自己的观点去评价每个事件背后的是是非非，直到后来回想起来我当初所做出的那些评价都经得住了历史的考验，所以我的想法与时代的发展是同步的。所有这些，依然鼓舞着我将来的复仇计划，因为真理在我的心中时刻都在提醒我不能容忍邪恶的东西永远压在我们的头上，我依然有信心等待翻案的那一天。我甚至想到了如果将来在国内最终也无法给我们平反的话，我也要把我们几十年的冤屈提交到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让世界来做出一个公正的评判。有了这个决心，我也就具有了忍辱负重的勇气和承受任何打击的能力。

因为在一年前我已经通过了英语四级的自学考试，在打算将来考英语六级的同时，还想学另外一门外语，恰好大连外国语学院主办的《学日语》节目在电视上要开始重播了，我赶紧买了教材，但到后来只学会了日语五十音图以及日语平假名、片假名的区别和用法之后我就放弃了撑握日语的想法。因为一方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实在让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投入到正规日语的学习中了，另一方面与日本人还有其它方式的交流手段。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不懂日语照样可以用笔谈的方式解决了语言问题，这种作法在我走上集邮生涯后与日本人的交往中也切身得到了验证。就是直接用繁体汉字与日本人交流，他们也用简明扼要的汉字来与我交流，基本上可以准确地弄明白各自想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但这其中也包含着各自的智慧和判断能力，否则也可能会弄出笑话来。比如日语中的“手纸”是写信用的信纸，而不是我们卫生间里的东西，“切手”是邮票的意思，“邮便番号”就是邮政编码等等。

因为 10 多年前的集邮经历，还有我跟老师互赠邮票的举动，让我也想到了将来做邮商的打算，况且我也从报章上了解到国际计算机行业巨头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在中学时代还曾经是一名出色的邮商，而且通过兜售集邮品而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不但解决了他的学费问题还为后来上大学后成为计算机行业领头人发挥了不小的启蒙作用。万事开头难，我得先学会购买邮票，于是跟国内很多邮商开始联系，购买他们的各类邮票，后来还通过一家邮票社与荷兰一位名叫迪克·德· 博依的集邮者建立起通信联系。除此这外，我还从旧书摊上买来大量过时的集邮报刊在工余时间进行学习和研究。

就这样在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中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1992 年的春天，在我家的一次聚会中，我与我的老板李某还有王国辉一起都喝酒，王国辉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我曾对他说过的那些话，这让我的老板非常不高兴，因为老板也说出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让我也处于非常尴尬的

境地而且感到无地自容。在当时环境下，我只能用古人说过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来从心里上给了自己一个安慰。

随后在王国辉的鼓动下，我辞掉了那份工作，并在他的建议下打算搞点自己的实业。

我打算先搞一个流动照相服务，为人们拍外景照片赚钱，于是拿出自己的积蓄又向王国辉借了几百块钱购买了摄影器材，后来还向一个邻居借了 100 块钱买遮阳伞。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就别说赚钱，连饭碗都难以维持了，只好把照相机束之高阁而另想它路。王国辉也是搞机械加工的个体户，这个时候他在家里扩建车间的工程完工了，我临时给他帮了几天忙，还做为一名电工给他把所有的供电线路、配电盘和仪表安装到位直到试车成功。在先前我借他的钱还上的前提下，他又给了我 100 块钱做为这几天的报酬，让我心里挺感动，因为我本想是为报答他而无偿给他帮忙的。当时这 100 块钱是我身上仅有的钱了，先前家里的钱除了日常花销和购买邮票都花光了。这 100 块钱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我也不敢动用它。

我父亲当年的那块 5 亩多开荒地因铁路修建货场占了一部分，这个时候也不到 3 亩的面积了。这段时间我帮着父亲到地里修整棉花，又不得不从那 100 块钱当中拿出 10 块去购买农药。

再后来有人给我提亲了，两个媒人领着女方还有女方的一个堂弟到我家来了，听媒人说女方的老家是陕西安康的，嫁到东留春村后被丈夫抛弃了，还带着一个 1 岁的小女孩。听了女方的遭遇让我感到挺同情，于是我又从余下的 90 块钱中花掉了十几块钱买来酒菜招待媒人一行人。但后来这门婚事也没了踪影。

在此期间荷兰的朋友迪克•德•博依寄来了 100 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是 870 多块钱，这对我当时而言是一笔很大的钱了。但是，这钱是朋友委托我购买中国邮票年册、小工艺品、音乐盒带还有光盘什么的。有些东西在我们定州是买不到的，我只好跑到石家庄进行采购，然后分批从邮局寄走，重量较大的中国工艺品邮寄费用高达 100 多块钱。做人首先要讲求诚信，即然人家寄钱来，就是对自己怀有充分的信认，那些钱自己一分都不能动，我如实把包括我搭车在内的费用以及购买物品花掉的钱列出详单告诉荷兰的朋友，当然花费的时间就算我自己的了，做为酬谢他寄给我精美的荷兰邮票。

王国辉告诉我婚姻上接连失败的原因是我寒酸的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先前那台被我弄坏的 12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年修好后一直又看了很多年，到后来彻底不能工作了我才拿到街上电器维修部卖了 25 块钱。在这种情况下，王国辉一下子给我拿来 3000 块钱让我改善居家环境，我心想当初他借给我买摄影器材的几百块钱还没有着落呢，这么多的钱我拿什么还啊，就谢绝了他的一片好意。而王国辉执意要我收下这笔钱并承诺说将来有能力了就还，没有能力还的话就算弟兄的一片情意送给我了。就这样在王国辉的操办下，花 2600 元买了一台 21 英寸的北京牌彩色电视机，余下的钱还在回民街的天工家具店订做了一个衣柜，另外买了一件长沙发。

到了秋天，王国辉又给我在城内苍门口街找到了一个做车工的地方，在那里前后干了有半年的时间。第一个月我挣到了 400 多块钱后就赶忙把很久以前借邻居买伞的 100 块钱还上了，再后来还清了王国辉借我买摄影器材的几百块钱，并承诺以后条件好了还他那个 3000 块钱，除了日常开销我又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金钱了，尽管数额是那么的少。

入冬的时候，一个做批发瓜子生意的村民找到我家提亲来了。他说，“西关东街有个叫王荣伍的老头开个小卖部，老两口经常到我这里批发瓜子，时间长了就混熟了，说他有个离婚的女儿，让我给张罗一下，所以就找到你这里来了，也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我的父亲常说我是志比天高，命比纸薄，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择日见面。第二天媒人就带着女方并在她嫂子的陪同下来我家了。这次比先前好多了，至少有沙发可以坐了，还有个放杯子的茶几，另外最显眼的是那台当时还不十分流行的 21 寸平面直角彩电。寒暄过后直切正题，女方离婚后带一个 5 岁的小女孩，而我这边带一个 6 岁的男孩，至于各自离婚的原因也都大致描述了一番。女方以往的生活上也确实有点坎坷，先前的丈夫嗜赌成命，不顾家不算

还对媳妇非打即骂，在无法忍受其丈夫虐待的情况下才选择了离婚。这些让人听后不免会有一种同情心油然而生，但我感觉到在我面前的不是我希望中的女人，因为给人的印象是比较传统而且没有文化。

过了几天媒人说女方那边没有意见，让我表态，而我的内心正处于极端的矛盾甚至是相当痛苦的境地而一时难以做出决择。我就借口说这段时间老板的活特别多，忙不过来，我也得需要有个考虑的时间。就这样婚事暂搁置下来，我每天照常上班干我的活，而且来回都经过西关东街的那个小卖部，有时还看到女方带着小孩在她父母开的这个小卖前逗留的身影。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邻居赵颜某的女儿找上门来了，说同在兽药厂工作的一个 22 岁的姑娘，想找一个有文化、思想成熟的男子为伴，就正好想到了我，并把她带来了，要我到她家里会面。见面后的印象一时也不好说，感觉女孩有点轻浮，结果如何我也很难预料，因为已经看出了她对我的儿子存在某种看法。头一次见面不便多说，我也就借故提前告辞了。

这个时候大伯也开始规劝我，要我在婚姻问题上现实一点，不要好高骛远，并明确地要求我接纳西关东街那个带小孩的对象，儿女双全也是一件完美的婚事，并提醒我要是与这个年轻女孩发展下去不会给我生活上带来什么好的局面。

时节已进了腊月，眼看年关将至，我抓紧时间做工，每天干活不少于 12 小时以上，这样好多挣点钱过年用，另外儿子入幼儿园的钱已经欠了人家好几个月了，我已承诺年前一定还上的。

一天晚上兽药厂的女友约我去看电影，在路上我们又做了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谈论的焦点还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对我父亲的赡养，然后是我儿子的前途，她说婚后短时间接受不了我的儿子，是否可以先把他寄养在哪个亲戚家。我明确地告诉她，对我儿子的任何歧视都是不能容忍的，孩子是无辜的，在以往他已经受到了伤害，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再让他受到伤害。我还告诉她，做人的行为准则就在于讲求本分厚道，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讲理，不管为人处事，只有从道理、情理和法理上说地过去才能算是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我们谈到最后，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我也不得不提前跟她说再见了，就这样电影也没有看成，弄了个不欢而散，而实际上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跟她一起看电影的。

第十七章　第二次婚姻与和睦家庭

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在昏暗的路灯下漫无目的地走着，脑子里浮想联翩。我又想到了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那张狰狞的面孔，还有那个“破鞋”书记仿佛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而且正张开血盆大口嘲笑我……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鬼使神差般地来到了西关东街女友王秀红二哥家的院门外。

那是前不久，女友约我到她暂住的二哥家里做客，她的父母和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他们王家门里一个重量级人物时任河北省中兽医学校副校长的王真都在场作陪。如此高规格的接待，让我心里并不舒坦，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在考察我。但我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神态，而是与他们畅所欲言，任何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开诚布公、

无拘无束的讲出来。

中兽医学校是定州当时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而且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的专门培养兽医人材的学校，曾经为内蒙古牧区等全国很多地方培养了大批专门兽医人材，后来并入河北农业大学后改称中兽医学院，王真当了院长。实际上他们王家人对王真的评价并不高，在这些王家族人的眼里他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角色，最后终于因腐败问题而被革职，因情节不是很严重再加上他主动退赃才没有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从院长的位置一下了落到讲师级别又回到教室里讲课去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女友的父亲王荣伍与我的父亲谢金更不仅年岁相同都属龙，而且当年参军时在同一个工兵营，而且还参加过相同的战斗，仅仅是不在同一个连队而已。当年在解放太原的战役中，王荣伍所在的部队率先占领了阎锡山最后的据点，在冲进阎锡山办公室以后，他拾起了一张散落在地上的阎锡山的照片想仔细看看这个手下败将长的什么模样，然后就想做个纪念随手装进了衣兜里。这个举动恰恰被他的战友看到了，战友告诉他说那样做会犯错误的，他又赶紧把照片从衣兜里掏出来撕掉了。

女友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也有着相同的性格，那就是一生勤劳，为人老实本分而且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讲原则。已经到晚年了，老两口为了不增加子女的负担，依然自食其力在街面上开着那间小卖部，真得让人心里挺感动。说是小卖部，其实就是临时搭建的两间草屋，除了卖日常生活用品，吃住都在里边。王荣伍又给我讲述了小卖部刚开张不久遇到的麻烦事。当初管片的两个税务人员找上门来，要让办理税务登记，还说要入什么微机，一下子把王老爷子惹恼了，他与税务人员辩解道，“做这么个小买卖只是打发晚年的生活，一天下来赚的钱根本就不够维持日常生活，至于定州的贪官弄了国家多少钱，有谁受到了惩罚，社会不公平就不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税务人员拿他没办法，只好以不再登门了事。

收税的不来了，工商局的又有人来收管理费了，这次王老爷子干脆把当年荣获的战斗英雄证书拿出来甩给了他们，说道，“我这么大岁数了，命是从枪林弹雨中捡回来的，我不向国家要钱就够意思了，开个小铺想自食其力也犯法啊。”两个年轻的工商人员面面相觑，只好走人了事。

在这里坦诚展示这位老人的风格，虽然没有体现出一位老英雄的高风亮节，但也揭示了社会现象。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针对弱势群体本应是照顾而不是向他们索取。

后来温家宝总理的减税政策从法律上免除了像王荣伍他们这些社会群体的税务负担。

至于定州市的腐败问题还是极端严重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救药的，也的确没有看到把谁怎么样，这又怎么能够安抚民心呢。只是后来的市委书记和风因为震惊中外的“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受到牵连才从侧面也曝出他贪污受贿的事情来，不然人家不只是照常稳稳当当地做市委书记还会当更高级别的官儿。按老百姓的说法，重量级的人物已经高升了，和风只不过是赶上了倒霉而在牵牛的人走后，他仅仅拔了个拴牛的橛子而已。在定州这个只有 1000 平方公里的县级市里，腐败问题真是到了让人怵目惊心的地步啊，真得让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看在眼里而急在心里啊。

从那次在女友家聚会以后，他们一家人都一致认为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女婿，从而不断地通过媒人向我传达与婚嫁相关的各种信息。我这个人向来做什么都实事求是，从不搞那些虚伪的东西，我对这个女友一直也没有产生好感就更别说什么喜欢，所以我的内心世界处在了痛苦的煎熬之中。一方面如果结婚的话我认定会是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另一方面如果断然拒绝这门婚事，不仅会伤害女友的心还会让他们全家人对我的那片期望化为泡影，而对两位老人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因为他们认定了我才是他们女儿将来唯一可以靠得住的丈夫。

我站在门外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敲响大门，她打开门见到我非常高兴，进到屋里后看到她 5 岁的女儿已经熟睡。她们母女暂时住在她二哥家里，这天碰巧她二哥一家人有事回娘家去了，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在家里。我们又坐下来谈

了很多话题，我再一次提到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讲理，不管是情理还是法理我都要讲，她说她也没有可多说的，为人处事她只会做到通情达理，并向我承诺对待我的儿子就像是她自己亲生的一样，而且保证孝敬我父亲让老人幸福的安度晚年。从她朴实的话语中同样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而且在她以后跟随我的多少年中，她实现并不断实践了她的诺言。

在我们的谈话中，虽然她只有初中文化，但我们共同的语言却越来越多，也终于促使我恒下心来决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那天晚上她执意要留我陪她们母女过夜，说我走了的话她们会感到害怕，我借口说父亲还在等我回家呢，不回去老人家会不放心，过了午夜时分我才回到了家里。

1993 年的初春季节，我与战斗英雄王荣伍的二女儿王秀红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当时什么新家具都没有购置，人家一分钱的彩礼钱也没有要，还从王秀红 2000 块钱的个人积蓄中拿出 1500 元为满足我听音乐的嗜好从石家庄购买了一台长江牌组合音响作为陪嫁。因为我过去曾经跟随堂哥有过做木工的经历，于是在工余时间里从大伯家借来工具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一个碗橱，另外做了一个小饭桌和几把椅子并同样亲自动手刷好油漆，就算是添置的几样家具了，直到现在生活变得富足了这几样东西我们依然在使用中。我几个月中打工积攒的钱勉强够支付婚礼宴席的费用，当时只请亲朋好友在家里坐了五桌。

那天我的两个姐姐也来了，见到她们我却哭的不像样子了，人们也不知道我哭的理由是喜极而泣还是怎么回事，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那是因为我与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人结婚了，这个事实从此再也无法改变了。

婚后我终于从同样烦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而集中精力工作和学习。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最终辞掉了车工，把家里的猪舍修缮以后把全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 30 头小猪仔，另外又借了一些钱买饲料，到第二年卖猪赚取了一笔收入再加上卖掉了一处爷爷留下的院落又分得了几午千块钱。除了还清了王国辉的 3000 块钱，还用余下的钱开始正式做集邮品生意了。

在生活上我妻子兑现了她的诺言，我父亲得到了很好的关照，两个孩子也如同亲兄妹，在村民眼里我妻子是个难得的贤妻良母。常言说“和为贵”，和睦融洽的家庭生活给这个并不富裕五口之家带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后来我们又把院落进行了整理，拆除了所有的猪舍，并永远告别了养猪的生涯。

从结婚到现在，一转眼就是 15 个年头过去了，在这期我们都付出了艰辛和汗水，共同享受着人间的苦与乐，而且和睦家庭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恰恰是人间真情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发展。期间两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考入了大学，而且 2008 年发稿之时女儿谢玲已在保定学院英语教育专业毕业，将打算做一名人民教师，儿子谢鹏明年就要完成在石家庄经济学院软件工程专业的本科学业。他还在学校组织的科研立项活动中做为技术骨干，利用课余时间编写出了一套全新概念的电子商务网上在线购物系统获得成功并已经应用到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发挥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经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做为他的父亲，我也在自己的网站服务器上率先使用了儿子编写的新程序，从而全面抛弃了在 2003 年曾经花费上万元请互联网运营商制作的那套存在很多缺陷和漏洞的旧程序。

让全家人悲痛的是我那个曾为战斗英雄的岳父王荣伍于 2008 年农历正月初三去世了，亨年 81 岁。

而我同样参加过解放战争的父亲，也是 81 岁了，目前身体况状还过得去，让他看到平反的那一天对我同样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已经在 26 年前含冤去世，绝对不能让父亲再带着遗憾离我们而去。

对于我个人而言，事业上的成功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多少年的心血也总算没有白费。但是回想到血和泪的历史以及那两个依然狰狞的魔鬼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同样让我的心情又无法平静。我说过要与杨庄子社区里依然存在的恶势力要一起算总帐的，首先要从精神上战胜邪恶，我能。

第十八章　集邮生涯带我走向成功之路

正是当年我与恩师互赠邮票的那一幕让我最终选择了集邮家和专题邮商的职业。因为从小小的邮票中不但让我学到了更多从书本中得不到知识更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的深刻哲理，正如在我的集邮网站介绍中所说“专题集邮与传统集邮相比更具有挑战性，它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面向全国刚开始做函购邮商的时候，在身为亨达塑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朋友张军支持下通过他的公司计算机排版和桌面印刷系统帮助我搞定了一百多份邮品目录并寄给我的客户。但是我不能长期麻烦人家啊，于是就想在印刷厂批量印刷邮品目录。当时国营的印刷厂要我开什么准印证才可印刷，考虑到干什么事情都要以合法为前提，我就先到文化局咨询有关准印证的事宜，定州文化局说要到保定办理准印证。

1995 年夏天，我冒着酷暑乘汽车来到保定找到了保定市文化局。当时文化局一位叫何建平的干部接待了我，当我把朋友张军帮我印制的邮品目录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甚至没有顾上看一眼就突然欣喜若狂地大声喊叫起来，“大伙快来看啊，一份送上门的非法小报，至少得罚款五千元。”

虽然我在生活中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但是我在社会上还没有见过有多少接触官场的大市面，这位干部的叫喊把我吓坏了，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邮品目录怎么就成了非法小报。所谓邮品目录，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集邮品列出明细单，这包括发行年代和国家，邮品的名称和相关背景简介，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邮品，就简要介绍其生平和获奖原因，当然还要标明邮品的价格，而印刷邮品目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向客户出售集邮品。

这位干部在听了我详细介绍以后才改变了主义，并对我所从事的集邮事业表示支持。关于准印证的事情，他说因为印刷邮品目录不是为了出售目录本身，也就是说目录本身不存在赢利性质，再加上仅用于集邮者内部交流，所以也就不需要准印证了。

我在这一时期也有大部分费用花在了国外集邮报刊的广告宣传中，像收费较高的英国《吉本斯邮票月刊》（Gibbons Stamp Monthly），《加拿大邮票新闻》（Canadian Stamp News），瑞典的《集邮家》（filatelisten），还有亚太地区著名的《澳大拉西亚邮票》月刊（Australasian Stamps）等等，我还加入了美国专题集邮协会并在其会刊《专题时代》（Topical Time）上做陈列广告，另外还寻求在一些国家为集邮者提供免费服务的集邮刊物上做广告宣传。

那时候我大致每三个月更新一次目录，因为当时条件下在印刷厂的制版和印刷费用远远超出自己的收入状况，所以仅在印刷厂印刷了一次就暂停了。

此后我到城内的人民商场花 200 多块钱买了一台油印机，自己亲自刻钢版蜡纸来手工油印，我还把油印的英文版中国邮票价目表寄给国外的集邮者，有位英国青年还给我寄来 100 英镑购买了中国古典名著系列的《红楼梦》、《西游记》、《西厢记》、《牡丹亭》等很多邮票作为礼品送给他的未婚妻。

接下来我又到街面上的打字社让人家用电脑编辑排版后打在蜡纸上然后带回家油印。用这种方式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 1998 年有了自己的电脑之后，才使自己的集邮事业有了显著的改观。

1996 年 2 月，我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中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何建平并看到了他熟悉的身影，因为才半年前在保定文化局我与他有过一次接触，而且给我留下了较深的记忆。惊动中央领导的陈建国等人制作贩卖淫秽图书《奇异的性婚俗》一案告破以后，曝出保定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处干部何建平，违法办理了印刷该书的准印证。经有关部门鉴定，《奇异的性婚俗》确属淫秽出版物。因该书有污辱伊斯兰教的内容，各地穆斯林群众纷纷提出强烈抗议。

判决书中指控被告人何建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也为这个曾蒙过一面的干部朋友感到遗憾和惋惜，也不知道他现在何处，真想有机会与他再会会面，重新探讨一下人生以相互勉励。

1999 年在我并不十分宽裕情况下，我毅然决定参加国际集邮联合会赞助的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集邮展览，因为我心里明白，世界集邮展览堪称是集邮界的奥运会，况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之即，是在中华民族逐步走向强大的时候首次在中国举办的集邮盛会。我拿出一万元率先租下了北京国际展览中心的一个邮商摊位，当“河北谢强专题集邮社”的名字出现在中英文对照的《中国 1999 世界集邮展览－展销指南》中的时候，曾经让我激动不已，因为那是我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9 年 8 月 21 日，我如期参加了当年秋天在那里开幕的为期 10 天的集邮盛会。那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担任中国’99 世界邮展组织委员会主席，当时的李鹏总理参观了邮展。

在那里我不仅见到了国内外不曾蒙面的老朋友，同时也结识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

在世界邮展结束后的当年，我依靠自己研究网页制作技术，随即开通了集邮网站(www.jy668.com)，后来经过不断改进，使网站功能逐步走向成熟。

经过长达 15 年的艰苦自学才最终完成了几个专业的本科学历，直到 2000 年才全面停止了任何方式的自学，在这个过程中当初满头的黑发变成了一头白发同样是对我所付出的艰辛一个有力的见证。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获得什么文凭和学历证书，因为从根本上讲我不是为了文凭和荣誉活着，我仅仅是为了生活或着说怎样才能生活的更好、更有意义而活着，为了国家和整个社会怎样才能繁荣昌盛而活着，也为了将来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帮助那些苦难中的弱势群体而活着。在我的集邮网站中有这样的介绍，“社长谢强先生，生于 1964 年 5 月 5 日，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早年曾任涉外企业办公室主任兼英文翻译等职，因中学时代就有集邮的爱好，后辞职创立了专题集邮社并成为职业邮商。”这些文字说白了就是在我多年的付出之后，自己给了自己一个面子，或者说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台阶儿下，仅此而已。

多少年来我完全是靠自己打拼、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正如台湾的一个朋友给我尊称为“一人公司”，周围的朋友则称我为“高干”，可不要误以为我也是那种只会学习而不会实践的高级干部，我仅仅就是一个高级干活儿的人而已。

因为在我的集邮家兼邮商生涯中，要进行翻译、编辑邮品目录、管理集邮网站等所有的关键性工作都是由我一人来完成的，没有文化的妻子有时只能帮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集邮是一项老少皆宜的大众性文化活动，从 1840 年邮票在英国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百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集邮的热情经久不衰，似乎没有其它哪个活动比集邮更具有兴旺发达的生命力。

在中国当来势凶猛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一切传统文化的精华都被扣上“四旧”的罪名加以横扫。“文革”中集邮活动被全面封杀，把集邮文化作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归属于“封、资、修”范畴而大加批判。不少集邮者正常的集邮活动被诬蔑为“搞投机倒把”、“搞特务活动”。很多集邮家被抄家、批斗，大量的集邮藏品被付之一炬，使集邮者在私人财产受到粗暴破坏的同时，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伤害。

“文革”结束后，集邮活动才在全国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类文化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往传统集邮侧重于为单纯的收藏和增值而集邮的片面性已经向更深层意义的文化型、知识型和学术型方向发展。

所谓专题集邮说白了就是通过邮票和相关集邮品讲术某个完整的故事。集邮家们在编组专题邮集的过程中就如同是一位作家或科学家，文章或论文写好了必需配以相关的集邮品做为插图使故事或论文更加形象、更加让人们容易接受和理解。文章当然好写，但是从世界范围内收集那些与之相关的集邮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而专题邮商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些集邮家们无法实现从世界范围内收集所需邮品的烦恼才应运而生。集邮展览正是为这些集邮家们提供展示他们创作成果的竞技场，文字描述再有多么高超的集邮作品如果缺乏相应的好邮品的衬托都会在高级别的集邮展览中败下阵来。

另一方面专题集邮展览侧重的是邮品多样化而文字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以说获得大奖的专题展品很多时候是靠价值不菲的好邮品来说话，而邮品也不仅仅 是单纯的邮票，它是一个在邮政领域所使用的东西的一个笼统的名称，还包括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各类使用过的贴有邮票的信封、邮资机戳、销票邮戳及在邮票诞生之前所使用过的信封等等。想做一个称职的专题邮商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类东西，语言关是最大的一个难题。因为在向集邮家们出售这些邮品之前，邮商必需以极端负责的心态把邮品中所表达的文字信息准确无误地提供给买家，胡编乱译将同样会给买家带来不何估量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当然英语对谁也就无所谓，其它小语种可就把我难坏了，我的外国朋友中没有一个懂中文的，有时不得不请国外的朋友先将相关文字信息给我翻译成英文。其它较大的语种比如像德语、法语、葡萄牙语、甚至还有俄语就只能依靠自己现学现用来解决问题。其实方法也挺简单，我在电脑中安装支持多语种的键盘从而打出相关的单词后查电子词典，只是效率有时真的不敢恭维。到后来无形中竟然也撑握了除英语之外的其它语种大量很有用的词汇，从而逐步减少了查词典的次数，当然也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如今在业余时间里，我还要兼职几家公司的法律顾问和重要的文职工作，有时还要免费为单位和个人解决计算机应用方面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来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在我付出了多年的艰辛和努力以后，做为集邮家和邮商我终于积累下价值不菲的集邮藏品，而且在生活上有了自己的大房子和第一辆汽车。从我的切身经历中让我真正懂得了自强不息的涵义，它不是凭空喊出来，是靠流血、流汗干出来的，正如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那种不抛弃、不放弃体现出同样的哲理。

但是不管到任何时候，发生在我们家里的一系列悲惨遭遇所留下心理阴影，仅靠杨庄子社区干部说的那些弥天大谎怎么能够抹去？那所有发生的一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只有没有被歪曲和篡改的历史才能正确诠释这一切。所以，我自始至终一天都没有放弃过将来为父母讨回公道的那一天，我自始至终都在期待着平反的那一天，我自始至终都在盼望着“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那一天。

从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算起，我们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到现在差不多快 30 年了，但我的记忆深处依然坚信着 1980 年中共中央在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时的承诺：中国共产党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一个有错必纠、光明磊落的马克斯列宁主义政党。

第十九章　怀念我的荷兰好友迪克·德·博依

在我刚刚从事集邮生涯的时候，我的荷兰好友 迪克·德·博依（Dick de Booij ，1963－1998）曾给我了极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在 1998 年好友就不幸因病离世了，后来与他的家人也失去了联系。我打算当条件成熟的时

候设法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并对他们当年曾经给我的帮助当面表达谢意。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我们友谊和他传奇经历的英文稿，发表在 1995 年第 4 期的中英文双月刊《中国集邮》杂志上。那份杂志当时发行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还算精明的我没有要杂志社的稿酬，做为回报他们用英文为我免费登出了三期邮品交换广告。

我最初认识这位荷兰朋友是通过已故著名集邮家姜治方（1907－1980）的后人，当时兼任国内某著名邮票社社长的姜坡先生介绍下在 1991 年才得以与博依建立起通信联系的。

姜治方是我国著名爱国集邮家，出生于湖南长沙。1925 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的集邮活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经常到毛泽东办公室收集邮票和信封。1927 年姜治方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33 年他在布鲁塞尔举办的航空邮展上获银牌奖，1944 年在葡萄牙邮展上获镀金奖，1957 年获莫斯科国际邮展一等奖。他是我国第一位在国际邮展上获得金奖的集邮家，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70 年的一天，日本一位著名集邮家来华访问，跟中央领导说："你们中国有一位最著名的集邮大家，他叫姜治方，我想见见他。"领导听了愣了一下，回过神来后便吩咐下属："谁叫姜治方啊？赶紧找到他到北京来。"

姜治方晚年在湖南大学任教，著有《集邮六十年》一书。后来仅在一个不大出名的媒体上披露了这条日本集邮家和姜治方会见的照片，介绍了他一生热爱集邮的感人事迹。

我所有幸认识的荷兰朋友当然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他在"文革"结束以后新产生的一些中国集邮名家当中还是较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别的朋友给他弄的中文名字叫博获歌。

迪克·德·博依是一位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热爱中国文化的荷兰青年，他那颗菩萨般善良的心同样对我影响很大并让我终生难忘。他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了西红柿等蔬菜，就是面对那些害虫他也不想用杀虫剂把它们杀死，反而却把它们从蔬菜上小心翼翼地拿下来放到器皿中另外给它们提供食物，这样的话他的菜不但保住了，而那些虫子的生命也得以保全。他在信中给我开玩笑地说，"虽然一条条虫子把我的西红柿咬的不象样子了，但我还是不打算剥夺它们的生命，因为这些小虫子在主宰世界的人类面前它们同样是弱者。"

那个时候我们仅限于用英文通信，他说在荷兰的青年一族中，使用英语的频率甚至超过了荷兰语。在他打给我的英文信件中最初都是清一色的纯英文，但后来他娶了中国姑娘做太太，打字机英文与夹杂手写汉字的信件越来越多，他向我保证将来一定要学会汉语好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通并真正用中文与我沟通。他是 Den Helder 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曾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广泛的介绍中国文化、音乐和京剧，由其是他对中国摇滚歌星崔建的作品情有独钟，比如《一无所有》、《梦回唐朝》等，他还向当地听众介绍我与他之间从相识、相知到成为兄弟般的朋友的整个传奇故事。

我向他讲述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背景，共同探讨世界上为什么依然会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我们意见是一致的，那是因为社会上还存在着正如鲁讯先生所说的"人肉的筵席"和"人肉的厨房"。有时候人类社会中的弱者也像那些咬他西红柿的小虫子，任何人喷点农药都会把它们统统杀死的。

而掀翻"人肉的筵席"，毁掉"人肉的厨房"也恰恰是我们党和国家所面对的如何打击诸如腐败和社会黑恶势力层面上长期的政治任务。

我还给他讲述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定州古城，还有象宋代名家苏东波，明代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来过定州一些情况；当然最主要的还有那个 1000 多年历史的定州开元寺塔，是国内现存最高的一座砖结构古塔，早在 1961 年 3 月 4 日就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后来被列入国家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他也给我讲述他的生活、婚姻以及改变他命运的一次为期 40 天的环球旅行。那是 1988 年他带着荷兰女友游览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随后到美国旅游，返回荷兰以后，他和女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分歧，女友倾向于美国文化及生活方式，而博依却已经痴迷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维系多年的情缘而

分道扬镳。此外他还立志要找一位中国姑娘做太太，他按中国格言中的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约束自己，在 1990 年通过《中国集邮》杂志上的一则广告，找到了一位如意的中国姑娘。2 年时间里在经过一番不大不小的挫折以后，为获得中国女友在荷兰的长期居留权，他把与中国姑娘结婚的重要性以及对两国文化和其它诸多领域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厌其烦地讲给政府有关方面，终于是他的那份真诚感动了荷兰政府，为他的中国女友办理了长期定居荷兰的签证。1992 年 10 月 22 日，他与中国姑娘在 Den Helder 的市政厅举行了简朴而体面的婚礼。

当时我还不知道有《中国集邮》这么一份英文杂志，听荷兰朋友介绍，我才以极大的兴趣从邮局订阅了一份。随后这份杂志改成了中英文双月刊，而且中文与英文的内容互不重复，再后来就改成了纯中文杂志了。

至于我为什么把荷兰朋友的名字音译为迪克·德·博依，关键在于他的姓氏“Booij”音译为“博依”除了比较接近其发音，我把另一个深层的涵义用英文向朋友做了恰当的解释，那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是你的精神依托。”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让我帮他寻找并寄给他那些想要的音乐盒带，还有当时相当昂贵的 CD 光盘，还有一些中国民间的小玩艺儿。他常常给我寄来一些荷兰盾，除了购买他想要的东西，大部让我用于贴补我的日常开销。当他得知我父亲对土地情有独钟还为当年种树而惹下祸端的历史悲剧的时候，他感到震惊，甚至不相信世界上还有那种不讲道义的事情。为了安抚我父亲，后来他说要送给我父亲一份特殊的礼物，到底是什么礼物他让我猜，可我一直也没有猜到是什么东西。直到 2 个月后收到了一个来自荷兰的包裹，打开一看才恍然大悟，里边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种子和根茎，我怎么就忘记了荷兰是闻名世界的花卉王国啊。按种植说明书中的办法，我与父亲当年冬天就在院子里弄了个塑料大棚，把这些带着深情厚谊来自异国他乡的珍贵种子植入到中国大地上一个曾经灾难深重的农家小院子里。

第二年冬去春来，塑料棚被揭开不久在春雨和阳光的哺育下，郁金香、水仙还有好多种说不上名称的花卉争相开放。我们给这些绽放着人间真情的花卉浇水、锄草、百般呵护，我们呆在这个农家小院里就仿佛来到了遥远的荷兰。但好景不长，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不会管理，好端端的花卉差不多都死光了。本来博依的心思是想让我们靠大量培育这些花卉拿到市场卖以获得一份经济来源，但失败的结果让我们都感到无比伤心。

即然我们是通过集邮相识的，当然谈的最多的还是与集邮相关的话题。

我是用几年前养猪赚下的 2000 块钱投入到集邮活动中的，最早从石家庄唯一的集邮商店那里买下了大量中国邮票，后来那个商店一直沿用桥东集邮文化用品专营部这个名称，我与他们的交流也一直也没有中断过，因为我经常需要为国外的朋友在那家商店代购中国邮票。在后来我还经常到北京的月坛集邮品市场交流一些中国邮票，把手里升值的邮票转让出去。

那时候我经常光顾的另一个地方是月坛公园内的四达邮币社，那个老板叫王国强，他妻子还是我们定州的老乡，因为他们为人厚道又很热情，我先后从那里购买了大量新中国邮品，包括各时期邮票和邮政用品，我把买到的东西拿回定州，到街面上和学校门口进行兜售，因为集邮文化在我们当地非常薄弱，如果开店的话那真的连房费都赚不到。

因随后不久我就改为了经营外国专题邮品，从而中断了与王国强的来往。但没有想到的是 2005 年的时候，我从电视上看到了 10 年前四达邮币社的老板王国强。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财富故事会节目中，讲述了他一万块钱起家，6 年时间就成了千万富翁，在邮市上有翻云覆雨的影响力的故事。

过去打零工的时候我学会了机床操作是一名车工，并带会了一个当时只有 17 岁的小徒弟。两年后在我开始研究邮票的时候，这个家住乡下的徒弟时常找我来玩，翻看我的集邮册，我丝毫没有防备地告诉他哪个邮票最值钱，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自那以后那张最值钱的 1980 年发行的首轮生肖猴邮票便不见了踪影，从此我也与这个拿我邮票的人断绝了师徒关系，再也没有任何交往。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荷兰朋友博依，他忠告我集邮册是不能随便拿出来让人看的，除了安全问题还会影响到邮票的品相，一张上品的邮票与有瑕疵的邮票价钱上有时会有天壤之别。从那以后我吸取了教训，再也没有让人翻动过我的集邮册。

文章写到这里我还要插上一句古人的格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因为当时条件下我已经倾其所有，把全部的积蓄都赌在了邮票上，而别人却轻易地就把我当初最珍贵的邮票拿走了，希望当年拿走我邮票的人如果能够有所忏悔，我依然会视你为朋友；如果当年的徒弟在看到我写的这些东西后，果真是你拿了我的邮票，希望你能来找我认个错，我不但不会责怪你，还要把你看作真诚的朋友；如果是我冤枉了你，我要以诚恳地态度向你道歉；如果是第三者拿了我的邮票，我更希望你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以澄清是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不但同样视你为真诚的朋友，还会把你看作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到后来迪克·德·博依患上了腿痛的毛病，我还给他寄过中药成份的膏药。随后他还向我索要 Door God（门神），而且指定要我去找民间手绘的那种，他说批量印刷的那种门神不忠诚，只有出自中国民间那种手绘的门神才灵验。我四处打听，后来在黄宫城村终于找到了，并赶紧寄到荷兰。但是到最后，朋友的病竟然是骨癌，灵验的门神没能挽留住我荷兰兄弟的生命。

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生命、心地善良、执着地追求理想的人，还没有等到学会中文就带着遗憾过早的离开了这个曾让他留恋不已的世界，先前我们商定的见面期限也最终化为泡影。

第二十章　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彰显人间真情的友谊

因为购买集邮品基本上把家里所有的钱花光了，而出售集邮品却还没有着落，由此让我们的生活不断地陷入困境中。在这种背景下于 1994 年的春节前夕又从亲戚那里借来 1000 块钱从石家庄批发了一批年画准备摆摊出售以赚取过年的费用。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把卖年画的小摊摆在了西城蔬菜批发市场北口的原定州制药厂大门北侧，刚开始还卖不出多少，在到临近春节 2 周的时候，销量开始增加，我用收回的钱又批发了一车海带在卖年画的旁边做另售。

有一天制药厂的一个年轻人赊了三张年画以后说下班回家拿了钱就还上，随后就不见他的踪影了，几天后再见到他时，他竟然失口否认赊过我的年画，见他没付钱的迹象，随即发生了争执和撕打，后经门卫拉开后，那人扬长而去。又过了几天，制药厂在临放假之前打扫卫生，让人没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清理厂房玻璃的喷水竟然故意地向我挂满年画的一面墙上喷洒过来。我赶紧大喊并冲了过去，发现正是赊我年画的那小子在故意寻机报复，随后又发生撕打。厂里的保安不但没有说让他赔偿我被水冲坏的 10 来张年画，反而说我跑到厂里寻衅滋事，再提赔偿就送我到派出所或者让我离开摆摊的地方。因为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我只好忍气吞声了事。

一天下午，初中时的一个叫王国林的同学在我们摊位前路过，无意中发现了我们。

实际上他与我的妻子王秀红，还有原杨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就是那个参与给我们制造"富农"的黄立虎的儿子黄晓军都是同班同学，而我比他们高一个年级，上学的时候我与他起初并没有来往，只是那时候王国林是学校有名的调皮大王还经常干些打架斗殴的事情，所以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到我初中快毕业的一个时期里，有一次我的同班同学欺负我的一幕让王国林看到了，他路见不平把那个同学痛打了一顿，从那以后谁也不敢欺负我了，这样我就与低我一个年级的王国林也算认识了，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我就找他帮我摆平，但我初中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十五年前的老同学居然在大街上邂逅相遇，让我们都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只是听谁说王秀红后来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当他看到我们落得在街头摆小摊的尴尬局面以及我们听到他所经历的挫折以后，三个人的泪花已经开始在眼框里打转转了。我们约他正月里到我家里坐坐，算做是当初对没有邀请他参加我们婚礼的一个补偿。临行还送给了他几张年画和一些海带。

就这样我们夫妻两人在外边摆摊整整一个月，直到年三十才收摊，细一算帐卖海带不赔不赚，卖年画赚了 800 多块钱，除了还清借来的本钱，也可以安安生生地过一个好年了。

正月里王国林如约来到我家，当看到那些破烂不堪的猪舍和那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旧房子时，同样是一种感慨的心境。

那一次我们真如同老朋友一见如故，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从中午一直谈到晚上。他告诉我他在杨庄子有很多朋友，因上学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是哪的人，他也就不知道我同样住在杨庄子，否则在很多年之前他就来找我了。他告诉我他与杨庄子的黄晓军是最好的朋友，当时这曾让我感到有些悲伤，因为我的父母早在多少以前就提到是村治保主任胡栏树伙同黄晓军的父亲黄立虎给我们制造了“富农”，害的我们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到最后就别说解决问题，当事人谁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过。

王国林也提到他搞汽车货运多少年，钱没有赚到还弄得失魂落魄并欠下银行一大笔贷款。谈到生活方面，他告诉我，在上学的时候，王秀红就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生，在操持家务方面也是一位难得的贤妻良母。我告诉老同学，我会做个好丈夫并好好善待妻子。

傍晚我父亲从地里收工回来了， 看到来了客人也挺高兴。当我父亲得知客人来自西关北街时，便向王国林打听一个当年在西关北街一起参军名叫王全友的战友，没想到王国林听后哈哈大 笑起来，原来在 1947 年与我父亲一起参军的王全友正是王国林的父亲。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父辈的友情在我们晚辈的身上又一次得到继承和延续。

就这样从 1994 年开始随着我们交往的深入，我与王国林之间兄弟般的真挚友情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后来经过我们细致的市场调研后，在房地产开发和市政建设的热潮中，他采纳做出租大型建筑机械这一行当的建议，从而彻底抛弃了汽车运输行业，经过筹资购置了挖掘机和铲车等大型机械，很快就从经济上翻了身，我也为他经济上取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1996 年在互联网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将是一个展新的事物，势必在不远的将来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计算机应用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到了 1998 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脑并随即到电信部门开通了拨号上网的手续，从而加入到中国最早的网民行列。因特网的应用才真正的让我发现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原来是那么的小，只要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与世界各地的通信都可在一眨眼的瞬间实现，而传统的从邮局与国外通信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才能得到回音。互联网在我从事的集邮事业中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和收益。

我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计算机办公和专业排版软件的应用，还学会了网页制作等较高级别的计算机知识和技能。这又使我认识到，即然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就应该与大家共同分享。

2000 年春天，我从出售集邮品的收益中拿出资金租下了中山中路位于西关南街一栋临街大楼的最下边两层，随后购置了大量电脑开办了一家集网吧和互联网服务为一体的计算机信息服务部。那一时期我做了著名的 ISP 北京东方网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定州指定代理商，并亲自动手率先为定州市 10 多家知名企业建起了网站，还不厌其烦的到定州其它没有上网的企业宣传互联网的好处，敦促他们建站上网，以促进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利用互联网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但那个时期在我们这个县级市里互联网在很多人的心里还处于萌芽状态，他们不相信互联网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甚至怀疑我是有意在骗他们的钱，在这种背景下招揽客户真是难上加难。后来好友王国林也帮我四处宣传，但到最后将近 3 年时间里仅仅为定州全市范围内不到 20 家企业建了网站，其中还包括一个高蓬镇人民

政府的网站。

在我所建的企业网站中，最有影响的是定州永进玻璃珠有限公司，这是我建的第二家企业的网站。2000 年冬天，我亲自找到了该公司的总经理杨宏兴先生，这是一位因商务活动出访过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定州市知名度最高的优秀企业家之一，他对于在互联网上建企业网站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当即拍板付了定金后全权委托我设计一个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的网站。

定州永进玻璃珠有限公司曾经是定州排在第二位的利税大户，它是生产反光、喷丸、研磨玻璃珠系列产品的专业公司。该公司生产的“银珠牌”玻璃珠，曾荣获国家劳动部“优质产品奖”及第七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最佳奖。道路专用冷漆、热熔及镀膜玻璃珠，严格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及国家部颁标准生产，并且具备先进的产品内部检测机制，产品质量受到国内外业界的一致好评。产品销售除覆盖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于中国主要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及城市道路，还远销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拿到公司的全部资料后便着手开始网站的设计与制作，并在一星期后完成了中文版的全部内容，随后又亲自精心翻译制作了英文版，另外在网站建立了留言板。在网站最终完成后，我得到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杨宏兴总经理还委托我维护该网站，让我留心国外的动态。

2001 年春天，一个印度客商在留言版上的英文留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显示那是一家印度生产玻璃微珠的企业，因工艺和设备落后，生产的产品合格率低而且能耗大，想寻求引进生产设备，落款留下了电邮地址。我立刻在第一时间给杨总经理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随后他传真给我一份回复内容，要我翻译后用电子邮件答复印度客商。

就这样一来二往，印度客商有了初步从定州引进设备的意向，并决定动身来定州的厂里考察。没多久这位印度客商就启程从加尔各答飞往香港，然后乘火车来到定州。当天晚上印度客人给我打电话，我随即与杨总经理打电话派车到定州火车站接印度客人，并安排入住定州外贸宾馆。

在随后与印度客商洽谈的近一个星期时间里，我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工作，免费为玻璃珠公司充当首席商务翻译，后来公司又通过关系找来一个大学英语专业的女生辅佐我的工作。期间定州市原市长郭若定还出席了一个为印度客人举办的商务招待会，在那个招待宴会上郭市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他对我自学成材并担负起定州对外商务活动的重任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市长的一番话反而让我想起了一家人蒙冤几十年，是自己多少次死里逃生后才熬到了能与市长坐在一起吃饭的机会，我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那样沉重。但是在那种场合理智给了我战胜一切的勇气和力量，我没有提及任何悲伤的往事和任何对我们不公正的待遇。我强忍着内心的悲痛装出喜悦的表情与在坐的人们谈笑风生，但我心里想着下来一定要给郭若定市长写一封信，希望他能够解决我们几十年的人道主义问题。

看得出来郭若定市长是位年轻有为的领导，他只比我大 2 岁，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市长的架子，所以我们的话题也谈得庭投缘。市长还与印度客商进行了交谈，询问了他在印度的经营情况，我不断地开动脑筋用最恰当的词汇和语言给他们充当勾通思想的桥梁。没想到这位印度客商与郭市长是同龄人，他在加尔各答拥有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在他的家乡巴特纳拥有一个大型的水产养殖与深加工的农工联合企业，至于生产玻璃徽珠是考虑到印度高速公路快速发展使需求量大增的背景下而上马的一个新项目。因他们自行研制的设备工艺落后，生产成本高而无法满足印度市场的需求。而这个印度客商也是个 网虫子，空闲的时候就上网搜索与之相关的产品和设备，就这样他找到我制作的那个英文版的网页的时候便对引进设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这样在紧张的谈判与协商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仅 5 天的时间就签订了一份输出玻璃徽珠生产设备的出口合同，由我方的人员负责到印度安装调适并负责技术的培训。

签订协议后的第二天，公司领导让我陪同外商到北京实现了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愿望。

说起定州玻璃珠公司的老总杨宏兴，他同样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早年还曾经在街头摆过修自行车的摊子，硬是凭着顽强的自学与拼搏精神于 1995 发明了玻璃徽珠成型炉，并于 1996 年获得国家专利。该成型炉收集炉筒外周壁设置风套夹层通过导风管、引风管将经过预热的空气引进成型炉筒改冷空气助燃为热空气助燃，另外在成型炉筒的外周壁设置循环水套变风冷却为循环水冷却。具有制造成本低，生产连续性好和产量高，成品率高等特点。这一重要发明为随之而来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像北京八达岭高速公路的标线及返光材料正是出自定州玻璃珠公司。

2002 年在我去过一次市政府以后无功而返，再加上繁忙的工作和紧张的生活一直也没有顾上给郭若定市长写信。到了 2003 年 8 月在我们搬进新居后，终于腾出手来决定给市政府领导写信的时候才注意到市长已经不是郭若定了，而是换成了另外一位姓郭的市长，他叫郭振光。随后寄给市政府各部门要求给我们家落实政策的信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两年以后这个郭振光市长与市委书记和风落得一同被革职的命运。

网吧的状况是 2000 年刚开始的时候在市区仅有我们三家，可以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惨淡经营，可不到一年的时间，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上网的人数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网吧数量也猛增，到 2003 年全市竟然增加到 200 多家网吧。在这种形势下，我急流勇退，于 2003 年春节前夕将店面连同所有的设备一同盘了出去，回到了阔别近三年的家里。2002 年新建的大房子还没有装修，暂时还住在后边的老房子里。

在我开网吧和弄互联网的那些日子里，只雇了一个看网吧的管理员，因为租下两层楼且吃住都在那里，同样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经营状况又是那样的不理想，根本不具备招兵买马的必要条件，所以一切有关技术层面的工作全靠我一个人来完成，再加上同时经营集邮品的业务，我一个人的日常工作总是排的满满的，有时候熬到深夜也无法完成相应的工作，还有其它闲杂的事情整天搞得我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吩咐楼下看网吧的管理员把那些来找我而与业务又不相干的人们以我不在的借口给打发走。为此还得罪了一家亲戚，那是 2002 年的暑假，我大姨的孙女带着几个孩子来到我这里想学电脑，结果让网管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打发走了。到 2003 年春节期间我去看望我大姨的时候，人家才说出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让我羞愧难当，尽管做了解释，我大姨的晚辈们还是耿耿于怀，直到现在依然用那件事来向亲友们宣扬我的不是。

我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2002 年在原有的那所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旧房的前面建起一座 200 平方米的大房子。

原有的那所房子正是 1964 年我的父母从亲戚那里举债建起来的，在 1968 年又是我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用生命做赌注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据知情人透露，当年的革委会主任带人拆房的时候是父母让我三姐把不到 4 岁的我抱出了房外，并嘱咐我的三姐一定要看管好弟弟，只有把弟弟抚养成人以后才能等到出头的那一天。

如今那所与我同龄的老房子在经历了长达 45 年的风雨之后，再加上我 24 年前用菜刀砍过的痕迹更显得苍老和破败。虽经多次粉刷墙壁，涂料自然脱落以后，“文革”时期刷写的毛主席语录依旧清晰可见。这所房子是我们长达半个世纪苦难生活的有力见证，将要永久的保留下去。不管来自国内的朋友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及国际友好人士与我会面，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带他们参观这所老房子，以警示人们永远不要让类似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从而永远维持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就在家里施工建房子的时候，我都腾不下手来到工地上看看，全是好友王国林帮忙料理建房的事务。是王国林亲自找来的承包商，另外他除了无偿动用自己的机械设备，还叫来南庄子村出租农用三马车的郑同军无偿运送生石灰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就别说给人家工钱，我连让人家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些都是王国林后来才告诉我的。但是这些朋友们给我付出的一切，他们都无怨无悔。也许有人可能会对此产生怀疑或难以置信，因为我一不是官员二不是社会名流，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必需让大家都认清的：人间真情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人间真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用多少金钱都无处买到，人间真情的价值远远超出了闪烁着诱人光芒的黄金和钻石。

2003 年春天我妻子搞装修行业的二哥带人对我们新建的大房子进行了装修，同年夏天我们搬进了新居，在摆脱了三年开网吧和搞互联网的紧张生活之后，我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休息一下了。

后来，我妻子二哥家里建二层楼房，正在为楼顶隔热垫层的粉煤灰发愁，我又首先打电话把王国林叫了过去。没想到事情办的又是那么利索，仅打了一个电话后不到 2 个小时，就有人从孟家庄村运来了满满一卡车足有 23 立方米的粉煤灰，随后卸在了明月街的一个路口上，正常渠道需要 600 块钱的费用，可人家分文不收就要走人，原来这个专门弄粉煤灰的年轻人是孟家庄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与王国林儿子是好友。先前“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以后，河北国华定洲电厂的贮灰场就另选址在孟家庄村，王国林儿子的这个好友就干起了运输粉煤灰的生意。对于王国林这个自家人说话了，当然就不能要钱了。我赶紧到商店买了两条香烟，当回来时发现人家的卡车已不见踪影了，我又让王国林给人家打电话停车，我才开车过去把两条香烟送给这年轻人做为感谢。

随后王国林又亲自开来一辆铲车，打算把这些粉煤灰运到建楼的工地，但胡同的小路上到处到是私搭乱建的诸如台阶、煤池等杂物，大型的铲车跟本无法通过。王国林随后打电话叫南庄子村的郑同军把自卸农用三马车开来，就这样用铲车装三马车，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把一卡车的粉煤灰全部转运到了建楼的工地。如果用小拉车人工转运的话至少需要 2 天时间。

晚上在我妻子二哥家里吃了顿饭，二哥拿出 100 块钱给郑同军，结果把他倒给惹恼了，他说要是给钱肯定就不来了，因为他正忙着自己的事情，王国林打了电话，他立刻就把自己的事儿放在一边，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他接着又说，“王国林价值几十万元的铲车还贴着人、贴着油这么干，我这么个破三马子又能算得上什么呢。”这些障显者人间真情的朴实话语，再一次让我感动了，那一时刻我真的流泪了。

事后妻侄子面对他们家的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看看我爸爸的朋友，再看看我小姑夫的朋友，这一比较才知道哪个是真朋友了。”

再后来我才进一步了解到，原来先前在杨庄子落难的那个右派陈老先生正是郑同军的亲姨夫，当年在陈氏家庭危难之时，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落井下石，又从经济上坑了人家 300 块钱，据说当时的 300 块钱可以盖出几间房子来。后文提到的 1986 年从北京来的那 5 个向刘德栓讨要血债的人正是郑同军的亲表兄弟们，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我曾给郑同军开玩笑地说，只怪我们当时并不认识，否则那一次连同刘德栓欠我们的血债就一并让他偿还了。

有关陈氏 5 兄弟向刘德栓讨要血债的细节将在第二十四章作详尽的描述。

在我的生活和与人们的交往中，我那个爱讲理的缺点和堂堂正正做人的优点都同样让我赢得了人间真情的回报。至于说把爱讲理说成缺点，那是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就找不到讲理的地方，所以坚持讲理的原则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缺点。常言说酒桌上的话最多只能信一半，但这个原则同样不适用于我，因为我不论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半醒半醉甚至是不人不鬼的逆境中，只要是自己承诺过的就要努力地去兑现，当然，由于客观上的某种原因而让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也就没有办法了。在我的社会交往中一个把兄弟也没有，但是有几个像王国林这样的彼此之间能够彰显人间真情的朋友就足够了。

常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别人给我付出了，同样我会加倍向别人付出才能做到人间真情的相互回报。长期的磨难和逆境中的生活同样让我学会了感恩和宽容。但是我心中的宽容仅仅是针对人类社会中的正义与公平以及符合道理、情理和法理范畴之内的宽容，对所有黑恶势力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残暴势力我永远会以嫉恶如仇的心态视之，对长达几十年以后依然执迷不悟的凶残之徒更是永远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宽容。

第二十一章　南非总统德·克勒克来信了

1993 年 10 月 15 日，位于奥斯陆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 1993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非国大主席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因为这其中不仅同样透露出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而且还同样彰显着人性的光辉。

德·克勒克做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最后的一任白人总统，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 1990 年 2 月 10 日做出了释放在狱中已经关押长达 27 年的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废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人口登录法》和《原住民土地法》等带有种族歧视的相关法规，从此南非进入了一个种族平等和文明、民主、进步的新时代。

一直默默承受着心理创伤而生活在逆境中的我，为南非人民终于摆脱苦难生活的束缚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曼德拉博大的胸襟和宽宏的精神所感染，他曾以“企图暴力推翻政府罪”被判终身监禁，而那些残酷虐待了他 27 年的白人该会是多么的无地自容啊。曼德拉曾经解释说，自己年轻时脾气暴躁，正是在狱中学会了控制情绪才活了下来。他的牢狱岁月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自己遭遇的苦难，感恩与宽容经常是源自于痛苦与磨难。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 27 年啊，曼德拉与命运之神顽强抗争的精神也同样给了我曾经脆弱的精神世界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到 1994 年春节过后，我终于腾出手来在德·克勒克总统即将离任之际，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用英文写了一封信寄到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总统府，对德·克勒克的伟大壮举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赞赏。德·克勒克为解除南非广大黑人的苦难生活，为推动民族和解以及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信中我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南非人民一道共同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美好愿望，并做为一名集邮工作者同时表达了与南非同行之间进行集邮领域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想法。

大概过了一个月时间，我收到了来自南非比勒陀利亚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个印有英文和南非荷兰文的公函信封。打开一看除了德·克勒克总统的信还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彩色照片，另外还发现有南非官方邮政印发的介绍南非邮票的精美画册，里面还有集邮机构的地址名录。

信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克勒克总统在信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进一步发展非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并鼓励我为推动两国民间文化领域的交流做出努力。

作为一种荣誉，我首先将德·克勒克总统亲笔签名的照片小心翼翼地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墙上，让我的父亲、我的妻子与我的两个孩子共同分享我的快乐。

随后我还把与德·克勒克总统通信的事告诉了荷兰朋友迪克·德·博依也让他与我共享快乐。

这个时候我越来越感觉到对中国邮票的炒作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邮市不能等同于股市，一味的对邮票进行炒作就大大偏离了集邮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也根本没有资金投入邮市进行炒作啊，仅有的那点钱全压在中国邮票上，到后来吃饭都快成问题了。博依随建议我放弃中国邮票而弄一个世界专题集邮社，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后来，是我的朋友博依寄来世界各国的邮票帮我初步建起一个专题集邮社，并为纪念他北京一个已故好友的名字金华而命名为“河北金华专题集邮社”。后来这个名称在中国最大的集邮刊物《集邮》杂志上做广告还引发了一点小麻烦。因为浙江有个金华市，人家金华市的集邮协会不干了，给我打来电话，虽然我说“金华”是朋友的名字，但他们依然坚持要我选用其它的名称。就这样我干脆就用自己的名字应该不会再妨害到谁了吧，于“河北谢强专题集邮社”的名称一直延用至今。

我从德 • 克勒克总统寄来的集邮宣传册上筛选那些南非的邮商名录，并试着分别给他们发函寻求用中国邮票交换南非邮票的可能性。最后联系上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邮商并用手上现有的中国邮票换回了包括南非及其周边的莱索托、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好几个国家的邮票。

1995 年前后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举步维艰，手上弄的这么多外国邮票卖给谁呢。当时从集邮报刊上了解到全国有集邮爱好者 2000 万人，但真正购买外国邮票用于集邮展览而编组集邮作品的人占不到总集邮人数的 5％。我只好先到本地的中学去推销我的外国邮票，但这些学生的集邮意识非常浅薄，只有那些廉价盖销邮票能卖出一些，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市场。

有一次去我的母校定州中学摆摊，还差点被学校的管理者暴打一顿，人家有规定不让在校园内摆摊。管理学校的是雇来的一对父子，两个人都是一副凶恶的样子。毕竟这里是我的母校，正是 10 年前我怀着无限的留恋在无奈和痛苦中离开了这所学校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最后我祈求他们让我在校门口摆上几本集邮册依然遭到拒绝，那个 20 来岁的儿子把我的集邮册扔到了马路上不算，还打了我几拳。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定州中学，只在其它中学的门口等到放学的时候推销邮票，有时还在车站邮局门前摆难宣传集邮、出售邮票。

我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贤慧媳妇，得知我 30 岁的人了还被人追打，说什么也不让我再到外边兜售邮票了。我们也可以像其他邮商进行函购业务，于是她从娘家哥哥那里借来 3000 块钱率先在家里安装了电话，随后妻子与我一起来到北京的月坛邮市出手了一批中国邮票用收回的钱在集邮报刊上广泛的进行专题集邮的广告宣传。

随后山东青岛的一位名叫陈相忠的收藏爱好者出价 30 块钱就把德 • 克勒克总统的签名照片连同那个信封一并从我手里买走了。现在感到追悔莫及，如果还能找到那个买家而且东西还在的话我愿意花更多的钱把它赎回来。因为当时条件下，我一度面临着债台高筑，不但饭碗成了问题，就连每个月的电话费甚至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才不得已而为之。

到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随着广告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继而才赢得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专题集邮客户，终于稍稍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最初赚取的钱全部用在了广告宣传上，并一直在摸索和探讨中才一步步走向了成功的彼岸。

但是，事业上的成功并不等于心理上的阴影就可以自然抹掉，只有当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时候，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成功者，才能真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强者。

只有澄清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才能够让人民享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从而也才能够有效的避免人类历史上践踏人权的事件再次发生。

南非总统德 •克勒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就像当年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 •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一样，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以及维护和保障人权的深远意义。

第二十二章　人类历史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永远不能再重演

因 1963 年发生在华北地区的特大洪水冲毁了家园，到 1964 年我们家随同村里其它农户盖新房的时候，我们竟然被村里罚款 50 元，原因是“富农”要与贫下中农区别对待。一家人那时候都被震惊地缓不过神儿来，土改的时候就定成了中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富农”了。村干部们都说，实际上你们 1956 年从西关北街搬回来以后就是“富农”了，那是人家那边给介绍过来的。

有关那 2 个起关键作用的村干部是如何在 1956 年暗地里给我们扣上“富农”帽子的，已经在第二章中做了详尽的讲述，在此不再赘述。

就在 1964 年当家里发现被人弄成“富农”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申诉了。那时候的申诉可以说是让我父母把腿都要快跑断了，首先要杨庄子的村干部拿出人家介绍“富农”的证明文件，但他们根本就拿不出来，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把嘴一歪随口而出的谎言。西关北街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介绍“富农”到杨庄子村的那回事儿，随后就是两村之间的互相推诿。我们去找派出所查档案可没有村里的介绍信被人家严词拒绝。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身份证这一说，再加上处于那种历史背景下，人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没有村里的介绍信哪能随便给人查档案啊，政治责任谁来承担。

那个时候才真是应验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随着村干部们广泛对外传播我们是“富农”的有关情况，整个村子也都知道我们是从西关北街搬过来的“富农”，就这样假的东西经过更多村干部的如法泡制也就变成了“真的”。声势造出去了，我们那才真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这就叫做残酷的历史现实。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背景下，我们不管到哪个部门去申诉，人家都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赶紧把我们打发走，生怕落下个与阶级敌人有牵连的把柄。

而到了“文革”时期除了父母无端地遭到揪斗，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之外，我们全家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只许老老实，不许乱说乱动”的现实。

“文革”结束以后，村里不但没有给我们落实政策、恢复名誉，那个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甚至依旧拿“富农”向我们说事儿，不断地威胁我们。但我们通过私人关系终于从派出所户籍中查到了我们家原本就是“中农”的原始档案。

多么可悲可叹一段历史啊。尽管我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但我们同样是堂堂正正的人啊，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情，从道义上和良心上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换句老百姓的话来说，我们即没有招谁也没有惹谁，“富农”的帽子却从天而降，由此给一个无辜家庭的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一系列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我不得不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我父亲在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了，也就不会因回家种树而惹下长达半个世纪的灾难。常言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父亲在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中有幸活下来，却没有给他自己也没给家人带来任何福祉，反倒是让全家人先后遭受长达半个世纪的煎熬。

所有发生的一切，到底是谁的过错？我要质问苍天，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的过错!!!

我母亲一生为人正直，父亲老实本分，难道说这就是我们应该受人欺负的理由吗？这就是那些基层干部丧心病狂的践踏人权的依据吗？

难道说“文革根子”刘德栓和那个丧失党性、泯灭人性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不该为他们的所做所为付出历史的代价吗？

那 2 个制造“富农”的村干部，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相继离世了，难道不应该把他们的尸骨挖出来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他们陷害忠良的事实，不应该受到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骂吗？

30 年前的党中央提出了有错必纠的原则，包括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甚至追溯到红军时期的冤假错案都得以

平反昭雪。按民间的说法"冤有头，债有主"，"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所体现出的同样是一个公平原则。

我要再一次向苍天发问，50 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得到公平了吗？

针对我们而言不能不说人权已经在我们两代人的身上遭到空前的践踏，在河北省定州市杨庄社区里，残暴和邪恶势力已经践踏人权整整半个世纪了依然没有罢手的任何迹象，因为他们永远不想让历史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近一百多年来无数怀有报国之心的莘莘学子、无数的革命志士和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如今刚刚初步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在天之灵绝对不会容忍邪恶势力以及所有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黑恶势力长期横行。对待这些倒行逆施的黑恶势力为什么不能像鲁迅先生在 90 年前所说的"掀翻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当代社会里的"筵席"正是他们为所欲为、残害无辜的行为和过程，而"厨房"恰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族式社会基础和广泛的黑恶关系网 。

四川 5 • 12 特大地震发生后，党和国家做出的快速反应以及随后制定的全国哀悼日，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称赞。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灾区，并制定出一系列有效的和人性化的救灾方案，让无数中国人感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这是党和国家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也使我充分看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和国家以及爱好正义的中国人民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冤情同样不会坐视不管。

我们寄希望于党和政府，对我这个家庭所遭遇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公正的调查，对造成历史冤案的相关人员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文革"时期加害我们的当事人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及其家人，如果能在 30 年前的落实政策时期对我们这个已是身心疲惫的家庭就别说真诚道歉，哪怕是说上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语，也足以抚平我们的多少年的心理创伤。况且我们只是希望他协助我们要回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哪怕是能还给我们不到一半的东西，我们也就感恩不尽了。在他自己看来，他为集体的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是"文革"的"英雄"，但他滥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残害无辜，不能不说他是人民的罪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败类，说他祸国殃民也并无过分之处，因为几十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他依然沉浸在借"文化大革命"而解了他心头之恨所带来的那种永不消失的亢奋中，可以肯定地说，人性的光辉在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也永远不会绽放出来了。

对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这类自始至终不能悔悟的历史罪人在中国社会现有法律条件下，也不难找到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因为像"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追诉时限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笔勾销其犯下的罪行。他们这一类心灵扭曲的历史罪人依然带着"文革"的留毒而洋洋自得，尽管这种留毒在现有条件下还无法找到大量滋生和繁殖的土壤，但任凭他们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同样是一种无情的打击，对国家和民族所倡导的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更是一种亵渎。

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不难看到，60 多年前纳粹头子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在二次大战期间，犯下屠杀 600 万犹太人的罪行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任他们逍遥法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不管他们逃到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不断有纳粹战犯从世界各地被引渡受审的消息传出，即便是到了现在，依然有个别已经改名换姓并成为耄耋老人的纳粹战犯被识破后照样接受历史的审判，哪怕是找到了他们的尸骨，也要通过现代 DNA 技术确定其身份后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因为所有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罪人，天理难容，或者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值得让世人欣慰和称道的是，二战结束后的历届德国政府勇于面对历史，针对纳粹时期无辜的受害人进行赔偿的消息不断地见诸报端，而且德国战后对被害人的赔偿是不遗余力的，道歉也是真心实意的。1970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1971 年 10 月，因勃兰特在缓和二次大战后欧洲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和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0 年 12 月 6 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到 2007 年，德国自二战结束以

来的 60 年间已经向包括中国劳工在内的纳粹主义受害者支付了大约 64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6700 亿元）的赔偿金。

德国现任女总理默克尔的一番话同样让人感动，她说："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些劳工的赔偿工作让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

战后的历届德国政府没有把历史的责任推给希特勒，而是勇敢的正视历史从而最大限度地弥补希特勒给人民造成的伤害，德国政府的真诚不仅感动了整个世界，也赢得了包括纳粹受害者在内的各国人民的一致尊重和谅解。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只有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才能真正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纳粹主义给无数个犹太人家庭带来灭顶之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一幕惨绝人寰的历史丑剧和悲剧，爱好正义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一道绝不能让类似的悲剧再次重演。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也应该认清历史事实并有所反思，而不应该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林虎和"四人帮"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勇敢的面对历史、妥善解决因基层政府的腐败等原因而遗留的历史问题才是对党、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行为。有了正义和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无法想像作恶有理的人们会对和谐社会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　新的伤害与最后的宽容

1992 年在母亲含冤离世 10 周年的时候，曾经在解放战争中为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而有幸活下来的父亲，来到定州市政府某办公室要求面见市长说事儿，结果是即不善言谈、又表情表情木那的父亲被工作人员和保安当成疯子赶了出来。

照理说我父亲心里埋藏了几十年冤屈就不能跟市长说说吗？父亲回到家里只是一味的抱怨老天怎么就会那样不公平，他又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身体多处受伤，子弹也打光了，硬是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拾起死难战友的枪继续投入战斗的情景，如今身体里没能取出的细小弹片有时还会隐隐作痛他都能忍受，而用无数战友的生命才换来了新中国，如今的幸存者想要见一个市长竟然比叩拜皇上还要难，从心理上父亲真的无法接受。只见父亲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我们一家人就这样无奈地跟着满腹委屈的父亲一同沉浸在失声痛哭当中。

2002 年在母亲悲惨离世 20 周年的时候，我受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驱使，便抽空亲自来到定州市人民政府。我想到了 10 年前父亲想要面见市长的那一幕，不过我本人与现任市长郭若定在一年前曾有过一面之交，虽说那个时候我是商务谈判首席翻译的身份，但人们常说酒桌上的话最多只能信一半，况且我现在又是平民百姓的身份，他是否还能记起我来，为避免遭到类似的尴尬局面，我首先来到了信访局咨询，以寻求解决历史问题的方案，得到的答复是："别说找市长，就是找江泽民也解决不了你说的那些问题。一方面你们所反映的问题早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找不到哪个恰当的部门来给你们解决历史问题了。"

我当时鼻子都气歪了，感到天旋地转随即晕倒在信访局的桌子上，因为受害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申诉无门不算，最后还要承担过时的责任似乎总有点不大合理吧？

我尽管是靠自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在很多人的眼里也算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理智约束自己并告诫自己不要做出过激的事情来，况且一家人几十年的苦难都熬过来了，遭受一点不能被人理解的委

屈又算什么呢。

想当年一个打公用电话的消费者被多收 5 毛钱电话费还要最终讨到一个说法，而被媒体炒作的沸沸扬扬。毕竟几十年的冤屈至少得有人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啊，难道就真得让我们的冤屈永远不明不白地尘封在这个世界上吗。

2003 年 8 月 4 日，我同时给定州市政府各部门以及新上任不久的定州市市委书记的和风通过邮局寄去了一封封附有回执资费的挂号信，现将依然保留在电脑中的信的内容粘贴如下：

尊敬的和风书记，您好。

首先请原谅一个普通公民冒昧地来信打扰您。

恳切请求耽误您 10 几分钟，看完由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背景的平民百姓所反映的和要求解决的人道主义问题（详见《关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诉材料》)。

从邓小平恢复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之时,我们就看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希望，但这个希望至今已经过去 20 多个年头了，无数次的上访和信访，所看到的是某些当权者对人权的践踏……到头来，更可笑的是，定州市信访局的负责人说我们反映的问题早就过时了，我反驳他说“中国在日本占领时期的受害人，现在才找日本政府讨说法，算不算过时？”即便我们的问题算是过时，也是过去历届政府中这类只挣工资不办事的官员造成的，难道还要我们承担过时的责任?

在此我也要郑重声明，我们所反映的历史问题是 100％属实的，为此愿承担法律责任。20 多个年头了，投诉无门，山穷水尽，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们的问题，也有人把责任推给林彪和“四人帮”就算了事了，这是什么逻辑？我们对此不好发表什么评论。我父亲已经 76 岁了，现仍下地劳作。为了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为了父亲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人间的真理，我们等待您的答复。

我们现在的唯一希望就是：政府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以高度的责任感，以对党，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成立一个专案组，对我们申诉材料中所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调查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我们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克制并做出了牺牲，因为我们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党，更相信党和政府迟早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

我们期待着……

如果您感到自己作为县级市的领导权力有限，可将材料通告上级政府。我同时也给郭振光市长发了函，前几天也给市政府办公室和市人大常委会发了函。希望定州市人民政府就此事进行协商，并妥善处理。谢谢您了。

谢强

2003 年 8 月 4 日

地址：　073000　　河北省定州市杨庄子村铁西居 21 号

电话:0312-2305530 2353404

三天以后我仅仅收到了好几个我已经支付邮资的回执，回执显示我寄出的信件均被妥善签收。我守在电话旁又等待了很多日子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哪怕是有句安慰的话也算上，但照旧除了劳民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

到了 2003 年 8 月 27 日，在自己的心境极其复杂甚至对未来失去信心的背景下，恰赶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40 周年的日子。自己在立志做一名崇高的新闻记者之后，虽然在艰苦的磨难中奋斗了二十多年，依然做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不断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而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工作。我没有高喊过爱国的口号，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于是我不分日夜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之现状与中华民族之梦想》的文章，副标题是“为纪念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40 周年而作”。文章以邓小平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指导思想，客观公正的评价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功与过，无情地揭露和鞭挞时弊。

我可以坦言地指出，真正忧国忧民的人们大胆的指责政府所存在某些弊端才是有良知的中国人爱国的和负责任的举动，因为他们是带着良好的心愿希望党和国家永远有一个健康的机体屹立与世界强国之列；那些利用各种手段一心只想升官发财以及那些随波逐流只会给领导层拍马屁的人们不一定能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带来什么积极的影响，反而会是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所在，现实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老百姓生活中常说的一句话同样彰显出真理的气息：“苦的才是良药”。试想如果一个医生看到了病人的症结所在而却不给病人指出来，虽然表面上健康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赢得了病人的欢心，但医生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名丧失职业道德的庸医，那只能会延误病情继而危及病人的生命。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忧国忧民的人们勇敢的面对社会问题、勇敢的指出社会问题的焦点所在，从而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才是真正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行为。

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是应该勇敢的揭露社会丑恶现象，而不是当问题发生在某些要害部门的时候就迫于压力而采取掩盖的措施，事实已经证明某些掩盖社会真相的做法只会加深社会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同样是背道而驰的。不管是发生在党内还是党外，所有那些违背道理、情理和法理的事情，只有我们勇敢的去面对、　勇敢地曝光于大庭广众之下，才能切实有效的把社会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整个社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做法。只有这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不会是空话。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很不知名的论坛里不知道什么人把那篇文章贴到了网上，网友发表的评论是“精彩之至，不愧为好文，我来顶”，还有的网友只留下了四个字“勇敢的人”。我也不想升官发财，做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只要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又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做的呢。我赞同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只要是对国家和民族有利，谁做总统都可以。

马丁•路德•金博士为争取黑人的民族、民主权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集会讲演中说道：“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它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

马丁•路德•金同样不愧是一位勇敢的人，他大胆地指责和抨击美国政府的所有言论，不但没有招来美国政府的恼怒，反而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继而成为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的楷模和典范。马丁•路德•金坚持不懈的努力迫使美国政府在种族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为此金博士获得了 1964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试想一下，国家要兴旺发达靠那些卑鄙无耻之流仅凭把手中的权力作为至高无上的法宝，从而为所欲为还要掩盖那些与道理、情理和法理都相违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真相，能行得通吗，老百姓能买帐吗？党和国家的宏伟事业又怎么不会遭受损失？由此一来，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就不是耸人听闻。

因为各级政府都在忙于学习实践“三个代表”，为了不再给定州市政府添麻烦，我依然苦苦寻求着依靠自己的方式、方法解决历史问题的最佳途径。

因集邮的关系，我与中央电视台《话说长江》的编导李近朱是朋友，他也是我的客户，他最早是看到我登出的广告之后通过电话与我联系的，他是国内集邮圈里较有名气的集邮家，他的专题邮集《维也纳的音乐故事》在国内和国际集邮展览中获得多次大奖。

2004 年我与李近朱协商是否可以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制作一期节目来揭开发生在定州市杨庄子社区长达几十年不公正问题的历史真相，但由于时间跨度大以及可操作性难度也挺大，才没有实施这项计划。

2005 年 6 月 11 日“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的发生，使河北定州这个拥有 120 万人口的县级市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6 月 13 日，定州电视台晚间新闻播报一则消息称：河北省省委决定，免去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定州市市长郭振光二人的职务。2006 年 2 月 9 日原市委书记和风被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他 26 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15 年至 6 年有期徒刑。我在文章中预言的事情仅仅 2 年后就在定州发生了，而且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尽管地方当局进行了新闻封锁，严格限制海内外媒体的采访活动，甚至把国外记者拍到的东西都要销毁才能允许进出事发地。正常的社会突发事件，又不是什么军事机密，地方政府愚昧的新闻封锁和掩盖事实的做法同样是不得人心，也违背了新闻道德准则。

2006 年夏天，借杨庄子社区向我们询问日伪时期给我家造成相关损失的机会，我向社区领导再次提出了解决我们历史遗留问题的请求。女社区主任对我向她谈起解决我们历史问题的事儿很是不高兴，说她一来参加领导工作时间短，二来对那些历史问题都不知情，没有办法给我们解决那些事儿，建议我找党支部书记问问。我随后来到书记胡庆山的办公室，首先向他询问我家被强加“富农”的由来，他的答复依然是西关北街介绍过来的，我并没有反驳他的观点。因为我心里明白，而他的心里应该更明白：50 年前给我们强加“富农”的村治保主任不是别人而正是他的父亲胡栏树。这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外加残酷的现实，而不是小说当中所描述的那种虚构的巧合。但是谎言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掩盖不了事实，终将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我向他提议把各方当事人都集合在一起，我出钱摆上几桌宴席，大家以和解的姿态解决问题，只要能为我们几十年当中所遭受的苦难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就可以了。随后我又向社区领导分别提交了书面材料，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毕竟做为基层领导肯定有人家无法表达的难处啊。首要问题除了那个书记胡庆山的父亲 50 年前因陷害忠良而导致我们灾难性后果以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先前那个不择手段混入党内的女党支部书记张玉春正是现任书记胡庆山的亲家母，而女社区主任不论与现任书记之间还是跟“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家族来说都是亲属连带关系。当年我浇地时因其面粉机而烧毁机井电机那个外来户，早已是家财万贯的超级富豪，而现任女社区主任也早已经跟这个富豪结成了亲家关系，而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一个儿子恰恰是这个富豪妻妹的丈夫。想当年因为这个富豪的责任而烧毁电机，一个小小的电工就可以强迫我为他买单 30 块钱。所以，针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强大的经济和政治联合体，我们自然会显得无能为力。

试想发生在定州市的一起绑架杀人案当中涉案的 2 个犯罪嫌疑人，杀人偿命自然是行不通的，经过多方活动，以敲诈罪弄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和 2 年。然而在开庭的时候，狂妄的犯罪嫌疑人竟然当着法官的面打了被害人的父亲几个耳光，法官丢了面子一生气才给他们分别加刑到 7 年和 4 年。对于杀人都不算个什么事儿，所以，我们解决历史问题就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事儿了。

想当年震惊中外的“定州绳油村遭袭事件”以后，由上边派下的工作组入住定州大酒店。听社区的人们说，那个时

候杨庄子领导层被吓的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来了个本末倒置，反过来向某些人求请不算，还给平常那些一直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们送点小恩小惠以保障没有人联合起来找他们的麻烦。那个时候的杨庄子社区与绳油村那边相比同样的混乱不堪，老百姓因占地赔偿问题也跟着起哄，有人弄了几十米白布准备打出横幅，后来据说是退钱消灾才得平息下来。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凡事围着自己的圈子转，脱离群众路线是免不了的。

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当时有几个人找我一起揭发他们的某些事儿，但是我这个人秉承了父母的传统，做人就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所以，我不会跟着别人起哄做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情，我只希望他们能在受到惊吓之余会好好反思，从而多给杨庄子社区办点实事儿，给老百姓多谋点幸福。

但是我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连我最低的要求他们都不肯答应，真得就让我们接受那种"永远保持沉默"的解决方案，难道说这就是给我们 50 年苦难生活最后的说法吗。是别人害的我们到家破人亡的境地，受害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为重，反过来提出向施暴者祈求和解的方案也不行。

我这个人活到 45 岁了，最大的缺点就是凡事要讲理，不但要讲道理，还要讲情理和法理，而且更要讲真理，当然很多时候遇上没有讲理的地方也就只好能忍之则安之了。想当年赢得第二任妻子的心也正是她看中了我讲理的缺点，而她的优点恰恰是通情达理，所以一拍即合才由此构建了一个让杨庄子社区居民都刮目相看的和睦家庭。

第二十四章　要为真理而斗争

"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40 年前的那个文盲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时至今日依然沉浸在"文革"官运的黄粱美梦中无法醒来，假如进了班房能否如梦方醒也很难说，因为他恰恰就像那些顽固不化、令人厌恶的法　轮　功分子死不回头是一样的。如同当年大清帝国的皇亲国戚们虽然被孙中山的革命成果赶出了皇宫，但直到民国多少年以后还依旧做着复辟的美梦。

在我 2006 年找过社区领导之后一段时间里，我遵循着国家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原则，便再次试探性地接触当年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儿子，想探讨我们的历史遗留问题，以期用某种让大家都体面的方式得以解决。但同样让人失望，因为与其父亲的态度没有什么两样。按照他们的说法，世界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把它忘掉就行了，解决办法看起来就这么简单。即使这样，我依然诚恳地向他们发出邀请，打算摆一个家宴与其开诚布公地做一次长谈，以期化解恩怨、达成谅解并在实现两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但 2 年过去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响应。更没有得到希望他们对"文革"历史上的那些事儿有所悔悟或道歉的信息。可以作个换位思考，刘德栓有三个儿子，如果冤案发生在他们的家庭，试想他们能否接受那种实际上就是要让历史的错误永远尘封于世的解决方案。

话说道这份上还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依然是弱者，才能让他们有十足的底气继续用为所欲为的方式对付我。想当年刘家父子三人在强者面前奴颜卑膝、被打得遍体鳞伤跪地求饶时的情景他们早就忘的一干二净了。

同样是在"文革"时期，当时的团结村住有一户因右派下放回来的陈氏家庭，在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危难之时，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依然在经济上对人家做了一件落井下石的勾当，以某种借口弄了人家 300 块钱。"文革"结束后的

1979 年，陈氏一家得以落实政策，在准备举家返回北京之前曾找刘德栓讨要那 300 块钱，而不思悔改的刘德栓依然是以“文革”英雄的姿态对待人家，同样拒绝了陈氏一家的正当要求。

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6 年，突然有一天在杨庄子村来了一辆北京牌照的大轿车，从车上下来 5 个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人。

他们顾不上旅途的疲劳直奔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家里，20 年前的 300 块钱按可比价格算加上利息和各种精神损害共 3000 元。听到这里当年刘德栓的威风一下了就全没有了，反而瘫倒在地上。因为此时的刘德栓就别说 3000 块钱，30 块钱他也拿不出来，赶紧派人把他的两个儿子找来，当时刘德栓的三儿子才只有 10 来岁，他当然还不懂得什么叫“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大道理，只会呆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刘德栓的两个儿子回到家里后一改过去那种耀武扬威的姿态，却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反正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三条。这时陈家兄弟中的老大说话了：“你们自己都撒泡尿照着看看，算算你们这三条命值不值 3000 块钱。要是说你们是三条温顺的良种狗，我们还可以牵回去看家护院或拿到集市上卖个差不多的价钱，就是亏点我们也就认了。你们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狗，算算你们这三条狗加起来能值多少钱。”

短暂的沉默过后，便是一阵猛烈的拳脚雨点般地打在这几个曾经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的刘家父子身上。那一时刻除了一只只铁拳发出那种像现代摇滚乐中的舞蹈动作所带来的时代强音，还伴随着哀嚎声中哭爹叫娘、叫爷爷的时代尾音。

就这样刘家父子在正义面前、在压倒他们的强者面前不但分文不少地还上 3000 块钱，还对他们当初丧尽天良的举动遭到差点丢掉性命的皮肉之苦的回报。

据说当时恨的人家真想来个超出法律范畴而要了刘德栓性命的举动，只是因为他们那种可怜相与三条丧家狗相比并好不到哪儿去，再说堂堂正正的人哪能跟畜生一般见识啊。

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要债方式似乎也不大合法吧？

我个认为，要按照道理和情理的方面去衡量，应该算是天经地义，要从法理层面上来讲我同样认为不免有些欠缺甚至是违法。但是话又要说回来，人家陈氏家庭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耐心和理性的宽容度，人家不可能为 3000 块钱再等他几十年，因为即便是等到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刘德栓也不会从魔鬼变成人，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刘德栓在 1960 年代坑了陈氏 300 块钱就恨得人家甚至想要他命的心都有，而他所欠下我们的血债用它的 10 条命也是根本无法来偿还的，而恰恰是在拨乱反正时期如果它能说出一句人话来也就足够偿清他所欠我们的一切债务，同样即便是又过去了 26 年后的 2006 年在我最后找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有所悔悟也能说出一句人话来，同样也可以抚平我们心灵上的创伤，而且仅仅是一句带有人性味的话照样可以低过刘德栓 10 条命的价值。我在此写的这些话语让我本人看上去也有些偏激，可我又真的找不到什么更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这种作恶之后反而有理的残酷现实。

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等到他们能说出一句带有人性的话来，就更别说什么道歉和忏悔。原因也很简单，尽管真理在我的手里，但至高无尚的权力及其威慑力依然在人家的掌控之中。这不单单是表露出权力大于法律层面上的问题，同样障显着道德和人性的缺失。

当年发生在团结村派系争斗中的命案，在拨乱反正时期有 5 个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后来从监狱里刑满释放回家的陈铁山还通过第三方向被害者实家属诚恳地传达了道歉的信息。这是难能可贵的，这证明陈铁山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他的做法不光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同样受到了杨庄子村民的尊重。陈铁山在几年的监狱生涯中还学到了一门行医的本领并考取的行医资格，在 1986 年出狱后便开了一间诊所直到现在。

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历史应该能够再一次证明：谁能够笑到最后谁才算是真正的强者，尽管我在刘家父子面前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一个弱者的姿态，但是真理依然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我依然不会相信正义还会继续无休止地败倒在邪恶面前。

时代在变革、社会在变革、主宰世界的人同样也在变革，强者和弱者的对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两者是在不断的随着整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完善和美好的变革过程中，交替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此时的弱者到了彼时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强者，反之强者也会变成弱者。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同样可以看到达尔文进化论的某种影子，而这个影子就恰恰体现在人类道德水准的某个层面上。尽管进化论讲的是动物世界中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其中不免会体现出弱肉强食的血腥，而几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人类按这种以强欺弱的进化方式是永远行不通的，二战时期的纳粹主义也正是利用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作为他们大肆屠杀犹太人的理论根据和借口。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什么不能把它引申到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呢，革命导师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最起码人类的思维和道德水准为什么不能向着这个最高境界而进化呢。所以，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动物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当中的时候，那就是在人类的思想不断朝着高尚和文明的进化过程中而得到升华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于所有那些违背历史规律、违背道德准则以及所有那些多行不义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在力量上处于强者的地位，但最终会都被无法阻挡的历史车轮压的粉碎而成为人类文明背后的垃圾。

对于我们单单从道德准则而论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对于我们的忍耐来说更是已经大大超出了承受极限。但我们依然还在苦苦寻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最终还是化为泡影。

难道就不可以开动国家机器将人类社会中的邪恶与残暴的黑恶势力打压下去吗!!!

正如《国际歌》中所唱到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在以往的 30 年时间里，我们更担心打不死的毒蛇会反咬一口将是致命的，所以从来就没有勇气想到过要将他们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现在是我们应该配合国家和人民有所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坚信通过理性的和法制的手段最终会讨回公道的，因为再多么黑暗的乌云也永远做不到长久遮挡太阳的光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千千万万党的优秀儿女与中国人民一道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才建立起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彻底驱散了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几千年封建主义的乌云，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太阳的光辉就是党的辉，它不仅指引和照亮了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势必还会彻底驱散那些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系列腐败和黑恶势力等诸多新的乌云，党的光辉同样还会指引着中国人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继续奋勇前进。

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集团在"文革"的 10 年间给国家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杨庄子村个别像刘德栓和张玉春这类干部前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1956－2008），同样给无辜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看不到尽头的精神伤害，至于是否犯下了罪行，在经过党和政府的司法及公安机关，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的前提下，进行调查和侦察以后将同样会有一个公正的定论。

我有理由相信，最后的公正应该是全体热爱正义、追求理想的中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的美好结局。

各级权力阶层应当看到时代已不是过去的时代，处在全面进步与发展的中国已不是往日的中国，已经觉醒的人民也不再是以往任人愚弄的人民；靠隐瞒事实、掩盖真相的做法永远提高不了权力部门的声誉，靠违法的强权和令人厌恶的专制维护不了社会上邪恶势力的长久存在；只有权力阶层勇于面对事实，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姿态处理

好、解决好历史的和现实的不公正问题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着正常与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二十五章 正义的诉求和主张

我说过我要与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和“世纪书记”张玉春以及杨庄子家族统治的始作俑者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要一起算总帐的。也正是抱定这个信念我才能够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赖以让全家维持生存和日常生活必需的工作，同时也默默无闻地为党、为国家以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历史已经证明：针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错误和不公正待遇问题得不到纠正和解决，自始至终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不好，完全是因为在 1980 年前后，个别基层干部置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有错必纠的原则于不顾，他们相互勾结并串联起来倒行逆施，继续沿用“文革”的留毒残害无辜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但另一方面是谁的过错，很多令人感动的制度和原则本身的确没有错，错就错在指鹿为马的社会风气造成行政官员的麻木不仁，以及社会丧失公平后并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尽管从上到下一直在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是行动中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刁官”的存在也就派生出“刁民”，但很多无助的老百姓在碰壁后常常会选择沉默，从而造成一个社会稳定的假象，但实际上危机并一定在人民保持沉默的过程中就不存在了。也有一部分据理力争的人民就成了所谓的“刁民”，比如像我这样的，你不给我说法，我就会不断地向你讨要说法，因为你既然做出了承诺就有义务去兑现。

当年人祸的主要制造者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的险恶用心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这也恰恰是他的思维自始至终都陷入“文革”的狂热中无法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结束以后，人祸的解决者不论是在党和国家有错必纠的拨乱反正时期还是在后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热朝当中，他们根深蒂固的腐败政治头脑无非就是希望让受害人永世不得翻身，除了掩盖 50 年前其心胸狭隘的父辈陷害忠良的事实，还要让受害人一代一代的接受无休止的精神煎熬才是杨庄子村始终不给我们落实政策的真正原因和目的。这就是本人为什么在前文中把刘德栓描述成不明物种的原因，因为它不具备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情感。尽管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把刘德栓变成了魔鬼，但另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并没有把刘德栓这一类型的恶魔改造成具有正常人类的思维。在我精神状态陷入崩溃的时候曾试图杀掉这个不仁不义的家伙，但后来从精神病医院出来后，意识到了自己错误的想法，暴力解决不了历史的和现实的问题，公平和正义应该是解决一切问题所遵守的规则。

当年残酷折磨并最终杀害真理卫士张志新的所有刽子手们曾遭到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声讨，要求严惩凶手。但对张志新的死，没有哪一个人是具体的凶手，但她的死唤醒了包括众多“凶手”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觉悟。在解放后的中国历史上，张志新烈士的死又是那么史无前列的悲状，为了防止她在行刑前喊口号，几个大汉，把她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然后才押赴刑场执行枪决，而 7 年前林昭被枪杀的时候也只是在嘴里塞了棉团之类的东西。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谈到被害的杨德群君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被害人的气管再去处决，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会怎么描述？

如今张志新遇害已过去了 33 个年头，她的名字已渐渐被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淡忘，而 80 后的人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个张志新烈士。但是，她永远代表了这个国家所经历过的一个巨大创伤，她的精神是永恒的，如果这段历史被遗忘，那将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就拿我们杨庄子村来说，除了权力阶层还有那个一直做着复辟美梦的刘德栓之流可能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张志新，即便是知道，他们扭曲和变态的灵魂也不会受到什么震动。张志新的血似

乎并没有昭示中国权力阶层和社会公众当中一部分人的觉醒，因为现在依然是一个遍地谎言的时代。网上有人撰文解释道："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这个结果显示了中国人不说真话的现实的、直接的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根据全文的综述以及残酷的现实状况，杨庄子曾经以女书记张玉春为代表的权力阶层的险恶用心同样已经昭然若揭。尽管执政党的高层不断地出台诸如"三个代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群众利益无小事"等等各种各样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但其效果和发挥了什么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网络中会出现一句"大官小官无官正，反腐倡廉未见行"这样的评论，是值得执政党和全国人民都应该认真思考和反省的问题。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我的父亲、我的整个家庭因遭到卑鄙小人的陷害已经导致我们忍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精神煎熬，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 50 年！！！

先前的格言是不是打破了世界纪录？是不是应该将其刷新为，"君子报仇，五十年不晚"！！！即便是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得公平和正义的说法。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这不能不说在高度文明的现代社会里，它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话题。但是，我依然不会怨天尤人，我只会继续一如既往做好自己的工作并与善良的人们共担生活的风雨，共享人生的快乐。

很早以前，我的父亲也曾经为人间的不公平而伤心流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悲惨的历史已经在他的心里逐渐淡化了，到后来父亲常说的一席话也同样彰显着理性与宽容："被人欺负也可能算是一种福，几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被人欺负死啊，我照样活得好好的，能够学会忍辱也是一种美德，你母亲正是因为不具备这种忍辱的美德才只活了五十几岁……"

我也曾经为父亲以往的懦弱发生过激烈的争吵。如今我已经不再反驳父亲了，他能够心平气和的健康长寿就是我当儿子的福分了，当然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纵观全文，我们已经在理性与宽容方面作出了最大努力，从我们贫下中农的革命家庭遭人陷害算起时间跨度已经长达半个世纪，至于我们对施暴者宽容到什么程度，前文已经提到了，所以再提宽容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鉴于在过去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非人道的背景下，我们以理性的心态，具体地说还是在前文已经出现过的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范围内提出如下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应该不算是过分之举吧：

一、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 50 年前给我们强加"富农"的直接责任人进行调查，弄清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党纪、政纪责任，对已经死亡的要将其尸骨永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像宋朝那个残害忠良的秦桧，永远受到世人的唾骂。

二、希望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在由杨庄子社区群众参加的大会上依法撤销 50 年前由村干部强加给我们的"富农"，以恢复我们当年不仅也是贫下中农的名分，而且还是为党和国家解放事业有过贡献的革命家庭，我们是因为被人陷害才导致更大的冤案，从而彻底消除因"富农"给我们两代人以及给我们受到牵连的亲属所造成的深远和持久的不良影响。通过这一事件警示后人让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让人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公正、平等、充满温暖和关爱的和谐社会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努力奋斗。

三、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 30 多年前那个以黑暗的背景和极其肮脏的手段混入党内，最终成为党支部书记并统治杨庄子长达 20 年之久的"世纪书记"张玉春，进行调查，并同时铲除家族统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如果涉及到构成犯罪的人员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希望党和政府的司法机关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死不改悔的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在"文革"期间打击报复、残害无辜的野蛮行径进行调查，如果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我们以合情合理的原则主张原革

委会主任刘德栓及其追随者们共同承但一定数额的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拿出人民币 1000 万元医治我们两代人在长达 40 年时间里所遭受的精神创伤。也许有人会说 1000 万太过分了，但是，如果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拨乱反正时期，刘德栓有一句真诚的道歉，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一语值千金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领会的基本道理。

五、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 1998 年王海山黑恶势力与政府官员相勾结的腐败案中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依法追究他们的党纪、政纪责任，如果构成犯罪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希望党和政府的纪检部门对 1998 年夏季河北电视台来定州采访时的那两个丧失职业道德的记者把那份郑重签着谢强名字的新闻稿件交到黑恶势力头目王海山手里的过程进行调查，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如果涉及渎职或受贿犯罪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希望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排除定州市某些人干扰前提下，对腐败案中的王海山、赵颜某等 4 户受易者所侵占的公共用地依法进行追究和处罚，同时拆除其在当年拆除线以外的所有不法建筑，恢复公共道路的安全和通畅。在此郑重声明一下：拆除线以外，国家已经在当年就支付了 3－5 倍的赔偿金和安置费，因为在杨庄子村涉及的拆迁户只有这几家，国家有关部门是直接将钱款分文不交到这些人手上的，根本不存在针对拆迁户的地方截留和其它不合理问题。

另外，我们只想要回我们自己的血汗钱和我们付出劳动所产生的属我们于自己的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管它有多么漂亮的外表和多么昂贵的身价，我们都一律不稀罕。

由“富农”原因和那个前革委会主任在“文革”时期以及杨庄子村基层领导在 1980 年前后落实政策时期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提出以下赔偿要求：

一、1964 年我们盖新房的时候，因“富农”原因罚款 50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加上利息一并退还我们。

二、从我家院落刨走的 12 棵树苗（杨庄子村已在 1982 年赔款 240 元，不再追究）。

三、1968－1978 年间，以付出 10 年劳动被生产队扣除的那笔 600 元罚款，按可比价格计算，加上利息一并退还我们。

四、九分宅基地退还我们并恢复其原状，其上 10 棵成材青皮杨树适当折价后，以现金方式赔偿我们。

五、在 1968 年被毁的那块 400 多棵树木的林地，按我们 50％的所有权，200 棵成材树木折价赔偿我们。

六、因在拨乱反正时期的基层政府给受害人造成精神上的再次伤害与“文革”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长期的申诉无门以及走头无路所造成的伤害，主张人民币 1000 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七、电工黄耀全因其自身原因在 1986 年讹诈我们的 30 块钱，按可比价格计算，加上利息一并退还我们。

第二十六章　感恩——我的祖国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东方红》中的这句歌词真实表达了当时处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中国人民的心声。孙中山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正是因为腐败的蒋介石政权表面上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实际上却干着违背三民主义原则的勾当，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推行独裁专制统治，由此全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已经证明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它得到了占全国绝大多数劳苦大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同样是共产党的光辉指引着我父亲在 1947 年走上了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而参军报国的道路，而共产党后来所推行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一系列让人感动的原则也不断地照亮我们下一代前进的方向，所以在我身处逆境的时候依然怀着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满怀着战胜邪恶的必胜信念才活了下来。如今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人士，实际上我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所作为人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做为一个纯粹的人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应该仅仅为活着而活着，更应该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活着才能彰显人生的意义。这也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源泉。

在我的生活轨迹中尽管我不断地在探索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诸多问题，但是我始终不存在政治上的野心，更不存在生官发财的欲望，所以我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做敢为的人，只要是符合道理、情理、法理乃至真理的事情，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置个人安危与度外，勇敢地去维护正义的尊严，即便是面对强大的黑恶势力也照样与他们较量一番，即便是最后均落得失败的结局，我无怨无悔。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也可能有人会说我不自量力，但随便人们怎么说都可以，我问心无愧就足够了，因为历史终将会证明一切。

在过去 27 年的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打击，但我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真正认清了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也亲眼看到了指鹿为马的时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纸是永远也包不住火的，精神财富的积累意味着人民在不断地觉醒，互联网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什么不可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官场上没有多少真话，谁的过错？谎言的时代终将会结束的，说真话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思想和媒体的开放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某些人继续把媒体当做打压不同思想的工具将是危险的。爱国不是单纯地爱哪个政党，也不是爱哪个政府，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不是那些跟着起哄而空喊口号的人们，更不是那些为指鹿为马而喝彩的人们，善于冷静思考的人们真正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付诸切实有效的行动才能算得上是爱国者。另一方面，真理有时候确实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当年在全国 8 亿多人跟着上边高喊“打倒刘少奇”时，能说他们的行为是爱国吗。而真正的爱国者史云峰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切，为刘少奇等鸣不平而成为“44 号特大反革命案件”，就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两个月后的 1976 年 12 月 19 日惨遭枪决。1980 年平反后，史云峰被称为至死不渝，捍卫真理的卫士。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上，像秋瑾、林昭、张志新等几位有代表性的时代女杰思想上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为了真理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从容的面对死亡，是真正义意上的爱国者，不同之处仅仅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值得欣慰的是，秋瑾付出 32 岁的年轻生命所追求的理想，在经历百年巨变后，正在逐步实现。几年前我曾经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止不住的泪水了解林昭的事迹，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女性，称之为中华圣女当之无愧。为了真理她在狱中写下的二十万字的血书，在 1980 年平反后曾一度开放，但很快就被有关部门封存。　同样是为了坚持救国、救民的真理，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被改判死刑，随即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她在接到判决书时，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林昭的年龄永远定格在 36 岁，从现在起她将永远是一个小我很多岁的妹妹，她是值得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同胞姐妹。张志新同样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我们一个多么荒谬、扭曲和恐怖的时代。1970 年 5 月，张志新因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为刘少奇翻案而被判死刑。1975 年 4 月 4 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在沈阳被杀害。早在 1979 年的时候，我曾经满含着泪水从杂志上阅读了有关张志新事迹的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后来张志新的形象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她的名字也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但是血的历史是永远不能被善良的人们忘却的。

让全体中国人民欣慰的是，中国社会不光从经济上而且同样在政治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少现在讲真理、说真话不会再有流血和杀头的危险了，所以，讲真话和追求真理将成为人们的理想，那些没有主见而随波逐流的人们将会越来越少，指鹿为马的时代已经或行将成为历史。

我的家庭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了下来。

我的母亲同样也是幸运的，虽然她也在某些公开场合说了很多“文化大革命”的“坏话”，虽然她坚持了舍生取义（就算还达不到坚持真理的高度），甚至在拘留所里还进行了绝食的抗争，因为她没有文化，仅仅是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农家妇女，从而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个淳朴的农民家庭，才使得在拨乱反正时期邪恶的地方权力阶层没有给我们平反，这也使得我的母亲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却没能躲过新的邪恶势力的伤害而在 1982 年含冤离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坚持了要为父母最终讨回公道的信念。既然中国共产党的诺言是严肃认真、有错必纠、光明磊落，但针对我们这个家庭的有关错误自始至终都没有纠正，所以我们一直在等待纠正错误的那一天，不管还要等多久，我们都会有信心等下去。再此重复前文所述：这就是代表了据理力争的“刁民”的信念，难道这样的信念有问题吗？难道没有得到公正的中国人民永远保持沉默才是正确的吗？

曾经为执政党和国家的解放事业参军入伍、出生入死的老父亲已经 81 岁高龄了，在有生之年以急切的心情期盼着祖国和人民为我们讨回公道的那一天。

我母亲含冤长眠地下屈指算起已经 26 年了，她那永不安息的在天之灵也在期盼着。衷心地希望她老人家一辈子坚持真理的那颗心随着四川“5·12”特大地震中数万无辜死难者一道安息吧。有伟大的国家和坚持正义的人民，所有那些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不论是在人祸、还是在不可抗拒的天灾中的无辜死难者也一道安息吧。

对于我的家庭来讲，在我们处于绝境并急需要金钱的时候，仗势欺人的杨庄子村“世纪书记”张玉春串通原革委会主任刘德栓，没有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在我们继续申诉无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麻木不仁的地方行政部门依然没有在学习实践“三个代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日子里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经过我自已多少次死里逃生，甚至有时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的生活磨难当中，经过我自己付出那些让常人无法想像的艰辛和努力之后，尽管最终也没有实现让我母亲过上好日子的诺言，但是，完全凭借我自己的一双手获得了现在足够让全家 5 口人过小康生活所用的金钱。

所以，现在对于我的家庭和我个人来讲，已经不需要太多的金钱了，但是，除了要求按可比价格计算如数退还我们的钱，我依然主张总额为 2000 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哪怕是 5000 万元乃至满屋子都是数不清的金钱也无法真正偿清我们两代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创伤。

但是话要说回来，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管给多给少，我们都是完全无条件可以接受的，哪怕是只有 1 块钱，我们同样无限感激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所遭受的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而最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做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个人希望把有关部门返还的赔偿金中的一部分象征性地用于偿还过去几十年中所欠亲友的部分债务，因为我的家庭很多时候是在亲友的接济下才得以生存下来的，况且因我家“富农”的原因同样给我们那些革命家庭的亲属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不小的影响。另外给我的三个姐姐一定数额的补偿，因为在为生产队白白付出 10 年的劳动中，她们先后都付出了心血和汗水，而且在政治上也同样受严重的影响。此外我还要用其中的钱为含冤去世的母亲立一块墓碑，尽管母亲没有文化不识字，可她一生为人正直，坚持真理，尽管是在逆境中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头，保持了那种“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信念。

我要用其中的钱买上礼品，去看望 33 年前曾经奋不顾身地把我从水塘中救起的夏庄子村蒋家兄弟，郑重感谢他们

当年的英雄壮举。从我母亲过世后与他们的家里断了来往，尽管两家人就生活于近在咫尺的范围内，可是到现在快有 30 个年头不曾蒙面了，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我知道蒋家大哥在改革开放后的大潮中率先成为不仅在夏庄村而且在定州市有名的实业家，之后还是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再后来当上了村主任和市人大代表。只是我的身份是那样的卑微，我没有勇气更没有脸面去见当年的救命恩人，所以才一直在煎熬中等待着时机。我还要买上花圈在蒋家大伯和大妈的坟前祭拜以感谢他们在我当年落难时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照，安抚他们的在天之灵含笑九泉。

我要用其中的钱买上礼品设法找到 24 年前河北省精神病医院的陈医生，以实现当年我向他保证的当自己的家庭得到平反和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要带上父亲饲养的小兔子来看望他的那个承诺。虽然我和父亲现在都不再饲养兔子了，但我会到市场上挑选两只最漂亮的小白兔，让她们把人间洁白无暇的纯真友情带到陈医生的家里。

我还要用其中的钱设法找到我已经离世的荷兰朋友迪克•德•博依的家属并向他们当面表达我无限的感激之情。在我情绪低落和生活上走头无路的时候、在我开始创业举步维艰的时候，正是这位并不十分富有的朋友不但给了我极大的精上的鼓舞，而且在物质上还给予了无私的和国际主义的帮助。只是因为当时经济条件所限，我们仅限于通信来往而始终未能蒙面。我要亲自在他的墓碑前献上一个花圈以缅怀我们当年那种兄弟般的友情。因多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当年我们那些通信资料都已经不见踪影了。因大量的书籍和零散的文件无处存放加上有时候生活陷入困境，我的妻子甚至不给我打招呼就把堆放在角落里用不到的几箱书籍和大量的文件也当做废品卖掉了，所有那些他用打字机打给我的英文信件如果不是丢失的话也足足可以出版一本书了。我只记得 Dick de Booij 的家乡是 Den Helder，那是位于荷兰西北部的一个港口小镇。当年他给我的很多照片也都失散了，后来唯一的一张照片因为发表那个英文稿也一起给了杂志社，现在只有从手上还保留的 1995 年那份旧杂志上看到老朋友的形象了。

其余的钱我将用到公益和福利事业中或者发起成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那些迫切需要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

我本人将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为报效最近一百多年来曾经受尽外国列强欺凌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加倍回报社会而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心路历程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当我们所经历的半个世纪之久的人道主义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之后，当杨庄子社区里的公平与正义最终得以实现的时候，我将在这部纪实报告文学为蓝本的基础上，写出一部以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生活为背景以反腐倡廉为主线的长篇小说。尽管我只是靠艰苦的自学接受了高等教育，不具备专业的写作能力，甚至还没等到我拿到高中毕业证的时候，就被无情的生活现实把我关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我要用发自肺腑的一腔热血真实再现人间的冷暖、善恶，歌颂那些坚持正义、秉公执法的领导干部，无情鞭挞那些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为虎作伥的时代罪人。让所有纯朴、善良的人们，让所有只会学习而不会实践的基层干部以及所有那些内心世界充满阴暗、邪恶和残暴的人们都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真正意义。

邪恶的势力可以做到猖狂一时，但永远也做不到猖狂一世，不管它的规模有多么强大、也不管它有多么坚不可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背景，只要它违背了党和国家的跟本原则，最终注定都是要失败的。有强大的党和国家做后盾，所有善良的人们对所有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黑恶势力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我今后的打算是有机会也能够加入党组织，尽管在我过去情绪极端低落的时候对我们党曾经有过某种怀疑和误解，

但那完全是因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违背党的基本原则以及那些混入党内的历史罪人玷污和亵渎了党的纯洁性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如果我将来的出书计划能够得以实现，那将在图书出版发行之迹当做自己接受党组织考验的一份满意的答卷。

也许有的读者朋友会把我最后的心愿看作是痴人说梦的幻想，按现实的历史有可能是吧，但是我坚持公平与正义的信念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生活是第一位的，既然理性和宽容已经伴随了我们几十年，尽管对恶人继续保持宽容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我总没有理由与之拼个鱼死网破吧。曾经残害我们的刘德栓和张玉春即便是永远没有人性的悔悟那又能对我们怎么样呢，我相信他们和所有为虎作伥的权贵们没有经过洗刷的灵魂不会升入天堂，而是带着人间的罪孽进入十八层地狱的最下层。大致 10 年前我父亲加入了一个信仰耶稣的教会，具体什么名称，因我不感兴趣也没打问，他常自言自语的一句话是："唯有忍耐好，唯有忍耐高，忍耐到底是耶稣指教，所以我不烦恼，是非不和人计较，骂不还言打快跑。唾沫吐脸上，不擦自干了，逼迫我的要为他祷告，恨我的要待他好，七十七次把人饶，吃亏受屈神知道。"

我本人在上高中的时候曾信仰了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人间的天堂，但是，现实社会的残酷离这个人间天堂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这不免让我困惑，让我重新思考。

我们如今的执政党在战争年代还是革命党的时候，中国人民抛弃了腐败无能的所谓国民政府而选择了共产党，经过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才最终换取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执政党能否永远保持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所认可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应该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我在序言中已经说了，我本人不会反党，也不会反社会主义，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是在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所谓公平与正义的理想社会，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呢？

执政党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保持执政地位的长期稳定也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稳定高于一切是大局，但是稳定靠什么来实现可能是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执政党应该善于倾听来自社会底层那些弱小的声音和社会上不同的声音，善于解决社会矛盾，让公平与正义成为社会的主调，那么稳定与和谐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实现呢。让人们闭嘴和封闭的媒体，不会带来稳定，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已经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随便就可以被蒙蔽，中国人民已具备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过去有不少中国人都喜欢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但是也没有发现有谁被"和平演变"成了反动派。当今的美国社会，不同民族和处在不同阶层的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享有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美国的新闻自由和开放的媒体真正起到了对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监督和正确导向作用；美国相互独立和彼此权利制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使美国社会的公正度大大提高，各级官员即便是有贪腐的思想也无法找到滋生腐败的土壤从而使美国的各级政府成为高度透明的廉政形象。相比之下，中国高层只会大谈和谐社会，而实际情况却是老百姓投诉无门，社会公正度大打折扣，尽管有那么多的信访局但有的甚至成为腐败政治的帮凶（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说明），其效率之低下并不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现实的社会主义已经大大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毛泽东仅仅杀掉了张青山和刘子善两个贪官就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化的政治风气，而如今反腐倡廉可以说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批贪官被杀掉了，新的贪官又不断的崛起，而且贪官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多少年过去了，恶性循环依然还看不到尽头。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的社会制度，而实际上贪腐阶层就是新的剥削阶级，与过去所谓的资产阶级相比，这种剥削程度和社会危害性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贪官阶层不劳而获，动辄就是上千万的受贿，损害的当然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理由不能说贪官阶层是新的剥削阶级？

解决社会不公平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都心知肚明，那就是改革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迫在眉睫，同时社会还需要一个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机制就来自于有一个在野党的存在。然而，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似乎都容不下一山有二虎的存在，历史上总是兵戎相见，继而胜着为王，败者为寇。历史上在中国人之间所进行的大 大小小的战争似乎都成了统治者改朝换代的工具，到了现今高度文明的时代，如果在中国社会准许在野党的存在，那将是中国社会

巨大进步的表现，也将是我们的执政党站在历史的高度上为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一大贡献。具有历史前瞻性和博大胸怀的执政党的领导人，谁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共领导人，将会带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而载入史册。

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共产党，它是一个朝气蓬勃、具有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理念的执政党，它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现在的国民党也已经不同于过去的国民党，它早在很多年以前就摆脱了独裁、专制的坏名声而走向了民主。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已经不再遥远。

我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

（注：文中我们自己家人和直系亲属以及公众和新闻人物均用的是真名，其他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均为化名。文中所出现的时间和地名均真实并与实际相吻合。）

谢强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

电话：0312-8930928

网址：www.jy668.com

电邮：2006jy668@163.com

QQ：184569462

地址：073000　　河北定州市杨庄子社区铁西居 21 号　　　　姓名：谢强

相关链接：http://club2.cat898.com/oldclub/dispbbs.asp?boardID=1&ID=160016